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3

1864—1883年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统筹：曹　春
编辑助理：崔继新
技术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徐林香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8459-6

Ⅰ.马…　Ⅱ.中…　Ⅲ.马恩著作-文集　Ⅳ.A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4149号

书　　名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MAKESI ENGESI WENJI
　　　　　第三卷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54
字　　数　73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8459-6
定　　价　110.00元



编 辑 说 明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为了编辑这部文集，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为十卷，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文集的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的著作按编年和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方式编排：第一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至1848年期间的著作；第二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9年期间的著作；第三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至1883年期间的著作；第四卷收入恩格斯在1884年至1895年期间的著作；第五、六、七卷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第九卷收入恩格斯的两部专著《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第十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编。

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著作的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校订所依据的外文版本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部分文献还参照了国外有关机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编辑出版的专题文集和单行本。

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各卷均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和名目索引，第十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课题组对原有的各类资料作了审核和修订，力求资料更翔实、考证更严谨。在注释部分，重新编写了全部著作的题注，增加了对各篇著作主要理论观点的介绍，以便读者把握这些著作的要义。在对各篇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增加了对重要著作中译本出版情况的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技术规格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相关规定：在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未注明“编者注”的脚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注。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对文集的整体方案、各卷文献篇目、译文修订标准以及各篇著作的题注进行了认真审议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对提高文集编译工作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目　　录

插　图

第三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64—1883年的著作，以及他们后来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和导言。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日趋激烈。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组织在欧美各国相继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潜心研究理论的同时，积极指导国际工人运动，通过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总结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收入本卷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成立宣言》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目的和意义，用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阐明了工人阶级组织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强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共同章程》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目标、手段和组织机构，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建立与一切旧政党不同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扼要而通俗地阐述了《资本论》中

的一些重要原理，说明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和工资的实质，阐述了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同时强调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恩格斯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同样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并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论成就和崭新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全面总结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来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能够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强调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充分肯定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项民主措施：公社的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武装力量按民主原则组织；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马克思还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改造任务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并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中进一步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

在《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马克思批判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经济学观点和社会改良方案，阐释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观点。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出的种种“救世计划”，对科学

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深刻论述。他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律的本质；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目标，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

马克思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政治冷淡主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和恩格斯的《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论权威》等著作，批判了巴枯宁派主张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立即废除国家、否定一切权威和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的错误观点，阐明了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论证了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和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继承权、权威、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还针对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写了《论土地国有化》一文，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观点。

《流亡者文献》是恩格斯阐述欧洲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和俄国问题的一组文章。在这组文章中，恩格斯批判了布朗基派、巴枯宁派和俄国民粹派的错误观点，通过对波兰、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运动的分析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回顾，论述了欧洲革命的前景，阐释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同时阐述了研究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强调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

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为反对拉萨尔主义，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逐条批判了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强调国家具有阶级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也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纲领草案中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同时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

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工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把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同时进一步阐发了阶级斗争理论，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改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评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以及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指明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并科学地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恩格斯在为这部著作1892年英文版写的导言中，着重阐述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本质区别，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是马克思应法国工人党的请求起草的党纲的理论部分。马克思在导言中简要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目标。

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恩格斯分析了基督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批判了基督教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唯物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概述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贡献和毕生革命活动，阐述了马克思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伟大一生。

本卷附录收入《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以及马克思的演讲《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在这三篇文献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攻击和诋毁，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性质和宗旨，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和斗争策略。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64—1883年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

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工人们！①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报告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 955 000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1843年时代的贸易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2]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贵族阶层的最高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

---

①在1866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中是"工人朋友们"。——编者注

说出的话。当“勒杀犯”[3]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4]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5]，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厂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 000格令①碳素和1 330格令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②。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③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④比失业

---

①1格令＝0.065克。——编者注

②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

③《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第13—17页。——编者注

④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编者注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PRICE ONE PENNY.

PRINTED AT THE "BEE-HIVE" NEWSPAPER OFFICE,
10, BOLT COURT, FLEET STREET.

1864.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版的扉页



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 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么，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付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相当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通知下院说：

“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①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辞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①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编者注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6]

如果你们想知道,产生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条件过去和现在怎样使工人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①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不健康的儿童,将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斯塔福德郡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②。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工人的申诉》③吧!当

---

①《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第25—29页。——编者注

②《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24页。——编者注

③休·特里门希尔《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编者注

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例证的矛盾的陈述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工厂视察员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每年收入按收税员的估计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有3 000人每年共收入2 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总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 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 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10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①。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拉芒什海峡彼岸的那些更不幸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

---

①在德文版中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

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①就工人阶级的少数来说稍微有些提高，但就大多数来说，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就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被收容者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花7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花9英镑15先令8便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②，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

---

①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②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

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了拉芒什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造成了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的不可弥补的减员。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7]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过去在行动上没有过一致，那么现在至少在失败上是一致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8]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工人的这一措施的奇迹般的成就，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

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举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①]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②]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③]，它注

①在德文版中是"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编者注

②在德文版中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③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编者注

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际上是从并非1848年发明的，而是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①，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卓越，在实际上多么有效，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曾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作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9]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10]。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

①在德文版中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编者注

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①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下，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11]。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

①在德文版中加有“各国”。——编者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0月21日—27日之间

载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论 蒲 鲁 东[12]

(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1865年1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况且,我手头也没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诚意,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①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界语言**”的幼稚著作②,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

①《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编者注

②指蒲鲁东的《论通用文法》。——编者注

空想的方式“**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在我看来，蒲鲁东的这一著作在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还算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知性时使用的机智的悖论，毁灭性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二律背反**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知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知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

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这种批判性分析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la propriét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类似的著作[①]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关于"**盗窃**"的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②](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

①雅·皮·布里索《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编者注

②"Sophistication"有"掺假"和"诡辩"两种意思。——编者注

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①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厉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严厉的方式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②。

---

①即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113页13）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解释误当做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①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今天仍然认为每个字都是正确

①见我的著作第119、120页。[14]

的。但是，同时也要想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做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超极端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他自己所误解，如果说他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叙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浮夸**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自吹自擂、大言不惭的论调，特别是有关"**科学**"的令人十分厌恶的胡扯和以"**科学**"自诩的虚伪言词，不断传来，刺耳极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所贯穿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已经被虚浮的狂热系统地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15]，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价值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①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On veut que les*

①沙·杜诺瓦耶《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编者注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16]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17]**在**六月起义[18]**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19]（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巨人了。

蒲鲁东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59—64页①）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一些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18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19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17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4—481页。——编者注

(1850年)①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让巴师夏把他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论敌对他施加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

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②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那么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该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20]和19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么，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③的著作和他最后写的那本反对波兰的著作[21]应当认为不仅是拙劣之作，而且是卑鄙之作，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之作。在前一本著作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在后一本著作中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出愚蠢的厚颜无耻。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

①见弗·巴师夏／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指蒲鲁东《税收理论，沃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编者注

③指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编者注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编纂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小资产者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们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们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有才智的人，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学会玩弄自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悖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这样的人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么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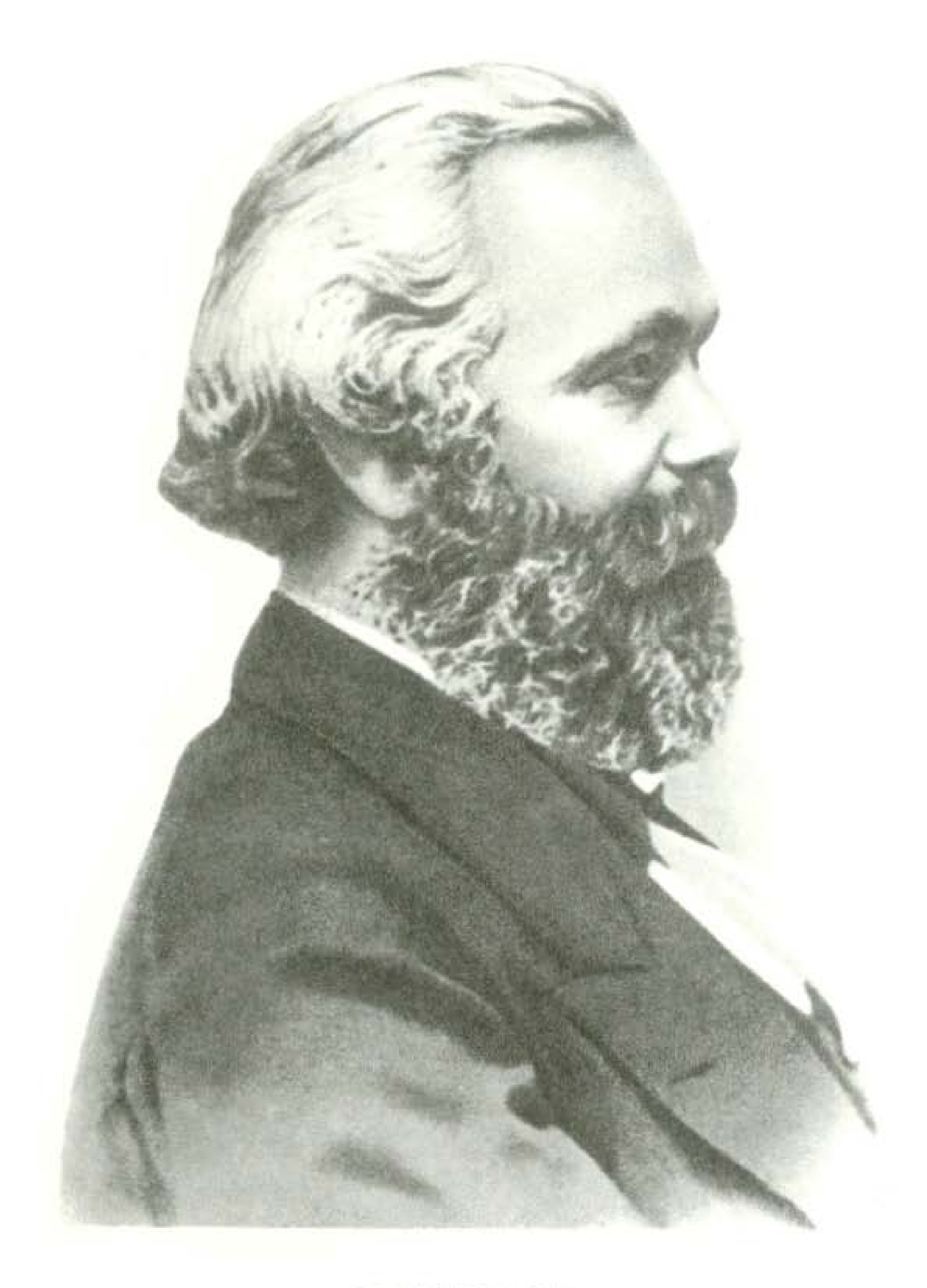
尊敬您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1月24日

载于1865年2月1、3和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马克思（1866年）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22]

[引　　言]

公民们!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允许我先说几句开场白。

目前大陆上有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闹着要求增加工资。这个问题将在我们的大会上讨论。[23]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即使你们不耐烦我也不在乎。

我要预先说明的另一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他不仅向你们提出一些他明知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之辩护,还自以为是在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在道义上表现出来的勇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表尊敬。尽管我这篇报告措辞直率,我希望,在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将会发现,我同意的是在我看来正是构成他的论点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不得不认为,这些论点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

我现在就来谈正题。

1. [生产和工资]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首先,**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其次,**实际工资总额**,也就是说,按照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在不断变化。一年告终时是如此,就可相互比较的各个不同年度来说是如此,就一年中每个平均日来说也是如此。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在不断变化。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撇开人口的变化不谈,它也必然如此,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确,假如**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了**,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立即**改变产品量。这种提高最初可能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但是,如果**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么,**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假定说,国民产品量不是**变**数,而是**常**数。即使如此,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已知数,比如说是8,那么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

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6，工资为2，那么工资可能增加至6，利润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的固定不变，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呢？不过是武断而已。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论断，那么它也应当在两方面都说得通，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能说明一个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很愚蠢，那么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也很愚蠢。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工人**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固定不变的，工资增加后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资本家**能够**压低工资，而且确实经常想压低它。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随后有一个反作用。所以，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对工资已经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依照公民韦斯顿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他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那个所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他就不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尽管不能而且不该**提高**，但是它随时可能而且应该**降低**，只要是资本家想把它降低。如果资本家想给你们吃的是马铃薯而不是肉，是燕麦而不是小麦，你们也必须把他的愿望当做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的比英国的高，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不仅会使经济现象的

研究工作，而且也会使其他一切现象的研究工作十分简单化。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不同于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一个牧师会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解释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起脸皮回答，上帝愿意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决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推理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质**。

2. [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作的演说，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他的全部推论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么，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的，将会是值4先令的东西，而不是值5先令的东西。工人阶级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买在工资增加之前用4先令就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资本家把只值4先令的东西要卖5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额被固定在值4先令的商品上？为什么不是值3或2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上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条既不依资本家的愿望又不依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决

定的，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条规律，并加以证明。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必要的工资额而决不能偏离它。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或取决于他的贪欲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愿望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愿望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对他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一定数量的人分食，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真让人觉得这个例子未免有点笨拙①。这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反抗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作为胃的贵族养活着国家躯体上作为肢体的平民。[24]阿格利巴却没能证明，填满一个人的胃怎么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肢体。公民韦斯顿想必忘记了，在工人们喝汤的那个汤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他们不能舀出更多的汤，既不是因为汤盆的容量小，也不是因为汤盆里盛的东西少，只是因为他们的汤匙太小了。

资本家用什么诡计能把只值4先令的东西卖5先令呢？就是靠抬高他出卖的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呢？或者相反，是否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如果不需要，那么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无论劳动生产力，还是资本和所使用的劳动的

①前一句中“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笨汉”的意思；此处“笨拙”的原文是“spoony”，是“spoon”的形容词。——编者注

数量以及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都没有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么这种**工资的提高**怎么能够影响**商品的价格**呢？只有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才能影响商品的价格。

的确，整个来说，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并且不得不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提高了，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决不要以为他们人数很少。你们仔细想一下，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议员说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大的一批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总是要大受限制的。

那么，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呢？工资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们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来求得补偿，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会增加的。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从这种已经减少的收入中，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价格已经提高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对于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需求额缩减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利润率就会下降**，这种下降不仅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与工资的普遍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和奢侈品价格的下降都成复比例。

对于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那些资本来说，这种**利润率的**

差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延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下降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经过这种变化，一般利润率**才会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重新**平均化**。整个这种转变，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个原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会停止，**价格**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会局限于某些工业部门，一定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只是这一定量的产品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大部分产品将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结果一样，小部分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结果也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任何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在上述论证中，我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我就回答，我作的这个假定是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的。如果工资增加数花费在从前不是工人们消费的物品上，那么，他们的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无须证明了。可是，他们购买力的提高只是由于工资的增加，那么这种提高就应该恰巧相当于资本家购买力的降低。因此，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不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可能会**改变**。一方增加的需求会被另一方减少的需求抵消。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动。

因此必须二者择一: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花费在一切消费品上,于是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该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花费在某几种市场价格将暂时上涨的物品上。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上升,以及另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供给量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在另一些工业部门中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波动之后,又会降到原先的水平。在这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终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为了唤起你们的想象力,公民韦斯顿要求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会引起哪些困难。他大声疾呼,请想一想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和接踵而来的价格的惊人上涨吧。当然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回避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100%。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100%的问题。我们完全不必讨论提高的**数量**,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应该取决于并适应于一定的情况。我们只想弄清楚,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过1%,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姑且不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100%的幻想,我想

请你们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确实提高过工资。

你们都知道自1848年起实行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8]，更确切地说，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重大的经济改革之一。这是一次突然和强制性的提高工资，并不是发生在某些地方行业中，而是发生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那些主要工业部门中。这是在特别不利情况下的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言人都曾**证明**——我应该指出，他们的论据比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更有力——这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这种工资的增加起因于并基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25]与这个法案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尽管工作日缩短，工厂工人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言人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26]，因为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价格史》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27]。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愿望，

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那么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应该是正确的，而早在1816年就宣布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①]、不顾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新拉纳克自己的棉织工厂里真正实行这一步骤的罗伯特·欧文却是错了。

在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在大不列颠，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曾有过**一次农业工人工资的普遍提高**。

虽然有些话我可以暂时不说，但为了不使你们误会，我还是要在这里预先说明几句。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4先令，那么**工资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看，这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尽管**实际的工资数额**，每星期4先令，仍然少得可怜，难以温饱。所以不应当陶醉于动听的工资**水平**提高的百分比。必须经常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不难理解，如果10个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个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还有5个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这20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20%，那就是从5英镑增加到了6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20%，尽管实际上其中10个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个人的工资每人从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个人的工资总额则从55先令增加到70先令。其中半数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frac{1}{4}$的人稍有改善，只有剩下的$\frac{1}{4}$的人，才真正有所改善。然而，再以**平均数**来

①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版第76页。——编者注

计算，这20个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20%，就雇用他们的全部资本而论，就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论，就仍然好像他们真的均等地分享了工资的平均增长额。在关于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中，英格兰和苏格兰各个郡的工资水平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最后，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有些事起了抵消作用，例如对俄战争[28]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29]，等等。

我就先说这么多，现在就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大约提高了**40%这件事。我可以举出大量的详细材料来证明我的论述，但是，就当前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一看已故的**约翰·查·摩尔顿**先生1859年在伦敦技艺协会[30]宣读的《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那篇诚实的批判性的报告，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从苏格兰12个郡和英格兰35个郡内大约100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再考虑到工厂工人工资的同时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在1849—1859年间应该有惊人的上涨。但实际情况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1854—1856年又连续歉收，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却从1838—1848年的每一夸特约3英镑，降到1849—1859年的每一夸特约2英镑10先令。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40%的同时，小麦的价格降低了16%以上。在同一时期，如果把末期同初期，即1859年同1849年比较一下，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934 419人减到860 470人，即减少了73 949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而在以后几年又未见减少，但毕竟是减少了。

有人会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31]，1849—1859年外国谷物的进口比1838—1848年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怎样呢？根据公民韦斯顿的观

点，国外市场上发生这样突然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猛涨，这种增长的需求无论是发生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影响都是相同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法国在这段时期，粮价惨跌已成为人们的经常话题，美国人不得不屡次焚毁他们多余的产品，如果我们相信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话，我们就会认为俄国怂恿了美国的内战[5]，因为美国佬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破坏了俄国农产品的输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就是：

需求的任何提高，总是在一定的产品量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决不能增加所需的各种商品的供给，只能抬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可是，通过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看到，需求的提高有时会使商品的市场价格完全不变，有时也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暂时提高，接着就是供给的增加，接着就是价格再降**到**原先的水平，多半**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条件。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解释一般的现象，和解释在工资提高这个特别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同样是困难的。所以，他的论证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毫无特殊意义的，只不过表明他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个规律：需求的提高引起供给的增加，而最终不会引起市场价格的上涨。

3. [工资和通货]

在讨论的第二天[①]，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把他的旧主张披上了新形式。他说：由于货币工资的普遍提高，将需要更多的通货来支付这些工资。通货的数量既然**固定不变**，那又怎么能用这种固定不变的通货来支付增加了的货币工资呢？以前的难题是：工人的货币工资尽管增加而工人所得到的商品数量仍然固定不变；现在的难题是：商品的数量尽管固定不变而货币工资却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承认他的原先的教条，他那相应产生的难题也就消灭了。

可是我要说明，这个通货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毫无关系。

在你们的国家，支付机制比在欧洲任何国家完善得多。由于有了广泛的、集中的银行系统，只需要少量的通货，就能周转同等数目的价值，就能办理同等的或数量更大的交易。例如，在工资方面，英国工厂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资付给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这些钱送交银行家，银行家每星期把这些钱交还工厂主，工厂主再把这些钱付给自己的工人，如此循环不已。由于有这套机制，一个工人的年工资假定为52英镑，只要用一个索维林[②]，就这样每星期周转一次，便可支付了。但是，这种机制即使在英格兰，也不如在苏格兰那样完善；

①指1865年5月23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编者注

②索维林(sovereign)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同英镑价值相等。——编者注

并且并不是到处都一样完善，所以我们看到，例如有些农业区域，与纯工业区域相比，却需要更多的通货才能周转少得多的价值额。

你们如果渡过拉芒什海峡，就可以看到，那里的**货币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些工资是用**多得多的通货额**来周转的。每一个索维林不能那样快地被银行家取得，或者回到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所以，在英国，一个索维林就能周转一年的52英镑，在大陆上，你也许需要3个索维林才能周转25英镑的年工资。因此，把大陆各国和英国相比较，可以立刻看出，低额的货币工资可能比高额的货币工资需要多得多的通货额来周转，这实际上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毫不相干。

据我知道的最确切的计算，英国工人阶级的年收入估计为25 000万英镑。这个庞大的数目大约是用300万英镑来周转的。假定工资增加50%，需要的通货就不是300万英镑，而是450万英镑了。工人的每日开支，有很大一部分用的是银币和铜币，即普通的铸币，这些铸币对于金子的相对价值，和不能兑换的纸币一样，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那么，货币工资提高50%，比方说至多只需要补充100万索维林进入流通。以金银条块或铸币形式躺在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金库里的100万英镑就会进入流通。然而，这100万补充通货的铸造或磨损所造成的少量费用甚至可以节省下来，并且当追加通货的需要引起某种摩擦的时候也确实会节省下来。你们都知道，英国的通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银行券，用于商人之间的交易和消费者与商人之间的大宗支付。另一类是金属铸币，在零售贸易中流通。这两种通货，虽然种类不同，却是交错使用的。例如，甚至在大宗支付中，5英镑以下的零数大半是用金币流通的。如果明天发行4英镑、3英镑或2英镑的银行券，这些流通渠道中的金币就会立刻被挤出，流到那

些因货币工资增加而需要它们的地方。这样一来，因货币工资增加50%所需要补充的100万，不增加一个索维林也可以填补了。增加票据流通而不另发银行券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在兰开夏郡，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

如果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例如100%，像公民韦斯顿就农业工人工资所假设的那样，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且，依照他的见解，这需要补充一批通货，却又难以筹措，那么，**工资的普遍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样的后果。好啦！你们都知道，1858—1860年是棉纺织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1860年在这方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门这时也很兴旺。1860年，棉纺工人以及与他们这一行业有关的其他工人的工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美国危机[5]发生后，那些工人的总工资忽然降到大约相当于过去数目的$\frac{1}{4}$。反过来，那就是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5提高到20，我们便说工资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20降到5，我们便说工资减少了75%。但是在一方面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方面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15先令。所以，这是工资水平的一种突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们不仅计算那些直接在棉纺织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计算那些间接依靠棉纺织工业的工人，那么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frac{1}{2}$。小麦的价格降低了吗？没有，它已由1858—1860年这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47先令8便士**提高**到1861—1863年这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55先令10便士。至于通货，1861年造币厂铸造了8 673 232英镑，而1860年只有3 378 102英镑。换句话说，1861年比1860年多铸造了5 295 130英镑。当然，1861年流通的银行券比1860年少了1 319 000英镑。现在减去这个数目，1861年的通货与1860年这个繁

荣年度相比，仍然多出3 976 130英镑，大约多了400万英镑；但是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已经减少了，虽然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却是以近似的比例减少了。

现在把1862年和1842年比较一下。1862年，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有极大的增加，除此以外，单是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铁路定期支付的股票、债券等等的资本就达32 000万英镑，这个数目如在1842年当然会令人难以置信。然而，1862年和1842年的通货的总额仍然是几乎相等的，你们还可以看出，不仅商品的价值，而且一般货币交易的价值在大量增加时，通货反而趋于递减。从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观点看来，这就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他要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姑且不谈工资并假定它固定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以及通常要结算的货币交易的数额是每天变化的；银行券的发行量是每天变化的；不以货币为中介而借助汇票、支票、账面信用和票据交换所而实现的支付数额是每天变化的；由于需要实在的金属通货，市面上流通的铸币与储存或躺在银行金库中的铸币和金银条块的比例是每天变化的；国内流通所吸收的金银条块数量和送出国外供国际流通的金银条块数量是每天变化的；那他就会知道：他的通货总额固定不变的教条，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相矛盾的极大的错误。他就会去研究使货币流通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那些规律，而不致把他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变成反对提高工资的论据了。

4. [供给和需求]

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确信一句拉丁谚语："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即复习是学业之母，所以他再次用新的方式来重述他原来的教条：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通货紧缩一定会使资本减少，等等。我已经讲过他的关于通货的奇谈怪论，我认为，完全不必再来讨论他的那些根据他想象的通货灾难所幻想出来的想象的后果了。我现在就把他用多种不同形式反复陈述的**同一个教条，归结为它的最简单的理论形式。**

他论述他的命题的方法是非批判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提高工资，或者，反对因工资的提高而产生的高工资。现在我要问他：究竟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例如，为什么每星期5先令就是低工资，每星期20先令就是高工资？如果说5与20相比算是低工资，那么20与200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一开始就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决不能给人传授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谈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并不是由出售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然而公民韦斯顿在谈到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经济规律中推演出这样的标准点，甚至不觉得有注意它们的必要。显然，工资只有和一种测量其数量的标准相比较才能够谈高低，但他却满足于承认高低这种流行的庸词俗语，以为这是有一定意义的。

他不能向我说明，为什么对一定量的劳动要付以一定量的货币。如果他回答说，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我首先就要问他，供给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规律调节的呢?于是，他那样回答就会立刻使人不屑一顾。劳动的供求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变化。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就上涨；供给超过需求，工资就下降，尽管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采用例如罢工或别的方法来**探测**需求和供给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么毅然反对提高工资，就未免幼稚无益了，因为按照你们所凭借的至高无上的规律，工资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资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你们要是**不**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我就再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一定量的劳动要付以一定量的货币呢?

还是把这个问题考虑得更广一些：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经济学家所说，是相互一致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时，它们就相互牵制，彼此都不向对方发生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因而停止发生作用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符合它的**实际价值**，就符合市场价格随之变动的那个标准价格。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必讨论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的一时的影响。这对于工资或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

[5. 工资和价格]

我们的朋友的一切论据，如果化为最简单的理论形式，就是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

我可以用实际的经验来驳斥这种已被驳倒的陈腐谬论。我可以告诉你们，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格比较高，但他们的产品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便宜；可是，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价格就比较低，但他们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卖得贵。比较一下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我可以指出，除了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平均说来，高价的劳动生产低价的商品，而低价的劳动生产高价的商品。当然，这种现象不能证明一种场合下的高价劳动和另一种场合下的低价劳动各自都是造成那些正好相反的结果的原因，但总能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不过我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顿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从来没有使它公式化。相反，他曾说，利润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资，而且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见，价格是怎样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资构成的。然后再为资本家加上百分之几，为土地所有者加上百分之几。现在假定，生

产一种商品时所费的劳动的工资为10；如果利润率与支出的工资相比是100%，资本家就要加上10；如果地租率与工资相比也是100%，就要再加上10；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30。但是，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罢了。如果在上述场合，工资涨到20，那么商品的价格就要涨到60，以此类推。因此，提出价格由工资来调节这一教条的所有老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家们，都是说利润和地租**不过是加在工资上的百分之几**，借以证明这个教条是正确的。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百分之几的限度归结为一种经济规律。相反，他们似乎以为利润是由传统、习惯和资本家的愿望决定的，或者是由别种同样武断的和莫名其妙的方式决定的。如果他们说利润决定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种竞争的确会拉平不同行业的不同利润率，把这些利润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决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润率。

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我说的价值都是指交换价值——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这就使我们为难了，当然要为难，只要我们想依照逻辑来推论。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很少从逻辑上考虑的。就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工资规定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增加了，价格也要提高。随后他又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增加工资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商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在开始时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

定，在结尾时却又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我们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结论。

总之，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他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显然，我们只是躲避了困难，因为我们决定一种价值，用的是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另一种价值。

"工资决定商品的价格"这一教条，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这种同义反复只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要是接受这个前提，有关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全部推论就都变成空洞的呓语了。所以，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彻底粉碎了"工资决定价格"这个流行已久的陈腐不堪的谬论，这个谬论已被亚当·斯密和他的法国前辈们在自己著作的真正科学的部分中驳斥了，但是又被他们在其著作的比较肤浅和庸俗的章节里再现出来。

6. [价值和劳动]

公民们，讲到这里，现在我必须进一步实际地阐明这个问题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令人很满意，因为这样做，我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我只能像法国人所说的"effleurer la question"，即只涉及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是怎样决定的？

乍一看，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研究

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其实，讲到价值，讲到某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我们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比例量。但是这时又发生一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有无限的差别。就以一种商品例如小麦来说，我们将会发现，一夸特小麦同其他各种商品交换，几乎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麦的价值**无论是用丝绸、黄金还是用其他某种商品表现出来，**都依然是一样的**，它必定是一种与其交换各种商品的**各种交换率**显然不同而且毫不相干的东西。一定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说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交换，或者说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那就是说，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某个第三种东西**，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因为我假定小麦和铁是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这同一数量的。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不论是小麦或铁，都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在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者比较三角形与矩形或其他某种直线形时，我们将怎样着手呢?我们把任何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一种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积等于它的底边和高相乘的一半，我们就能比较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线形的大小，因为每一种直线形都可以分解为一定数量的三角形。

计算商品价值，也应当用这种方法。我们一定能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

例去区别它们。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不相关，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要生产一个商品，必须在这个商品上投入或耗费一定量的劳动。我说的不仅是**劳动**，而且是**社会劳动**。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要是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费，他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他与社会没有关系。但是，一个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从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别的分工，这种劳动就算不了什么，它所以必需，是为了**补充**别的分工。

我们如果把**商品看做是价值**，我们是只把它们看做**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一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一块砖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量。但是怎样测量**劳动量**呢？用**劳动所经历的时间**，也就是说，用小时、日等等来测量。当然，采用这种测量法，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劳动或简单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

所以我们便得出结论：商品具有价值，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它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数量或劳动量**决定的。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各**相对应的数量**，是相等的。或者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

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想，你们有许多人一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其间果真有什么区别或多大的差异吗？你们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例如，假定说一夸特小麦和一盎司金子中凝固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1731年发表的第一篇题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的论文里曾经用过，他也是最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之一。是的，我们已假定，一夸特小麦和一盎司金子是**等价的**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凝结于它们本身的若干天或若干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参考一下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一点也不。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究竟**怎样**支付，甚至是否采用了雇佣劳动，我们都不管，让它作为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要是采用了雇佣劳动，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就很可能极不相等。一个把劳动体现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司金子的报酬。或者，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脱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一夸特谷物或一盎司金子的$\frac{1}{2}$、$\frac{1}{3}$、$\frac{1}{4}$、$\frac{1}{5}$或其他某种分量。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超过**或**多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但是可能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不受工资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按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决定商品价值这种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进一

步阐明。

在计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以前**用于这个商品原料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协助这种劳动的那些装备、工具、机器和房屋上的劳动，加到**最后**所费的劳动量上。例如，一定量棉纱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结晶，即纺织过程中附加于棉花的劳动量，以前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和其他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凝固在蒸汽机、纱锭、厂房等等中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在反复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再三使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们像原料那样一下子就消耗完了，它们的全部价值也就会一下子转移到它们协助生产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纱锭只是逐渐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据它的平均寿命和它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天内的平均消耗程度来平均地计算。这样，我们就计算出纱锭价值中有多少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计算出，例如一磅棉纱所体现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多少是以前体现于纱锭的劳动。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论，对这个问题实在没有详述的必要了。

也许会有人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么一个人越懒或越笨，他生产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完成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多。然而，这样推论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社会**”这个词有许多含意。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平均强度和平均熟练程度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动力织机和手工织机开始竞争时，只需要从前的一半劳动时间就能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呢子，可怜的手工织工，从前每天劳动9小时或10小时，这时每天

要劳动17—18个小时了。但是，他20个小时的劳动产品这时只代表10个小时的社会劳动，或代表10个小时内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用2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并不比他从前用1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有更多的价值。

如果说，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了，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同样，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生产各种商品所必需的各种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会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实不然。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越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多；劳动的生产力越低，在同一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少。举例说，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不太肥沃的土地，要获得同样多的产品，就必须耗费更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纺纱工人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比他从前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能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么，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程中加在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首先，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其次，**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引起这种改进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结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

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劳动生产力越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小。劳动生产力越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高。因此，作为一般的规律，我们可以这样说：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以上只说了**价值**，现在我再就**价格**这个价值所表现的特殊形式讲几句。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例如，在英国，一切商品的价值是用金的价格表现的，而在欧洲大陆，主要是用银的价格表现的。金或银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你们用本国的若干产品，即凝结了你们国内若干劳动量的产品，去交换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凝结了**它们**的若干劳动量的产品。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物物交换的方法才学会用金银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即为它们所消耗的各个劳动量。只要仔细看看**价值的货币表现**，换句话说，仔细看看**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你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使一切商品的**价值**能具有一种既**独立**又**同质的形式**，或者，一个使一切商品的价值能表现为**等同的**社会劳动量的过程。只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法国的重农学派[32]则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么，**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你们都知道，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一样的**，尽管生产条件因各个生产者而会有所不同。市场价格只表现在平均的生产条

件下供给市场以某种数量的某种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某种商品的总额计算的。

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它的**价值**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这种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是常见的，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 "自然价格……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不断地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各种偶然情况可能有时使商品的价格大大高于自然价格，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略低于它。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障碍阻止价格停留在这个稳定而恒久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①

我现在不能细谈这个问题。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说，相当于它们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但是供给和需求**必定**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它们实现这种平衡只是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靠下落补偿上涨，或者相反。如果你们不只是观察每天的波动，而是分析较长一段时期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中所做的那样，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们的背离价值，它们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消和互相补偿的；所以，除了垄断组织的影响和其他某些限制（这些我暂且不谈），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或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波动互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因商品的种类不同而各不相同，因为某些商品比另一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给适合于需求。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147页。——编者注

如果从总体上说，并且考虑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那么一切种类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价值出售的，因此如果假定利润——不是指个别场合的，而是指各个行业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来源于商品价格的**额外提高**，或者来源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那岂不荒唐。要是把这个观点加以概括，它的荒谬就显然可见了。一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总不免要作为买者经常丧失掉。如果说有些人是买者未必又是卖者，是消费者未必又是生产者，这也没用。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首先应该是他们从生产者那里无偿得到的。如果一个人先拿了你的钱，然后用你的钱购买你的商品，即使你按高价把你的商品卖给这个人，你也决不会发财。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赚到利润。

所以，要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平均说来，商品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按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按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商品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解释利润，你们就根本不能解释它。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有悖于日常经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是奇谈怪论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

7. 劳　动　力

我们尽量简略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一切商品的价值**的

本质，现在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特殊的**劳动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好像是奇谈怪论的话来使你们大吃一惊了。你们都确实以为你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所以劳动是有价格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一定有**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但是，**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就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现在我们用这个价值概念，怎能确定比如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在这个工作日里包含有多少劳动呢？10小时劳动。如果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就等于10小时的劳动，或者，就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了。显然，我们一旦发现"**劳动的价值**"这个词的真实而隐藏的意义，就能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应用了，好像我们一旦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动，就能解释它们表面上奇异的运动一样。

工人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的确，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但我确实知道一些大陆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一个人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长时间**。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奴隶制就会立刻恢复原状。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了。

英国的一位最早的经济学家和最有创见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已经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本能地发觉了这一点，而他的继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说：

> "**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①

①托·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霍布斯英文著作集》1839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编者注

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确定**劳动的价值**，就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

但是在这以前，我们应当问，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发现市场上有一批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这些东西，除了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都是**劳动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一批人是卖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除了劳动的双手和头脑，没有别的东西可卖；前一批人经常买进是为了赚取利润和发财，后一批人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研究经济学家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做**原始剥夺**。我们一定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原始积累**不过是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的历史过程。可是，这样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的人**脱离**劳动工具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就会继续保持下去，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直到生产方式方面的一种新的、根本的革命把它消灭，并以新的历史形式再恢复这种原始的统一为止。

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

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他本人活着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要成长并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机器一样，也是要损坏的，所以必须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他除了维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若干生活必需品以外，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来养育儿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延续劳动者的种族。此外，为了发展他的劳动力，使他获得一种技能，还需要另外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只要考察一下**平均水平的**劳动就够了，这种劳动的教育费和训练费是微不

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机会指出，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一定各不相同。因此，要求**工资平等**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一种决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是一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只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确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不同种类的劳动力有不同的价值，要生产它们，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它们在劳动市场上就应当卖得不同的价格。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

根据以上所说的，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现在假定，一个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6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又假定，这6小时的平均劳动也用金的数量表现出来，等于3先令。于是3先令就是这个人的**劳动力的价格**或他的劳动力的**每天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购买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劳动力每天卖3先令或每周卖18先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先令的价值。他每天所加的这个价值，与他每天所得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完全等价的。可是，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于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难题了。

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支付了它的价值以后，像所有其他买主一样，就有权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商品。强迫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像开动一架机器去消费或使用它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当然有一定的限度，可是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却只受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同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全然不同一样。限制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决不能限制他的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我们已经知道，他为了每天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必须每天再生产3先令的价值，这是他每天工作6小时就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资本家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这样，资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12小时。纺纱工人**除了**必须工作6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6小时**，这6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

间，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人，例如，每天工作6小时使棉花增加3先令的价值，这个价值与他的工资完全等价，那么，他在12小时内就要使棉花增加6先令的价值，并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棉纱**。既然他已经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即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得6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价值是6小时劳动的结晶，而他收回的价值却是12小时劳动的结晶。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预付3先令，每天收入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将再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剩余价值**，资本家对此并不付出任何等价物。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必然不断地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为资本家效力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的延长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或只抵偿他的工资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9. 劳动的价值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但是，因为工人是**在**

他劳动完毕**以后**领取工资的，并且知道他实际上给予资本家的正是他的劳动，所以他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必然就是**他的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假定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3先令，这是工作6小时所得的，如果他工作12小时，他必然以为这3先令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12小时的劳动体现了6先令的价值。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面上却很像**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正是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假象，就是**雇佣劳动**和**历史上**其他形式的劳动的不同之处。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偿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奴隶因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用于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他和他的主人没有订立合同，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他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白干的。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最近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其余3天就要在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显然分开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分开了，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认为强迫人白干活这种想法非常荒谬。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再在主人的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厂或作坊中为自己劳动6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6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

例中，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的，整个交易的实质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饰了。这种无偿的劳动，在后一例中似乎是自愿的，在前一例中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以下使用的“**劳动的价值**”这一用语，我不过是把它当做“**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10. 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假定1小时的平均劳动所体现的价值等于6便士，或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6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3先令或6小时劳动的产品。如果生产一种商品所耗费的原料、机器等等体现了24小时的平均劳动，这些东西的价值就会等于12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自己12小时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这12小时就会体现为6先令的追加价值。所以这种**产品的全部价值**共为36小时的已体现的劳动，即等于18先令。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有3先令，那么，资本家对于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6小时剩余劳动，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所以，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卖了18先令，他就实现了3先令的价值，他对此并未付出任何等价物。这3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见，资本家实现这3先令的利润，并不是因为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

出卖商品，而是因为他**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即出卖耗费于该商品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是必定获得利润的。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花在商品上的费用，和商品的实在费用，是不同的两码事。所以，我再说一遍，正常的、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而是由于**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都落入经营资本家的腰包。垄断土地，使土地所有者能以**地租**名义——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建筑、铁路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取得这**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拥有**劳动资料**，使经营资本家能生产**剩余价值**，即**窃取一定量的无偿劳动**，这就使拥有劳动资料并把它们全部或部分地贷给经营资本家的人，简言之，即**放债的资本家**，能以**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所以，留归经营资本家**本身**的，就只是所谓**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偿劳动各个部分的不同名称**，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从**土地**本身也不是从**资本**本身产生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能从经营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经营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经营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且本人又是他使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那么，剩余价值就会全部落入他的腰包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经营资本家，不论他最终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经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这种关系上的。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这次讨论的公民要模糊事情的真相，把经营资本家和工人的这种根本关系看做一个次要的问题，那就错了，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对经营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这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所述，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决**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而已。但是，除此以外，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构成**的，那就错了。我们先不谈

工资，只来研究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独立价值之和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完全违反真理了。

如果1小时的劳动体现为6便士的价值，如果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么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增加3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没有付过等价的价值。这3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经营资本家可以按随便什么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3先令的价值，构成他们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并不是经营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然后，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之和就构成了全部价值。所以，你们知道，流行的观点分不清**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个部分，和三种**独立**价值相加而**形成**这个价值这二者的不同，于是就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由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规定的数量，这种观点该是如何荒谬。

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100英镑，我们把这个数量看做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100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这个利润率显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100英镑。如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100英镑，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我们就可以说，**利润率**等于100%，因为预付的价值为100，而实得的价值则为200。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而是看

到预付的**全部资本**，例如500英镑，其中，400英镑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我们就应该说，**利润率**只等于20%，因为这100英镑的利润只是预付的**全部**资本的$\frac{1}{5}$。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真正比率，即对劳动进行exploitation[①]（请允许我用这个法文词）的真实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所用的，并且也确实适用于某些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词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究竟如何分配给不同的人群；我在使用**利润率**一词时，则总是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来测量利润。

12. 利润、工资和价格的一般关系

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包含在商品中的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的价值，即除去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价值，商品价值的余留部分就是**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如果12小时的平均劳动结晶为6先令的金量，那么这6先令的追加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唯一**价值。这种由他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他和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自分得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一价值。显然，双方可以按各种

①剥削。——编者注

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1 200万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即按工人的全部劳动来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分得的越多，他方分得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一个一定的数，其中一部分在增加时，另一部分相反地总要减少。工资有了变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工资下降了，利润就要上涨；工资上涨了，利润就要下降。按照前面的假设，如果工人得3先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100%，因为资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到2先令，或者，在一整天中只有$\frac{1}{3}$的时间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润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资本家只得到2先令，利润率就降至50%。但是，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所以，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

但是，商品的价值——这种价值最终一定要调节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完全由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总量来决定，并不取决于这种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但是决不能说，例如在12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永远不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的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劳动的**延伸**或长度。例如，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纺纱劳动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能生产12磅棉纱，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2磅棉纱。如果在前一场合，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6先令的价值，12磅棉纱就要值6先令，而在后一场合，2磅棉纱也要值6先令。所以，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只值6便士，在后一场合，

1磅棉纱竟要值3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力有差异的结果。生产力较高时，1小时劳动体现为1磅棉纱；生产力较低时，6小时劳动才能体现为1磅棉纱。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6便士，尽管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它的价格却等于3先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这是必然的，因为1磅棉纱的价格是由**耗费**于这磅棉纱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决定的。所以，我前面所说的高价劳动可能生产低廉的商品，而低价劳动可能生产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不再像是什么奇谈怪论了。这只是说明了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价值是由消耗于商品的劳动量决定的，所消耗的劳动量完全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13. 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1）现在让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流行的说法，即**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例如，在某一国，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为6小时的劳动，表现为3先令，这个工人为了生产维持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物，就必须每天工作6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12小时，资本家付

给他3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的一半就会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等于100%。但是现在假定，例如，因生产率的降低，要用更多的劳动来生产同量的农产品，于是，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从3先令涨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frac{1}{3}$，或增加$33\frac{1}{3}$%。工人要依照他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维持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物，便须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8小时；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6小时减到4小时，利润率就要由100%降到50%。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获得**他的劳动所增加的价值**，就好像其他所有出卖商品的人在商品成本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所增加的价值获得报酬一样。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必需品所增加的价值，劳动的**价格**也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是，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等数量的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可能从3先令减到2先令，换句话说，在一个工作日中不必劳动6小时，只要劳动4小时，就能再生产与每天生活必需品等价的价值。这时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3先令买到的生活必需品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是，这样减少的价值，仍能获得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于是，利润就会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利润率也会从100%提高到200%。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对这种相对工资的降低，不过是想要在他的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不过是想要维持他以前在社会阶梯上的相对地位。例如，英国的一些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就卑鄙地背弃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普遍降低了10%。工人的反抗，起初没有

奏效，但是，由于我现在不能详谈的某些情况，后来又恢复所失去的10%了。

(2)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保持原状，但是**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所以生活必需品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由于更丰富的矿山的发现，等等，生产例如2盎司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1盎司金所费的劳动多。于是，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50%。**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现为6先令的12小时劳动，这时就会表现为12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资仍是3先令而没有提高到6先令，**他的劳动的货币价格**这时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要大大降低。如果他的工资提高了，但与金的价值的下降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供给和需求，还是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该争取工资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说，他必须满足于名称的报酬，而不是实物的报酬。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在发生这样的货币贬值时，资本家总是急忙趁此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别的政治经济学家断定，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水银供给较廉，贵金属的价值又降低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

(3)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并没有固定界限。资本的经常趋势就是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将同样增长。资本把工作日越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

越多。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的前三分之二这段时间，10小时的工作日是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在反雅各宾战争[33]，其实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动群众的战争时期，资本庆祝自己的胜利，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14小时，18小时。**马尔萨斯**这位决非多愁善感的人，在1815年前后出版的一本小册子①中宣称，这种情形如果再继续下去，必将摧毁民族的生命之本。在普遍应用新发明的机器的前几年即1765年前后，英国出现了一本小册子，书名为《论手工业》②。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竭力主张必须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议，除了采取其他手段，还要建立**习艺所**[34]，用他的话来说，应该是**"恐怖所"**。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12小时**——这恰好是资本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在1832年针对12岁以下儿童宣布的不仅当时已实行，而且已成为必要的工作时间。[35]

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在现代制度下他不得不这样做——就是把这个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不过是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他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它——且不谈它的自然损耗——，而不是为了毁灭它。工人按照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他的劳动力，不用说，决不会允许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受到两天或两周的损耗或损失。现在举一架价值1 000英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10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上每年就要增添100英镑。如果它能用5年，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就要增添200英镑。换句话说，它每年损耗的价值和它的使用年限成反比。但这正是

---

①即《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指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编者注

工人和机器的不同之处。机器的磨损程度和它的使用时间并不完全一致。相反，人的衰退程度，和他工作时数的简单相加所表现出来的衰退程度相比，要大得多。

当工人们争取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范围时，或者，当他们不能强迫法律规定正常的工作日，而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被勒索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比例，来防止过度劳动时，他们只是在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种族履行义务。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设置一些限制而已。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其实仍低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同被榨取的更大的劳动量不相称，同劳动力的更快的衰竭不相称，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这用别的方法也可以做到。你们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们会告诉你们，例如，兰开夏郡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除了家长那个成年男子的劳动，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现在都被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36]下了，而工资总额的增加同从这个家庭榨取的全部剩余劳动不相称。

即使对工作日有一定的限制，例如，现在一切服从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都有这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为了保持**劳动价值**的原有水平，提高工资可以说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一些服从工

厂法的行业中，由于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和一个人要看管的工作机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劳动者还算是赢家。如果超出这个限度，他在一种形式下所得到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于是10小时劳动就可能与以前12小时劳动同样有害。工人争取提高工资以使之同劳动强度的提高相适应，从而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这不过是抑制他的劳动的跌价，防止他的种族的退化罢了。

(4)你们都知道，由于我现在没有必要说明的某些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个偏离是由另一个偏离来抵消的，在整个周期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调节的。再说，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致完全失业，他的工资也一定会降低。为了不受骗，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时，也应当同资本家争论工资究竟该降到什么程度。在产生额外利润的繁荣阶段，他如果不争取提高工资，按整个工业周期平均计算，他就会甚至得不到他的**平均工资**或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工资，在这个周期的不顺利阶段，必然要受影响，如果在这个周期的繁荣阶段，还要求他不去争取补偿，那就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的相互抵消才能实现，而这种相互抵消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所以，劳动也必须经历同样的变动，才能够获得与它的价值相

符的平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又让它免受调节商品价格的那些规律的约束，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能。雇佣工人要想补偿一个时期的工资的降低，必须在另一个时期努力争取工资的提高，如果他甘心接受资本家的愿望，接受资本家的命令，把它当做永久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受到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从我以上讨论的各场合——它们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你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在**先前的**各种变化之后发生的，是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市场价格的波动——它的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与工业周期的各个阶段相适应——这些先前的变化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是劳动对资本的先前行动的反行动。你们讨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如果不顾这些情况，如果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引起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你们就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只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14. 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及其结果

(1)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性地反抗降低工资，周期性地力图提高工资，这是同雇佣劳动制度密不可分的，而且还受下述事实的制约：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就要服从那些调节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

我还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不会影响商品的平均价格或商品的价值。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劳动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的**市场价格**在长时期内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计算起来，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劳动的价值无非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后者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最后又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极限，虽然是很有伸缩性的极限。它的最高界限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他的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限度有很大的伸缩性。孱弱和短命的后代如果繁殖很快，也可以与健壮和长命的后代一样，使劳动市场维持下去。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利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

大作用，你们可以看一看**桑顿**先生的《人口过剩论》①，他在书中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有高低之分。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只剩下**生理上的界限**。在**反雅各宾战争**[33]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尸位素餐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我们在前次会议上曾谨慎地谈到的那些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数却由**济贫法**[37]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

这种比较也可以证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没有一条规律能决定其**最低限度**。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却不能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工作日既然有界限，**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工资既然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

①即《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编者注

就与工人体力所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以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为界限。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至于谈到**限制工作日**，在英国像在其他各国一样，向来只靠**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从外部经常施加压力，这种干涉永远也不会实现。无论如何，这种结果决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协商所能获得的。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它的确定实际上总是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我指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一些殖民地国家，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资本在这里可以施展全力，却不能制止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民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他们迟早总会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作为母邦的不列颠政府曾一度采纳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将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老的文明国家。例如，以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的提高为例。其结果如何呢?农场主们没能——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想必劝告过他们——提高小麦的价值，甚至没能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反而不得

不听任其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在这11年中，他们采用各种机器，应用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牧场，增大农场的面积，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和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农业人口又相对过剩了。这就是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满居民的国家迟早要采取的对付增加工资的一般方法。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是经常和劳动竞争的，并且往往是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时才可能被采用①；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使简单劳动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使熟练劳动简单化，于是也就使它贬值了。

这同一规律还有另一种形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会越来越快。因此，可以推论，像**亚·斯密**——在他的那个时代，近代工业还很幼稚——那样推论，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能保证对劳动需求的增长，所以必然会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很诧异，为什么最近20年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更迅速，而工资却没有很大的提高。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递增的变化**。总资本中包含固定资本即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比用于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的那一部分，总是逐渐递增的。这一规律已经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原来是一比一，这个比例就会因工业的发展而变成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600，其中300用于工具和原料等，其余300用于支付工资，那么总资本只增加一倍，就能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但是，如果总资本600中，

①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479页。——编者注

500用于机器和原料等，只有100用于支付工资，为了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600增至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这一需求是在增加，但是与资本的增加相比，不过是在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为工资水平而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所做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就劳动价格与资本家讨价还价，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做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

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第一,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

第三,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工作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

1898年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Organ der deutschen Volkspartei.

No. 12. Leipzig, den 21. März 1868.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民主周报》作[38]

马克思《资本论》①

一

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

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所以两件物品在生产上花费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因为一般说来，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所以这两件物品就应当能够互相交换。但在同时，它又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积蓄的劳动，它把这种劳动叫做资本；它认为，资本这种东西，由于里面包含有辅助的资源，可以使活劳动的生产率增加几百倍、几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报偿，这种报偿叫做利润。我们大家知道，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蓄的死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到补偿，那么，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么可能呢？工人又怎能得到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束手无策，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指出这一矛盾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在阐述资本时，马克思从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他用他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所投入的。例如，某个资本家以1 000塔勒购买棉花，后来以1 100塔勒卖出，这样一来，他就“赚了”100塔勒。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100塔勒的余额，马

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设,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从抽象的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也是正确的。因此,买进棉花,再把它卖出去,是和一个银塔勒兑换成30个银格罗申和这些辅币再兑换成一个银塔勒一样,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种兑换既不能使人变富,也不能使人变穷。同样,剩余价值是不能由卖者在商品价值以上卖出商品或买者在商品价值以下买进商品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依次作为买者和卖者,这样也就相互抵消了。剩余价值也不能由买者和卖者互相欺诈而产生,因为互相欺诈不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只不过使已经存在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尽管资本家依照价值购买商品,并且依照价值卖出商品,但他获得的价值仍然比他投入的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现代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计量的。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关于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以上各点来说,经济学家先生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

现在,资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工人支出的一定的劳动量会与他一周工资所代表的劳动相等。假设一个

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三个工作日，那么，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三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的、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大的泉源。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随意的假定：工人在三天之内再生产他所得到的工资，其余三天为资本家工作。他是恰好用三天时间，还是用两天或者四天时间来补偿工资，在这里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是随情况而变化的。但主要的是，资本家在他支付报酬的劳动以外，还榨取了他**不支付报酬**的劳动。这决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因为如果有一天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取得的劳动总是与他所支付的工资相等，那时，他就会关闭自己的工厂。因为那时他的全部利润便落空了。

在这里，我们就解决了上述一切矛盾。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的了。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的，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来的少得多。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即**无酬劳动**，构成资本家所得的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资本家阶级所得的部分。因为，拿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赚得的利润，在棉花价格不提高的情况下，仍应由无酬劳动构成。商人要把棉花卖给一个棉纺织厂主，这个厂主从自己的产品中除上述100塔勒之外，还会为自己赚取利润，因此，他是把他所攫取的无酬劳动拿来和商人共分。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员，都是依靠这种无酬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这

种无酬劳动之上的。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无酬劳动只有在现在这种关系下，即在生产一方面由资本家，另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下，才能产生出来，那是荒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组织的占支配地位的形式，奴隶必须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式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第202页①）。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2页。——编者注

二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知道，每一个被资本家雇用的工人都在做双重劳动。他的工作时间的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预付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但在此之后，他必须继续劳动，在这段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便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劳动，叫做剩余劳动。

我们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劳动3天来偿还他的工资，再劳动3天，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这便是在每天12小时的劳动中，他要劳动6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再劳动6小时，生产剩余价值。在一星期中，人们只能劳动6天，就是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只能劳动7天。可是在每一天中，可以劳动6小时，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为了一天的工资，工人已经把这一个工作日卖给资本家了。然而，**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是8小时呢？还是18小时呢？

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一小时劳动，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验到工作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食之外，还能作为人从事其他活动。我们顺便指出，个别资本家是否愿意加入这一斗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善良愿望，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和他的同行合作，而把

工作时间拉得同他们一样长。

为规定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日很少得到遵守。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正常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才是这种情况。在这里为一切妇女和13岁至18岁的男孩规定了10小时工作日（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10小时半，星期六做工7小时半）。同时，因为男工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10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是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所有行业**，至少推广到了一切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部门。关于英国由法律规定工作日的历史，本书包含着极其详尽的材料。下一届“北德意志联邦[39]国会”也将讨论工商业管理条例的问题，因而也将讨论到工厂劳动管理的问题。我们希望德国工人所选举出来的议员，在讨论这种法规之前，没有一个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在那里将获得很多东西**。对于工人说来，德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比从前英国发生同样情况时更为有利，因为**普选权会迫使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如果他们知道利用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首先能够知道资产者所不知道的问题所在的话。而在这方面，马克思这本书把预备好了的一切材料提供给他们。

我们绕过一系列更具有理论意义的非常精彩的研究，只来谈一

谈讨论资本积累的最后一章。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资本家为一方，雇佣工人为另一方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穷困。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不断重新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产品和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不断重新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育出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出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的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第600页[①]）。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不佳或平常的时候，是在他们劳动的价值**以下**被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稳定，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8—709页。——编者注



恩格斯（19世纪60年代）

"社会的财富越大……相对过剩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经常在业的)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经常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贫困与其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第631页[①])

这就是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规律,而官方的经济学家甚至不敢去试图驳倒它们。但是,难道到此一切事情就讲完了吗?决不是的。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3月2日—13日之间

载于1868年3月21和28日《民主周报》第12和13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2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40]

1. 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拥有的权力，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果实的权力**。例如，土地使还在世的所有者有权以地租形式无偿地攫取他人的劳动果实。资本使所有者有权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国家证券所有权使所有者有权不去劳动而靠他人的劳动过活等等。

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力——它只涉及行使这种权力的人的更换问题。同其他所有的民法一样，继承法不是**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这种经济组织的**结果**，是这种经济组织的**法律结果**，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2. 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变为社会所有，那么继承权(就它有某种社会意义来说)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有足够力量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直接**这么做。例如，废除国债，自然就能同时消灭国家证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

工人阶级没有力量来废除国债，试图废除对国家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的。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是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3. 大约40年前圣西门的信徒们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法律结果**，而把它看做这种组织的经济原因。[41]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永久保存下来。他们认为，当然可以有挑选出来的终身所有者，就好像曾经有过挑选出来的国王一样。

宣称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会导致工人阶级偏离对现今社会的真正攻击点。这同既要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现今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荒谬。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

4. 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须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如果私有财产在人们生前已经不存在，那么它就不会由他们并在他们死后从他们那里传给别人。因此，有关继承权的一切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的过渡**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一方面，现今社会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推行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措施**。

从这点来看，继承法的修改只是可达到同一目的的**其他许多过渡性措施**中的一种。

在继承方面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只可能是：

(1)更广泛地征收在许多国家中业已存在的遗产税，把由此得来的资金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

(2)限制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同于**没有遗嘱的继承权**或

家属继承权，它甚至是私有制原则本身的恣意的和迷信的夸张。

卡·马克思写于1869年8月2—3日

载于1869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42]

1871年2月13日于伦敦

公民们：

总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们12月14日的来信。你们7月30日寄出的上一封信，我们也收到了；这封信我们已经交给了西班牙书记，公民赛拉叶，并委托他把我们的答复转达给你们。但是公民赛拉叶不久就到法国为共和国战斗去了，而且接着就被困在巴黎。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你们7月30日的信还没有得到回答，这封信仍在赛拉叶的手上。现在，总委员会在本月7日的会议上授权信末签名人——弗·恩·暂时代理同西班牙的通信，并且把你们最近的这封信交给了他。

我们按期收到了西班牙文的几种工人报纸——巴塞罗那的《联盟》周报、马德里的《团结报》(到1870年12月为止)、帕尔马的《工人报》(到停刊为止)，新近还收到了帕尔马的《社会革命报》(仅仅是创刊号)。这些报纸使我们了解到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社会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

毫无疑问，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正如你们所说的，吸引了人民的过多的注意力，因而给我们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种情

况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中到处都发生过。在法国，在英国，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曾经不得不，而且现在也还不得不同旧政党的影响和活动作斗争，而不管它们是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党。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议；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

我们高兴地知道你们想把你们国家的各个支部的会费转给我们，我们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笔会费。给我们汇会费时，请向伦敦的任何一个银行家开具汇票，抬头写上我们的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的名字，并用挂号信寄给信末的签名人，地址是：伦敦海-霍耳博恩街

256号(总委员会驻在地),或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私人住址)。

我们还很感兴趣地等待着你们答应寄给我们的那份关于你们联合会的统计材料。

至于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当前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是无从考虑召开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复——这是很可能的——,总委员会马上会研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会考虑你们提出的在巴塞罗那召开代表大会的友好邀请。

我们在葡萄牙还没有支部;同这个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这对你们来说也许比我们容易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你们就这件事再写一封信给我们。同样,我们相信,如果你们能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联系,以后把所取得的结果告诉我们,那是比较好的,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现在,如果你们能给我们寄一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来看一看,那你们就给我们的事业帮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有益的忙。

在其他各国,国际运动虽然障碍重重,但是仍在继续发展。在英国,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联中央理事会(Trades' Councils)不久以前已经直接加入我们的协会,通过它们,这个国家的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们的协会了。在德国,我们现在正受着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和一年前我们在法国所受到的路易·波拿巴的迫害是一样的。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其中已经有50多人被投入监狱——真正是在为国际的事业受苦;他们之所以被逮捕和受迫害,是因为他们用全部力量反对侵略政策,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友好。在奥地利,我们的许多朋友也被关在监狱里,但是运动还是在发展。在法国,我们各地的支部都成为反抗侵略的灵魂和力量;它们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夺得了地方政权;里昂、马赛、波尔多、图卢兹都发挥了在其他地

方没有见到过的力量，这应当完全归功于国际会员的努力。在比利时，我们有强大的组织；我们的比利时各支部刚胜利地开过自己的第六次地区代表大会。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们各支部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看来开始平息下去。我们从美国又接纳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亚人）支部，此外，我们同一个很大的美国工人组织——劳工同盟（Labor League）[43]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们的新消息，向你们致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弗·恩·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2月13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44]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THIRD EDITION, REVISED.

Printed and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by

EDWARD TRUELOVE, 256, HIGH HOLBORN.

1871.

Price Twopence.

《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的扉页

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导言[45]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最重要的几点。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①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46]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难道这个预言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难道我们不是又经受了20年的俾斯麦统治？对蛊惑者的迫害[47]不是换成了非常法[48]和对社会党人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的迫害，警察不是专横如故，法律不是同过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兼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兼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20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前常为“神圣俄国”卑恭效力之时?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的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1 500万或2 000万武装士兵的蹂躏；这场战争之所以还没有爆发，只是因为连最强的军事大国也为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证明国际在1870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远见性的光辉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49]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能保证他们的政党取得统治地位的选举改革。[50]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走在前面。可是，这些阶层的背后是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比资产者，甚至比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打起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国，而且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工人并企图把失业者流放到

边远省份去，逼得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18]。政府早已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保证了压倒优势。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当时不能，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51]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第二帝国开创了这样一种局面：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先前在路易-菲力浦的目光狭窄、畏缩不前的体制下，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干这些事情的人麇集在皇帝宫廷周围，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

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又经削割的疆界内，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而扩大疆土，再没有什么会像朝德国莱茵河左岸扩张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法国沙文主义者了。莱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宝贵得多。只要第二帝国存在，要求收回——一下子收回或是一块一块地收回——莱茵河左岸地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指望获得“领土报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麦的亏，吃了他自己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亏，除发动一场战争之外也就别无他法。这场战争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52]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53]。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门口；帝国的那些军队不是被死死地围困于梅斯，就是在德国当了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由于这时所有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保卫国家而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从而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人民就更欣然地同意组成这样的政府。但是此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背叛，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释放；而为了避免在遭受外敌围困的城内引发内战，人民仍然让原有的政府继续执政。

终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武装解除了，战

斗团和别动队交出了武器，被视为战俘。然而国民自卫军却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实行了停战。胜利者不敢耀武扬威开进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而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却处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之中，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让全部帝国军队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那样敬畏。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可是现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54]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军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期间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开始。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为止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免除了从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转做以后的预付租金，并且停止变卖市立典押借贷处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

和国的旗帜”[1]。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 000法郎(4 800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2]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扣压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137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决定是在5月16日执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订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还取消了从第二帝国时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于剥削工人之道的家伙们独家经营的职业介绍所；这种职业介绍所交由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当铺是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权利和进行借贷的权利相抵触。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社委

---

①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载于1871年3月3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0号。——编者注

②指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1871年5月11日发布的命令的内容，见1871年5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32号。——编者注

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制度。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作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断增多的凡尔赛政府大军作战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取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进攻时却被埃德将军击退，伤亡惨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击，而下令开炮的恰恰是曾经指斥普军炮击巴黎为亵渎圣地的人。就是这些人现在乞求普鲁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当和梅斯被俘的法国士兵，好为他们去夺回巴黎。由于这批兵员陆续开到，凡尔赛军队从5月初起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一天，梯也尔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用作为人质关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①]及其他许多神父来交换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但被关在克莱尔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尔改变了的说话口气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慎重而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咄咄逼人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于5月3日占据了穆兰-萨凯多面堡，9日占据了已被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据了旺沃堡。在西线，他们陆续攻占城墙外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一直推进到主墙的脚下；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卖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

①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们得以闯进城内。占据着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准许凡尔赛军队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带向前推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巴黎人想必认为这一地带有停战协定作为保障，因而防守不力。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闯入的敌军越接近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贝尔维尔和美尼尔芒坦的高地上倒下去，这时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机关枪去成百上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伫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杀，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命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比对上司命令更加服从时，往往装做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遭到历史的嘲弄。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只是作为例外——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即对于大工业和大企业，比如对于铁路来说，工人的联合才适用（见《革命的总观念》[55]第3篇）。

其实在1871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规定要把大

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①；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②，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中间丝毫不亚于在"马克思派"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有蒲鲁东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在此以前，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压迫所凭借的力量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机构。正是这支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后来每届新政府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自己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经消除那样。

①参看本卷第105页。——编者注

②参看本卷第158—159页。——编者注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

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 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

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

20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3月18日以前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
第9年卷第2册第28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22卷翻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56]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曾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下，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主张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①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其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下令在巴黎、里昂、鲁昂、马赛、布雷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搜捕国际工人协会各个领导机构的成员，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试图密谋暗杀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57]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

①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罪行究竟何在？就在于他们曾经公开地大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全民投票。不幸，由于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形势发生了逆转。欧洲各国的证券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实际上这是个谋杀的信号，谋杀的对象已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民族。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58]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荒谬得很，全法国都不肯相信当真要发动战争。他们宁肯相信那位把内阁的好战言论斥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①。当7月15日立法团终于被正式告知要打仗的时候，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费用，甚至梯也尔也斥此事为“可憎”；巴黎所有独立的报纸都对此事进行了谴责，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的巴黎会员也再次行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他们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摘引几段如下：

>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在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 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荒谬绝伦的犯罪行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持反对那些自己不付血税却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黩武叫嚣！…… 德国弟兄们！我们彼此分裂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全世界的工人们！不管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并保证忠于牢不可破的团结。”

①茹·法夫尔。——编者注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同样的宣言，我们这里只能援引其中一篇。塞纳河畔讷伊支部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宣言中说：

>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只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拥护国际反对战争的声明。”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不久就发生一件奇事证明了这一点。原先在路易·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帮**换上了工人的衣服，受指使跑上了巴黎的大街去表演战争狂热[59]，市郊的真正工人们当即出来举行了拥护和平的示威，声势异常浩大，以致警察局长皮埃特里觉得还是立即禁止任何街头政治活动为妙。他提出的借口是，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地宣泄了他们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与高涨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进程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从德国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置于必须进行自卫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是俾斯麦恰恰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目的是要镇压普鲁士本国人民的反抗，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吞并全德。假定萨多瓦之役[60]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在德国到处横行。普鲁士在胜利之后，难道曾有过片刻想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普鲁士

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另外又采纳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它的政治面具与财政骗局，它的漂亮言辞与龌龊手腕。波拿巴体制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称雄，如今在河的另一岸又出了个貌似一样的体制。在这种形势下，除了**战争**，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听任目前这场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46]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传播非常广，扎根非常深，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唾弃对法国持民族对立态度的主张。会上通过的决议在结束语中是这样说的：

>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而首先反对的是王朝战争……　我们为即将被迫参加一场无可避免的不幸的防御战争而深感悲痛；同时我们向德国全体工人阶级呼吁：一定要使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灾难不再重演。为此，工人阶级必须争取让各国人民自己都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①

在开姆尼茨，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61]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名义宣布，

①《德国工人对国际宣言的答复》，载于1870年7月22日《马赛曲报》第153号。——编者注

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 我们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向我们伸出的兄弟之手…… 我们牢记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 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背离我们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奋斗的共同事业。"

好极了！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闪现着俄国的阴影。不祥的征兆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发出信号时，正赶上俄国政府刚刚建成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并且已经向普鲁特河方向集结军队。不论德国人在反对波拿巴侵略的防御战争中应该得到怎样的同情，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或者接受哥萨克的援助，那他们得到的同情就会立即失去。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憎的战争进程如何，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开路先锋就是国际工人协会[7]。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尔加思	乔治·米尔纳
马丁·詹·布恩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	查理·默里
考埃尔·斯特普尼	乔治·奥哲尔
约翰·黑尔斯	詹姆斯·帕涅尔
威廉·黑尔斯	普芬德
乔治·哈里斯	吕尔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约瑟夫·谢泼德
勒格廖利耶	斯托尔
W.林特恩	施穆茨
捷维·莫里斯	威·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乔万尼·波拉…………………………意大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23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9—23日

载于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2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62]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①

这样，在军事行动实际开始以前，我们就已经把那个波拿巴泡沫当做过去的事物来对待了。

我们对第二帝国生命力的看法没有错，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②，也没有错。从事实本身来看，防御性战争是到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时告终的。但是还在这些事件之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腐朽透顶的情况刚一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普鲁士军事上的幕后操纵者就决定要打一场征服战争了。不过在他们的面前有

① 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一个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39]国会上发表的御座演说中，曾庄严地宣称，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曾发布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①：

“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昨天和今天一直都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现在**战局**驱使我**越过了法国的国界**。”

威廉并不满足于宣称他只是“**为了打退进攻**”才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以此来表白战争的防御性质，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在“战局驱使”下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除“战局”所要求的进攻行动。

可见，这位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严格意义的防御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违心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他们那帮教授、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个在1846—1870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得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之狮的角色，当然是欣喜若狂。它再次要求它的公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摆出一副逼迫普鲁士政府的样子。逼迫政府干什么呢？逼迫政府接受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切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几

①在马克思翻译并于1870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引文，接下来一直到“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节。——编者注

乎像信奉宗教一样地深信路易·波拿巴永无谬误，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肢解法兰西共和国。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独特论据吧。

他们不敢公然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要塞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毁，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杀害！当然啦！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鉴赏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份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63]。

但是，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理由是，此乃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相比而言)，加上约在巴塞尔和盖默斯海姆之间的半路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筑垒大城市，这就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孚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各个要塞。如果梅斯也被并入，当然，法国两个主要的对德作战基地一时就都失掉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有科布伦茨、美因茨、盖默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这些基地都是用于对法国作战的，并且在这次

战争中都曾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果德国连法国在这一地带仅有的两个还算是有价值的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都不肯给它留下，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况且，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成为与北德意志分离的势力时，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64]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立即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任何时候都能够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阿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办法是：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路易和兰道之间——在这次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并沿美因茨到梅斯的交通线进攻或应战。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么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从侧翼包围和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争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时代错乱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么奥地利就仍然有权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就仍然有权为保护巴黎而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要大。如果国界按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要求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任何一条军事分界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再兼并一些邻近地区的办法加以改善；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地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就各民族来说和就个人来说都是如

此。为了剥夺对方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对方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对方的喉咙，而且要杀死对方。如果说过去有哪个战胜者曾经获取“物质保证”用以摧毁一个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65]，并利用这个和约来宰割普鲁士以及德国其余部分。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烂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曾从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清醒的监护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1792年为了用刺刀镇压18世纪革命这一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的当然不是德国人呀！由于奴役意大利、压迫匈牙利和瓜分波兰而染污了双手的也不是德国人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军事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终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一看到法国的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修筑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波拿巴入侵带来的恐怖景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耻辱却

若无其事。

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同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也和俾斯麦相互作出保证。[66]从前，路易·波拿巴曾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的最高主宰，同样，现在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的最高主宰。当年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如今专制的俄国也定会认为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对它是一个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动摇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话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①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扩张政策的工具②，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③。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做

①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的前面加有“独立”。——编者注

②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这符合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编者注

③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这就是昏聩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国‘保证’的和平前景”。——编者注

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魇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有许多人战死，而回国后还要有许多人穷死饿死①。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白费，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67]。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给法国以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 “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方文明战胜东方野蛮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 我们将忠实地同我们的全世界工人同志们站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而奋斗！”②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制止住侵略者，那么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更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

①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祖国，而工资是由**非爱国主义的国际性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工人阶级现在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工人阶级的名义**来讲话？”——编者注

②《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致全体德国工人！》，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编者注

佳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柔软的材料制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像他们一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①。它不是作为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51]，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18]时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样一些重要据点，而自称共和党的人分到的则是那些说空话的部门。这个政府采取的最初几个步骤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如果说现在他们说了许多大话，以共和国的名义要求去做终归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其目的不是为了组建"可能存在的"政府而掀起一场喧嚣吗？这个共和国在它的某些资产阶级管理者的眼中，不是仅仅应当成为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②，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

①在1870年德文版中是"它在德国刺刀之下空出来的位子"。——编者注

②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职责"的后面加有"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编者注

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68]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为反雅各宾战争，为自己过去承认政变时所表现的不体面的草率态度弥补过失吧。[69]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①。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20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那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共和国万岁！

总 委 员 会：

罗伯特·阿普尔加思	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	凯希尔

---

①在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嚷并不低于德国的爱国者”。——编者注

约翰·黑尔斯
乔治·哈里斯
洛帕廷
乔治·米尔纳
查理·默里
詹姆斯·帕涅尔
吕尔
考埃尔·斯特普尼
施穆茨
威·黑尔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本·鲁克拉夫特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乔治·奥哲尔
普芬德
约瑟夫·谢泼德
斯托尔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乔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威廉·唐森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9月6—9日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印发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那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这样一种迷信，即巴黎在一切历史危机时期负有代表全法国的使命，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足以使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合法化。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①]。但是，当时巴黎处在措手不及的混乱状态下，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关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又已经向巴黎开来，所以巴黎容忍了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能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异是武

①见本卷第127页。——编者注

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乞求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①

特罗胥的这篇美妙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邦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之流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

---

①引自《巴黎每日要闻》，载于1871年3月19日《费加罗报》第74号。——编者注

“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①，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70]，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这批投降派[71]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②。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极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

---

①路·茹·特罗胥《告巴黎市民书。1871年1月6日于巴黎》，载于1871年1月7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7号。——编者注

②《宣言》，载于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第30号。——编者注

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正是这个伪造文据犯在9月4日后刚一掌权，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72]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而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密勒①，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职位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73]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时盗用30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证券投机商，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法文版中是“福斯泰夫”。——编者注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份千方百计地利用饥馑搜刮了大笔钱财。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之日，就是他受制裁之时。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①；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圣日耳曼奥塞鲁瓦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74]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75]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的杰作。[76]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77]震惊了全法国。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首先，对任何一个可

---

①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在英国，普通刑事犯服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发给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出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编者注

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 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78]，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莫发生的事情。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纯系议会语言〉。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身而出，从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79]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的轰击仅限于48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16]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 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

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成为他们泄愤的对象了。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气，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80]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81]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隐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国大业已成。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波拿巴怀有私怨，因为路易·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离开了议会那种人为的气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与：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做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做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82]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赶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83]虽然他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成规。不言而喻，现代社

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眼泪这种东西，他也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得出来。在波尔多的时候[①]，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做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昔日在1830年的众议院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②]

---

①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

②沙·贝累《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公民梯也尔。1871年4月24日》，载于1871年4月28日《口令报》第64号。——编者注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自吹自擂之可笑衬托出其所作所为之可恨。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并且，投降书中的一项条款明确规定，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决定和与战的问题，最后可能还要由它来签订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复活起来[84]。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这个正统派在现代法兰西组阁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动

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演说）来说，

“一向只依靠三种资源：外敌入侵、内战和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党派比这个党派更合适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85]就要重现。真的，法国已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倒转，回到了1816年的“无双议院”[86]①。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党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乡绅议会”[87]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88]。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地方官和地主的议院）”。——编者注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乡绅议会"进行疯狂的反共和国示威活动，而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巴黎面临砍去头颅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89]，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杜弗尔就商业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90]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普耶-凯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报纸被查禁；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又重新恢复；十二月分子维努瓦[91]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92]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凯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笔为数20亿的借款。我们要问：

(1)据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佣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凯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2)据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93]，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种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已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

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是很坦率的。如果乡绅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么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波拿巴宪兵瓦朗坦和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阴谋分子们在狂傲地亮出解除巴黎武装这一真正目的的同时，却以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劣的谎言作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尔说，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事实是这样的：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在投降的时候，俾斯麦的俘虏们一方面签字画押把法国拱手交出，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卫部队，目的毫不含糊，就是为了威胁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除外)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设法把投降派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机关枪运到了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这些武器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哪怕是最蹩脚的借口来对巴黎开战，因

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张胆地撒谎的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正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开端。可是，这次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的承认；还以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得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和他的那帮假释犯们就不得不认降，以便求得一张由路易·波拿巴签发的护身证件，以免长途跋涉前往卡宴[94]。握有全权可以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正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为这次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并且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性命令放下武器，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意味着使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到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手里；或者是必须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法国。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于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冒一切风险抗击法国阴谋分子，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辞。但是，中央委员会极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场内战，因此，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

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造成多大威胁，它仍然坚持采取纯粹防御的立场。

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尔·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梯也尔也已经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现在这些只好都换成梯也尔的一项声明。声明说，他作出了宽容的决定：让国民自卫军保留他们的武器。他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矮子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光荣的三月十八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就是革命的临时政府。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经历的惊人巨变到底是真的，还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出现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孔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81战斗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是他自己的士兵没有射击妇孺而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性，自然不可能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就改变。克莱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处死的。

克莱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

力浦统治的后期进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为这家非常好斗的报纸充当责任代理人（gérant responsable①）和决斗打手的双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让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这是六月屠杀[80]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此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将由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95]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驱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的科西嘉兵[96]——去蹂躏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克莱芒·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eur（精粹）”的计划②。在维努瓦吃了败仗以后，他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其职务是代表报馆坐牢服刑”。——编者注

②克莱尔蒙-托内尔《1871年3月5日的信》，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第21号。——编者注

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个神话。梯也尔先生和乡绅议员们在议会中决不提及此事，只让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时吓得全身发抖。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民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的信号。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97]，都浮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这场惊吓。甚至警察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关起来，反而是巴黎为他们敞开城门，让他们安然撤往凡尔赛。不仅没有触动“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据不止一个据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作风差异太大了，以致“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感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瓦用大炮和机关枪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富人区里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派头十足的人物，队伍里全都是纨袴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著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胆怯地以和平示威游行做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单独值勤的国民自卫军巡逻兵和哨兵，就加以凌辱并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着“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按常规发出sommations（在法国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98]，此措施无效，国

民自卫军的将领①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一摆出他们的“派头”来，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出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99]。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②)。在这帮家伙这次建功立业的现场，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100]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先生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赤手空拳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在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但是现在“下层等级”处理这样的事情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干脆就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又能够纠合在一起，在海军上将赛塞率领下来了一次武装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窜逃凡尔赛收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87]们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容许秩序党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宏的战胜者互道温和的和解之词，可他们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誓，时机一到

①茹·贝热瑞。——编者注

②路·马尔儒纳尔。——编者注

定要将对方消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第二次对巴黎开战。被送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虏，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而厄内斯特·皮卡尔则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由她们的贞(?)女[①]们簇拥着，站在阳台上拍手喝采，欣赏凡尔赛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战斗团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杀。我们英勇的朋友、铸工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加利费——这是个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一篇公告中夸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袭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队长一并杀害。维努瓦这个逃跑者，因发布把在公社战士当中抓到的战斗团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雷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头目们的命的那个弗路朗斯[101]，剁成了碎块。梯也尔在国民议会扬扬自得地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议会里的一个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跛帖木儿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对敢于向他这个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剥夺他们依文明战争原则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救护站中立权也包括在内。再没有比伏尔泰所预见的这种得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②](见附录第35页[③])。

①在英语里，侍候女王、王后、公主等尊贵妇女的女侍称做“贞女”(maid of honour或lady of honour)。这里显然指的是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身边的女侍。——编者注

②参看伏尔泰《老实人》第22章。——编者注

③见本卷第183—184页。——编者注

二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声明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102]。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并未停止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还从未这样痛心地目睹过代表一种堕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堕落的面孔”——所谓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尔和他的内阁里的假释犯那样的人。不过，枪杀俘虏还是暂时停止了一下。但是，当梯也尔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将军们①发现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空洞的威胁，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恕，他们立刻就又开始大批枪杀俘虏，直到杀完为止。躲藏有国民自卫军的房屋，被宪兵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在贝尔-埃皮纳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好部下）开枪一个个打倒在地。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认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尔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委员会证实了此事。当托伦就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乡绅议员们用叫嚷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回答。对于他们“光荣的”军队说来，谈论它的行为就是对它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宣布在穆兰-萨凯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战士和在克拉马进行集体枪杀这种事件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那么容易激动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在外国侵略者卵翼下轰击巴黎、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刚刚才开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对这一切惨象，梯也尔

①指波拿巴派的将军们。——编者注

竟忘记了他曾用议会辞令表白他对自己侏儒之肩所负的重任感到诚惶诚恐，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扬扬得意地说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一片和平气氛），他还不断地大摆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将军们狂饮，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人的鬼魂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

> “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①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

①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①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权从地主手里转到了资本家手里，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转到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手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80]，从而向工人阶级证明，“社会”共和国就是保证使他们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向资产阶级中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秩序党”是一个由占有者阶级的所有相互倾轧的党派构成的联盟，是在这些党派现在公开宣布的同生产者阶级的对抗中形成的。他们合股执政的最适当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他们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个公

①在1871年德文版中是“越来越变成了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变成了阶级统治的机器”；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越来越变成了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权力，变成了阶级统治的机器”。——编者注

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如果说,像梯也尔所讲的那样,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不易分裂"①,那么,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却挖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种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还使国家政权受到制约,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制约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征讨,使它不仅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以越来越大的镇压之权,同时还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国民议会一脚踢开了。"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就是第二帝国。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通过打破议会制度并因而打破政府公开为有产阶级当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最后,它声称它通过为所有的人恢复了国家荣誉的幻觉,而把一切阶级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

①《梯也尔先生的计划》,载于1871年3月29日《形势报》第163号。——编者注

比。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性,恰恰被一心想把这个统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戳穿了。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既是旧政权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社会大本营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抗了梯也尔和乡绅议员们恢复并巩固帝国留给他们的这个旧政权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

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

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103]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翻版。所以，这个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就恰恰被误认为是那最初产生于现代国家政权之先、尔后又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104]的再现。公社体制被误认为是企图把各大国的统一——这种统一虽然最初由政治暴力所造成，但现已成为社会生产的强大因素——化为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105]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公社与国家政权的对抗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这一古老斗争的被夸张了的形式。可能是特殊的历史条件①阻碍了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典型发展，并使得像英国那样的情况能够存在：庞大的中央国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此处有“在其他国家”。——编者注

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为其补充，在乡村里有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为其补充。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控制着乡村，在路易-拿破仑时期，他们对乡村的控制为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取代。现在他们以为公社就是企图恢复他们过去的那种对乡村的控制。事实上，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已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这个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总是喜欢重操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鲁士的市政体制。普鲁士的市政体制不过是1791年法国旧的市政组织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机构降低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上的辅助轮子。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①]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真正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军队”。——编者注

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①]，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

说来也奇怪，虽然近6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劳动解放[②]的高谈阔论和巨著，可是只要工人在什么地方决心由自己来做这件事，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现代社会（地主现在只不过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说话的喉舌，立刻就出来大唱辩护之歌，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还没有发展，它的欺人假象还没有被戳穿，它的丑恶现实还没有被揭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生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

②在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工人解放”。——编者注

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论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发布永无谬误的神谕一般。

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①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②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106]的时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气得浑身颤抖。

---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即有产者”。——编者注

②在德文各版中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

然而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因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107]正是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为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出过力之后，立即被制宪议会毫不客气地交给他们的债主们去任意宰割。[108]但这还不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阶级的原因①。他们感觉到他们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进行抉择。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109]；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事实上，在波拿巴派和资本家这样一些高等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真正的中等阶级秩序党就以共和联盟[110]的形式出现，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胡编乱造，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峻考验，将来自有分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111]，这是完全正确的。炮制于凡尔赛、由光荣的欧洲报界文丐一传再传的所有谎言中最惊人的就是：乡绅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

---

①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唯一原因”。——编者注

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112]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45生丁的附加税[113]，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54]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相反，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教士的薪俸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这些都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处。所以这里用不着细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更复杂但极重要的问题，例如：农民那小片土地负担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抵押债务，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因此而与日俱增，农民的土地恰恰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农场经营的竞争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剥夺。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第二帝国则是秩序党[81]的作品。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114]，都是明目张胆压迫农

民的措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派，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现在拿破仑的身上。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迅速破灭的（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对乡绅议员是不利的）错觉，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视所具有的号召力呢？

乡绅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所以他们才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以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同时又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普鲁士军队使法国的两个省归属于德国，而就在这支军队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

第二帝国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骗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对法国人民的掠夺。甚至此时此刻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叛变而招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又同外国侵略者勾结挑起了国内战争，它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隙找到了机会来表现它的爱国热情，其表现方式就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国的德国人。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①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替俄国干坏事。公社则

①莱·弗兰克尔。——编者注

请波兰的英雄儿子①荣任巴黎捍卫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公社所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的面，另一方面当着由波拿巴派将军们率领的波拿巴军队的面，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115]。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这类措施是：不让面包工人做夜工；用严惩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雇主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法警于一身，而且以罚款饱私囊。另一个此类的措施是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而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是与围城状态相适应的措施。鉴于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们在欧斯曼庇护下掠夺了巴黎大量钱财，公社要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充足万倍。霍亨索伦家族和英国的政治寡头们的财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夺教会得来的，而公社从没收教会财产上仅仅得到8 000法郎，他们对此自然是大为震惊。

凡尔赛政府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对付公社。它在全法国压制言论自由，甚至禁止来自各大城市的代表举行集会；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地区设置暗探，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宗教裁判官似的宪兵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检查巴黎的一切来往信件；在国民议会中，谁如果斗胆要替巴黎说句话，立刻就会被呵斥住，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86]里也未曾有过；

①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

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做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

就在乡绅议员[87]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怀抱里去的时候，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洛朗教堂的秘密[116]，这实在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将大把的大十字勋章随意掷给波拿巴派将军们以表彰他们打败仗、签降书和在威廉堡卷香烟[117]的本事，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讽刺。公社把一个只是因为无支付能力而在里昂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①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那位伪造文据犯茹尔·法夫尔——他当时还在做法国的外交部长，还在向俾斯麦出卖法国，还在向比利时的那个模范政府发号施令——难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吗？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要挤进来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忠诚的幸存者，他们对当前的运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纯粹是由于传统力量，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空喊家，他们年复一年地用老一套的刻板语言大骂

①让·普里尔，教名布朗舍。——编者注

现政府，从而骗取了第一流革命家的名声。在3月18日以后，确实也出现了上面说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碍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同以前这种人阻碍各次革命充分发展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的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118]、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大贵族麇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 “我们再也听不到杀人、偷盗和人身袭击事件；看来真好像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带到凡尔赛去了。”①

荡妇们已经跟在她们的庇护者——那些家庭、宗教、尤其是财产的卫士们的屁股后头跑掉了。没有了荡妇们，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古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

与巴黎这个新世界相对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看看这个旧世界吧——这是个由来自所有死亡了的旧体制的食尸鬼组成的议会。

①保·拉法格《巴黎访问记。4月7—18日》，载于1871年4月24日《波尔多论坛报》。——编者注

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民族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51]。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陈腐的共和派。这些共和派以出席国民议会来表示他们对奴隶主叛乱的支持；他们把他们的议会制共和国得以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充当着共和国首脑的老骗子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可笑地学着1789年的样子，在Jeu de Paume①举行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死亡事物的议会，只是靠着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是出自梯也尔之口的谎言。

梯也尔对塞纳-瓦兹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②

他竟对这个议会说，"它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③；他对他的杂牌军队说，他们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优秀的军队"；他对外省说，传言他下令轰击巴黎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④

---

①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网球场，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编者注

②阿·梯也尔《致市长、副市长、市参议员大会委员会的声明》，载于1871年4月28日《号召报》第684号。——编者注

③阿·梯也尔《1871年4月2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29日《号召报》第685号。——编者注

④《梯也尔先生的通告》，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第21号。——编者注

巴黎公社战斗行动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后来他又对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向它开了几炮。”①

他对巴黎大主教②说，硬说凡尔赛军队曾执行大批处决和进行报复(!)，这全是胡扯。他对巴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可憎的暴君压迫下解放出来”③，说公社的巴黎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群氓”的真正的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s[119]的巴黎，男女闲荡者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无所事事者的巴黎。这个巴黎目前正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痞、荡妇麇集在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的消遣，它从望远镜中观赏战斗的场面，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娼妇们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上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精彩得多。被打死者真的死了，伤者的惨叫声也是实实在在的惨叫，而且这整个事件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意义④。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逃到科布伦茨[120]的那帮人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

①《市镇通报……》，载于1871年5月6日《号召报》第692号。——编者注

②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③阿·梯也尔《关于穆兰-萨凯的公报。1871年5月4日于凡尔赛》，载于1871年5月6日《号召报》第692号。——编者注

④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具有何等的世界历史意义啊！”——编者注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的占领来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图制服巴黎，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政府并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出逃。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对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战斗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去增援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121]，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佩戴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呼喊着“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122]、瓦朗坦手下的宪兵以及皮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这支军队要不是补充了一批批的帝国被俘兵员，那就会毫无用处而令人觉得可笑。俾斯麦准予放回被俘兵员的人数，刚好既够打内战之用，又足以保持凡尔赛政府对普鲁士的屈从和依赖。真正打起来，凡尔赛的警察还得照应凡尔赛的军队，而在一切危险的地方，都是宪兵打头阵，拖着军队前进。陷落的炮台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凭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巴黎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

与此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没有接到一份可以

使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高兴的表示拥护的宣言。恰恰相反。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团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坚决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宣言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给国家的检察官们的通令中命令他们把"呼吁和解"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下令在4月30日按照他自己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镇法在全国进行市镇选举。一方面有他那些省长玩弄阴谋手段，另一方面有警察机关进行威胁恫吓，这使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外省作出的裁决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前所未有的道义力量，并且他最终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的这场在他自己的公报中备受赞美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表演一出和解小戏。这出小戏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诱骗巴黎的中等阶级分子，而最主要的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够以对梯也尔的信任掩盖他们对巴黎的背叛。梯也尔在3月21日，即在他还没有军队的时候，对国民议会声明说：

>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站起来说：

>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我坚决维护它。"①

①《梯也尔先生的宣言》，载于1871年4月1日《爱尔兰人报》第13卷第39期。——编者注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123]，而他的乡绅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要把它淹没在狂吼声中。他作出这番勋业之后，就把“既成事实”降低为假定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明目张胆地破坏法律，准许他们在德勒从事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们无休止的会见当中所作出的让步——尽管谈话的口气和腔调总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变化——实际上从来没有超出这样一个承诺：将来的报复对象仅限于：

“那一小撮与杀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有关的罪犯”，

而且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巴黎和法国要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就是最好不过的共和国，就像他在1830年对待路易-菲力浦那样。然而，就连这种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进行的官方解释而使之暧昧不明。不仅如此，他还让他的那位杜弗尔行动起来。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在历次戒严时期都充当最高法官；如今1871年梯也尔掌权时是如此，1839年路易-菲力浦在位时和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也是如此[124]。他在不担任部长职务时，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以反对出自他自己之手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现在他不仅赶快在国民议会通过一批镇压性的法律，以便在巴黎陷落后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125]，他还把对他说来太缓慢的军事法庭审判程序加以简化[126]，并且新炮制出一部严酷的流放法，以此预示巴黎未来的命运。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没有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机的统治。乡绅议会甚至还不敢暗示巴黎人不是造反者而是杀人犯，所以它只得把将来对巴黎

进行报复的手段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和解滑稽剧不是按照他的意图引起乡绅议员[87]们的一片怒吼声,他的这出滑稽剧就演不下去了。那些乡绅议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既没有领会这套把戏,又不懂得玩弄这套把戏非用伪善、狡辩、拖延这样一些手法不可。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做了一次精彩的和解表演。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讲假惺惺的漂亮话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说道:

> "只有巴黎的阴谋是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巴黎的阴谋迫使我们让法国人流血。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邪恶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通过和平协议停止惩罚,只有那一小撮罪犯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大喊大叫地打断他讲话的乡绅议员说:

>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遗憾吗?忍心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这一番自以为像海上女妖歌声那样动听的议会讲话置若罔闻。在法国尚存的35 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议员中,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51]总共还占不到8 000人。在后来的补充选举中他们更是受到绝对的敌视。这样,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迫切需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连最后一点道义力量,即作为这个国家普选权体现者的资格也丧失了。而意味着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议会给凡尔赛的这个篡权的国民议会以公开的威胁,即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国民议会。

对俾斯麦而言，期待已久的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向梯也尔发号施令，要他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签订最后的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地遵从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出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并以普耶-凯尔蒂埃做他的助手。普耶-凯尔蒂埃是鲁昂"鼎鼎大名的"棉纺厂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奴颜婢膝的拥护者，对他说来，第二帝国是无可挑剔的，只有一事例外，即帝国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127]。他在波尔多刚一当上梯也尔的财政部长，马上就抨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试图——虽然未能做到（因为做此盘算时没有请示俾斯麦）——立即对阿尔萨斯实行旧的保护关税，据他说那里没有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妨碍这样做。此人把搞反革命看做在鲁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注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完成他最后的卖国大业吗？

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一到法兰克福，盛气凌人的俾斯麦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他的条件里有这样的内容：缩短战争赔款分期交付的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继续占领巴黎各炮台，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主宰者。作为回报，俾斯麦愿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不食言，他把赔款第一期交付时间推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在和约上签了字；5月18日，他们就让凡尔赛国民议会批准了这个条约。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返回这一段时间，梯也尔觉得

更加需要把他的和解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为血洗巴黎而进行的准备。直到5月8日，他还对一个主张和解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决定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唯有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他为此诺言而遭到乡绅议员们激烈质问时，他避而不作任何解释，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缺乏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这些人还得再忍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那时就会有与他们的勇气和能力相称的任务了。”

当麦克马洪刚刚有把握向梯也尔保证很快就进入巴黎时，梯也尔立即对国民议会宣称，他

“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要向那些牺牲了士兵生命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彻底讨回这笔债”。

当决定的时刻临近时，他对国民议会说：“我将毫不留情！”他对巴黎说，它末日将临；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说，政府准许他们任意向巴黎复仇。最后，在叛徒已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的情况下，梯也尔于5月22日向乡绅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无论如何也悟不出的他那出和解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

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80]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三头执政的时代[128]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大规模地处决公敌，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恐怖景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种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绘的另一副更加丑恶的面貌吧。

伦敦的一家托利党[129]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 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

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①

爱德华·埃尔韦先生在曾被公社查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有些太轻佻了，我们担心以后还会越来越糟。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这实在不协调，令人难过；要是我们不想被叫做堕落时代的巴黎人，就必须消除这种现象。”②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佗的一段话：

“可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堕落和腐败的罗马就又开始沉湎于毁坏其躯体、玷污其灵魂的酒色之中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 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酒楼)。”③

埃尔韦先生只是忘记说，他提到的“巴黎居民”仅仅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蜂拥返回的那些francs-fileurs[119]，也就是已经“没落”的那个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战胜了为实现美好新社会而献身的斗士时，都要把牺牲者的呻吟淹没于在世界各地都可听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诽谤声中。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那帮“秩序”恶狗变成了地狱。这一惊人巨变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看来证明了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阴谋反对文明！为

①1871年6月2日《旗帜报》第14613号刊登的《暴动之结局》，这段话转引自爱·埃尔韦发表在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的文章。——编者注

②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编者注

③塔西佗《历史》第3篇第83章。——编者注

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数目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战斗。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不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是一小撮罪犯篡夺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恶魔把她们变成了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两个月内表现得十分温和宽厚，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在保卫战中则表现得英勇无比。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两个月内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温和宽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盖其凶残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在垂死挣扎时发泄出来！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对无产阶级刀砍斧劈，那他们就休想在得胜后回到他们的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这是纵火！"同时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远在穷乡僻壤的走卒，要他们在各个地方把它的敌人都当做专事纵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

有的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实行"杀、烧、毁"，这是不是准许纵火？英国军队随心所欲地火烧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130]，这是不是纵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沙托丹那样的城市和无数村庄，这是不是纵火？梯也尔炮轰巴黎达六个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这是不是纵火？在战争当中，火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样，也是合法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敌人不能利用这些房屋来进攻。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中，

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这个道理竟不适用！公社严格地把火用做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为了封锁欧斯曼特意为便于开炮而打通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使凡尔赛军队无法进入；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而凡尔赛军队使用火炮却是为了进攻，他们用炮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少。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直到现在还有争论。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杀害俘虏时，才使用火。再者，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131]。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为此，特罗胥还给它准备了煤油。但它这样说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却十分爱惜他们自己在巴黎的住宅。而另一方面，梯也尔已经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当他这边刚一把军队准备好，同时普鲁士人那边刚一把各出口截断，他就立刻宣布说："我决不会手软！抵罪要彻底，审判要严厉！"如果说巴黎工人的行为是汪达尔行为[132]的话，那么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行为，而不是在胜利后干出的汪达尔行为，如基督徒对待异教世界真正无价的古代艺术珍品所采取的那种行为。就是这后一种汪达尔行为，也有历史学家为之辩护，他们认为这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夷为平地的那种汪达尔行为！

可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①为首的64个人质啊！资产阶级及其军队在1848年6月恢复了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这一早已绝

①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迹的战争惯例。自此以后在欧洲和印度，凡是镇压民众动乱的时候，就都不同程度地严格照此野蛮惯例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曾恢复扣留人质的做法——硬要一些无辜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为负责。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133]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难道连这一遏制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暴行的最后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装装样子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元凶是梯也尔。公社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而且还加上许多个教士，来交换当时被梯也尔扣押的布朗基一人。梯也尔顽固地拒不接受。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为死尸之后对他最有用。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的先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不就是通过污蔑起义者是杀害大主教阿弗尔的凶手而掀起了一片义愤填膺的喧嚣吗？他们心里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枪杀的。当时在场的大主教的代理雅克美先生事后立刻向他们提交了证词。

秩序党在他们的血腥闹宴上总是少不得要对自己的受害者大肆诽谤一番。这一切诽谤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已把自己看做旧封建主的合法继承人。旧封建主认为自己用任何武器镇压平民都是正当的，而平民拥有武器，不论什么样的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利用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内战来镇压革命的阴谋，即我们所一步步追述的从9月4日这一天起直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卢门为止的这场阴谋，以巴黎的大屠杀告终。俾斯麦满意地望着

巴黎的废墟。当他还只是1849年普鲁士无双议院[134]中一名普通的乡绅议员时就盼望着把大城市都加以消灭。现在他大概认为巴黎变为废墟就意味着他的这一愿望的初步实现。他满意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被消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政治家一样，目光短浅，看到的只是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历史上何曾有过战胜者不仅为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还充当受雇杀手以求胜利完美无缺这种怪事？普鲁士和巴黎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约，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扮演了杀手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怯懦的杀手，因为这不会带来危险；它是一个受雇的杀手，因为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后要付给它5亿行凶酬金。这样，上天为惩罚不信神的荒淫堕落的法国而授命虔诚的仁义道德的德国进行的那场战争，其真正的性质终于暴露无遗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法学家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未能提醒欧洲的那些“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傀儡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各国之公敌，却只是促使它们去琢磨要不要把为数很少的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受害者送交凡尔赛的刽子手！

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如今被证明不过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意在延缓阶级斗争，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骗人的东西也就会立刻被抛在一边。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

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135]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军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显示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可是它们却大骂国际工人协会，把这个与之对立的、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说成是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梯也尔指责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自己却装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将法国的国际会员同国外的国际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切断；梯也尔的1835年的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所有文明国家政府的大事。乡绅议员们对国际狂吼，全欧洲的报刊都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这样说：

>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最刚毅的人物……　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正面意义上的狂热**。”①

在颇有几分警察头脑的资产阶级心目中，国际工人协会[7]自然是以密谋方式活动的，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个国家制造事端。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

①让·罗比耐《有关法兰西和巴黎当前局势的政治笔记》1871年伦敦版。——编者注

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虫生活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总 委 员 会：

马·詹·布恩
G.H.巴特里
德拉埃
阿·埃尔曼
弗·列斯纳
约·帕·麦克唐奈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
罗奇
吕尔
奥·赛拉叶
阿尔弗勒德·泰勒
弗·布拉德尼克
凯希尔
威廉·黑尔斯
科尔布
罗赫纳
乔治·米尔纳
查·米尔斯
普芬德
罗沙
萨德勒
考埃尔·斯特普尼
威廉·唐森

通 讯 书 记:

欧仁·杜邦……………………………… 法国
卡尔·马克思…………………………… 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 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 瑞士
P.乔瓦基尼 …………………………… 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 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 波兰
詹姆斯·科恩…………………………… 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 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5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附　录

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脸朝马路站成四五排。将军加利费侯爵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端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审视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不再多问就被赶到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个小队……　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官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指给加利费将军，告诉他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跪倒在地伸出双手，用痛切的言语申诉自己的无辜。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毫无表情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édie）’……　在这一天，谁要是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别是有一个人，我发现他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受过伤的鼻子而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　这样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然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挑出的人则被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开始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响，历时一刻钟以上。这是把那些被仓促定罪的不幸者处决了。”（《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位加利费，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战时曾有法国的“毕斯托军曹”之称。

“《时报》——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可怕的消息，说有些人被枪击并未当场毙命，在气绝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圣雅克-

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埋了很多人,有的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无所察觉,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常被隐约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早晨,他们看见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因此,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 我丝毫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证实。布吕内尔同他的情妇一起于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一直放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救护站。虽然她身中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旗帜晚报》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136]:

致《泰晤士报》编辑

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先生向欧洲各大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呼吁它们清除国际工人协会。只需三言两语就足以说明这个文件的性质。

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①成立的。茹尔·法夫尔出于他个人的目的,把国际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说他引证了"他们〈国际〉1869年3月25日的传单"。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7页。——编者注

传单。这种伎俩，当他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律师，替那家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作辩护时，就曾经采用过。当时他假装宣读从卡贝的小册子里摘出的一些话，实际上他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属于国际的。例如，他说：

>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样一个文件。相反，它发表了一个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尔·法夫尔引证的那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①。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也装出一些反对帝国样子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帝国检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谈怪论来反对国际，这些奇谈怪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②，谴责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的——由总委员会发动一次反对俾斯麦、支持国防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及共和国。鉴于茹尔·法夫尔预计前来伦敦，有人做了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这当然是出于善意，然而却违背了总委员会的意愿。总委员会在它9月9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须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

①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113—119、120—130页。——编者注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通告，谈一谈茹尔·法夫尔，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①，那么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先生，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6月24日)作为虔诚的告密者在玩弄其他许多类似的把戏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为国际的文件加以引证，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还更完整。而且此事发生于上述的反驳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11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说：所有耶稣会[92]会士中最坏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稣会会士。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月中旬—5月底

1871年6月中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①见本卷第133—134页。——编者注

《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公　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事件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图卢兹等地曾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137]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人侵和完成九月四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95]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当时运动的其他领袖们相信了这样一些言而有信的人,这些人当时曾信誓旦旦地答应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脱以后就遭到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的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未经过一次笑剧般的全民投票。[138]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省事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唯一不愿食言的人①去职的

①弗·塔米西埃。——编者注

机会,任命克莱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干的事同科西嘉兵替路易·波拿巴干的事一样[96];对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说来,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利用中等阶级对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惧怕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制造一个盲目行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为保住他们篡夺的政权所一贯使用的手法。既然他们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像反动恐怖时期那样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建成公社(当时,法国各大城市已开始组建,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激情,就像目前巴黎的英勇战斗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高举19世纪的社会革命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的战争。结果就可能像电流似的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者群众,而不致使得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①被派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10月31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场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月4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②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国得以恢复,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是在其敌人领导下战斗——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这个共和国,而且,这一革命在工人阶级中正逐步深入人心。共和国不

①阿·梯也尔。——编者注

②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再是一个过去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狡猾的律师和花言巧语之徒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在世人的眼前加以遮盖，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伏时起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时伏时起的运动中也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都被国防政府的阴谋诡计和"投降计划"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破坏而流产了；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建成，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命力的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仅仅看做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军奋战。

国防政府只是作为在初遭意外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出于战争的需要才被容忍存在的。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除了波拿巴体制的台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掀起的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对阴谋家们首次告捷的，但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71]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和大炮是他们的财产，而且

正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会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投降普鲁士之机同时达到控制巴黎的目的。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加在他们头上——就是派4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30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派这4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83])巴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以现行军事组织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政治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组织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委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委派总代表即军团首长，由他们来代表1个区，和其他19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仍在坚守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但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的种种劣迹、因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出名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网罗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教会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特权;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公职人员代替封建显贵,把掌握在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实行系统分工和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计划调节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进行专制君主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也就是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国家政权的范围和特权,增加它的机构,提高它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苍天及天上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同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139]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

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1848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要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甩掉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战果。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它还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借以打出国门，为法国的利益在大陆上建立一些大体与法国相仿的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暴力阶级统治的手段，而且还成为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在1848年革命斗争时期，它终于充当了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已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它已经无须再使用旧欧洲为反对1789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武装同盟这样的借口了。它不再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政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就是第二帝国：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

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表面看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只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身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用这种统治形式加以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屈辱，也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屈辱。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即集权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迫把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

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谓的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当做求解放的法宝来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的幻影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的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可能形式。它虽然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遭到剥夺，但它却使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切恶行丑事得以大肆泛滥。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被动地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充当了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那最后一次胜利的经济基础。无产者对全社会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农民的被动的支持同无产者进行的主动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其最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在反对无产者的斗争中诞生。摧毁它的也正是无产者，但无产者摧毁它，并不是把

它当做集权化政府权力的某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的、被故意弄得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因而也是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从头到脚污点累累，其集中表现是：在国内腐败透顶，在国外极端无能。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它的最后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它的那个帝国，正是它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也如法炮制——但那只是滑稽剧而已，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死亡，工人革命当然不是要把它从死亡中唤醒。

但是，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其后果就是行政权即国家政府机器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摆脱它的敌人的政府而得到解放…… 为本

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政权(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140

(人民只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一下子既消除这样一个捐税与国债之源,也消除这样一个一直存在着的危险,即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僭取政府权力。)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并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维持耗资巨大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血税,使农民不再成为所有国税和国债的不竭泉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向往**,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独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恶棍。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领干薪的人,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240英镑;按照一位科学界大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借口国家机密和国家

权利玩弄的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他们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所得报酬就像弥尔顿写《失乐园》一样只是几个英镑；他们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混乱局面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论公社的各项具体措施多么可贵，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还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论点。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陷于敌人之手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但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袭击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将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将代替常备军；国家寄生虫大军将被搬掉；教师将代替各级僧侣；国家法官将换成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

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劳动的解放**——公社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实现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厉行节约,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

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　　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交付。**”①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交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么,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捐税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通过经手这笔生意牟利。由谁来清偿战争费用,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

①引自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交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载于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阶级的利益。首先它代表的是**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87]们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争捐税就会转嫁到农民的肩上。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跟着"乡绅议员"们叫喊什么他们——大土地占有者——代表农民,而农民当然心地质朴,迫不及待地要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10亿革命赔偿金[112]的好"地主们"再交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些人对农民增收了45生丁的附加税[113],蓄意以此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转嫁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81]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于农民之身。秩序党要派税吏死死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让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抓住他们那小块土地的典押债魔的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勤务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一整张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继续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神职人员的薪俸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强制征收,而是由他们依自己的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帝国则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隐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制定的各项反动法律[114]，其核心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么，政变之后，法国一些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则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帝国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基础之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乡绅议员"、城堡领主、榨取10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占有者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时期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乡绅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就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

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权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那时它还是现实的，还是一种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现在，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过时。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大量的小额勒索，这一切使得他们沦落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从而沦为农村无产者。因此，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

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喽罗门客、国家寄生虫、暗探爪牙、“荡妇”，以及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之补充的下等**流氓**（普通刑事犯）跟随下，离开了巴黎（演出了一幕“出巴黎记”①）。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显出他们的真正本色。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110]，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凡尔赛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乡绅议员”最害怕的是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

①这里显然是套用了《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的标题。——编者注

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中,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随即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108]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显示出它同时也是债权人即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债权人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①。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挥霍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证券投机商、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73]之类诈骗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它在精神上则被帝国的奢靡腐败之风所激怒。战争中的丑闻丑事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

①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编者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粉碎了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普选”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这样一种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粉碎了关于“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剥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另外那种共和国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51]——联合起来进行的**隐名**恐怖统治，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这是阶级的**隐名**恐怖统治，在完成其肮脏使命之后，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

乡绅议会[87]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经过了1848—1851年的试验，经过了镇压巴黎的内战，还是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81]之需要这种形式，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玩弄阴谋的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1848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他们通过镇压六月起义[18]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铺平了建立**隐名**统治的道路为止。1871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到后边，在那里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Salle des Paume（网球场）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141]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他

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不去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种人和乡绅议员们的侮辱，迷恋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哀鸣诉苦，脸面丢尽！

——

工人和孔德

如果说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纷争的时期，那么不应忘记，工人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拒绝。[142]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①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更受欢迎，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秀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

①奥·孔德《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巴黎版第1—6卷。——编者注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受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这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运用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来谋取私利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体面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灵,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粗野的叫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工人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管理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

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一定会坚决背弃社会主义事业的！事实上，工人们并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143]，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144]。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则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所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终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终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

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所创造的那些乌托邦寓言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永远不许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 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自己的胜利，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①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拯救法国，为了使法国免于统治阶级将带给它的毁灭和腐化；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同样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

①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横蛮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使这场防御战争陷于瘫痪；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它还表现于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145]以及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在蓄意对外国人的迫害中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精心制造的运动不是被革命的巴黎一口气就吹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了吗？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①(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拆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115]！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指令

①莱·弗兰克尔。——编者注

下行事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却通过打击本国的阶级统治者而打败了外敌；通过取得世界各国工人之先锋的地位而消除了国界！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爱国主义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乡绅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中央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失去一切生机（使他们丧失活力）。它压制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机能。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既然使外省的全部权势都这样归之于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们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和资本家的巴黎的压制，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落入农民敌人之手的外省权力的压制。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

>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81]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与其说是因为巴黎宣布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因为巴黎这样做就是发出了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4月1日公社《公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 巴黎**放弃了它的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的地位对巴黎说来等于是自我损害——而没有放弃那种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①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全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为法国在思想、道德、行政、经济诸方面的复兴，为法国的光荣和繁荣而战斗、牺牲。”（**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②

梯也尔先生在巡视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个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51]的老角色都已经融入波拿巴派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他们使凡尔赛议会具有了明显的特色，具有了类似路易十八的“无双议院”[86]的性质，具

①1871年4月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1号社论。——编者注

②1871年4月19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载于1871年4月21日《每日新闻》第7793号。——编者注

有了“乡绅”议会的性质。他们十分自负，当然以为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有了外国侵略者的庇护，像1814年和1815年那样，他们的时机终于又到来了。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愚弄。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像1848—1851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隐名”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本派情绪的宣泄只不过给他们那种结伙行为增添喜剧性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里公爵夫人的监狱产婆[75]当他们的总统，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背叛“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①，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干的头一件好事恰恰就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地位”，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领主在本省和本地的权势。他们所要的是在法国实行反动的**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仅仅表现为一个人为机体的统一，而这个人为机体依靠宪兵和红黑军队而存在，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魇一样压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个存在于法国社

---

①路易·勃朗《给〈世纪报〉编辑的信。1871年4月20日》，载于1871年4月26日《每日新闻》第7797号。——编者注

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乡绅们，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中央集权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孔德派的观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财产的现今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预言。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市政体制。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

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二月革命曾被称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宣布那次革命时高呼：“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给贪污腐败以更广阔的舞台！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展现，工人阶级的巴黎是英勇的，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艰巨任务满怀热情！尸体认领处里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荡妇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巴黎的英勇妇女！刚劲的、严肃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胸怀广阔的巴黎！同敌人的野蛮暴行相对照，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

“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曾经把这座巨大城市抓在手里作为自己私产加以利用的这批无用处、无信仰、自私自利的败类。第二帝国的任何头面人物都将无权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①

（4月23日《真理报》）：

“巴黎的个人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

①1871年4月23日《观察家报》第4170号。——编者注

“自从公民自己行使警察职能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接到一次夜间抢劫事件的报案。”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6)公　　社

在色当事件之后，里昂、马赛和图卢兹的工人，都曾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全力加以摧毁。[137]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地发难举事，但一次又一次地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的优秀继承者——以莫须有的理由所镇压。[96]工人们发难举事就是企图以公社代替骗子手的政府。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因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普鲁士帝国的迷梦中惊醒时听到的是巴黎雷鸣般的呼声："公社万岁！"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公告中说：

>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①

①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似的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帖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婢膝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余地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81]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把议会纯粹当做嘲弄对象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权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同样地给一切阶级以屈辱，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不复存在的法国议会所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他们所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什么也没有。

像蟒蛇似的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寄生政府，诞生于专制君主制时代。那时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来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外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18世纪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时期、七月王朝[139]、秩序党共和国时期的各种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苦难更加深重、抵抗更加有组织、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强烈，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个政权把群众现在所处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放心加以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

发展起来。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统治阶级的一个集团手中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146]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16]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用来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内战恰恰是以“秩序”的名义进行的。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只能在第二帝国面前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相互对抗的两大社会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敌视态度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这样一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

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20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147],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证券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为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一切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渊薮。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而普鲁士本身还一心想要把这个充满金钱、血水、污泥的制度在欧洲的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呢。

巴黎工人阶级所必须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必须做的只是不让它复活。

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

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一种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僭权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将不可能存在，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废除，物质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宣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成为私人生活范围之内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随着这一切的实现，精神的压迫



1938年延安解放社和1939年上海海潮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中译本

力量即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的税款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支付于各项公共需要(用于各项公共需要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这样,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5月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48]

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恩格斯公民。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不管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或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大家都承认这一点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放弃派都自诩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

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

弗·恩格斯记录于1871年9月21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49]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①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

①在德文版中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编者注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50]。

根据上述精神，制定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的成立，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①的中心。

第二条　本协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要求，采取使国际协会能够顺利进行活动的措施，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不再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当选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一年来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五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代表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处理各种事务的必要负责人，如财务委员、总书

①在德文版中，在“合作”的前面加有“有计划的”。——编者注

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在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进行联系的国际机关，应使一国工人能经常了解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在统一领导下[1]对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同时进行调查；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以全国性中央机关为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本条规定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并且除非存在法律障碍，任何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均可与总委员会直接通信。

第七条(a)　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

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工人力量的联合，同样应该成为这个阶级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所掌握的杠杆。

---

①在法文版中是“在共同精神下”。——编者注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151]

第八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名与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均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行负责。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得到加入协会的工人的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获得三分之二与会代表的赞同。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事宜，得由每次代表大会上审订的专项条款加以补充。

卡·马克思修订于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约11月6日

1871年11月上半月在伦敦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论土地国有化[152]

地产，即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人，那些法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部论据，我只想首先指出，他们曾千方百计地用**“天然权利”**来掩盖掠夺这一**原始事实**。如果说掠夺曾使少数人获得天然权利，那么多数人只须聚集足够的力量，便能获得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夺回的天然权利。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规定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①。

最后，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②的公认。如果土地私有确实以这种公认为依据，那么，一旦它得不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认可，显然就应当被取消。

然而，姑且不谈所谓的所有“权”，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将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③，这是关于所有权的任何言论都阻挡不了

---

①手稿中不是“稳定性”，而是“承认”。——编者注

②手稿中不是“人类”，而是“社会”。——编者注

③手稿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这句话为：“农

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将会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进行下去,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

我们需要的是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是让一小撮人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就无法满足生产增长的各种需要。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大规模的耕作(即使在目前这种使耕作者本身沦为役畜的资本主义形式下),从经济的观点来看①,既然证明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远为优越,那么,要是采用全国规模的耕作,难道不会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吗?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这就不容争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

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国家控制②,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自然就不可能因个别人滥用地力而减少。

今天在辩论这个问题时,我在这里听到,所有的公民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观点各不相同。③

人们经常提到法国,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起英国的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的确,在法国凡是买得起土地的人都

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的必要性以及机器和其他发明的使用,使土地国有化成为一种'社会必然'"。——编者注

①手稿中"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几个字被划掉。——编者注

②手稿中接着是"由国家出资"。——编者注

③手稿中没有这句话,这句话看来是杜邦加的。——编者注

可以获得土地，但是，正因为如此，土地便分成许多小块，耕种土地的人资金很少，主要依靠本人及其家属的劳动。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它所要求的小地块耕作的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人。他被束缚在土地上，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获得相当少的回报；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除了他活动的那块小天地，他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

农民所有制既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法国无疑不是我们应当寻求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办法的地方。

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这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促使**“地租”**逐渐上涨，反而为土地占有者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靠生产者来养活自己。

1868年，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53]上，我们的一位朋友曾说：

> “科学已判决小土地私有制必定灭亡，正义则判决大土地所有制必定灭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要么必须成为农业联合体的财产，要么必须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决定这个问题。”①

相反，我却认为，社会运动②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

①引自塞·德巴普1868年9月11日在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报告。——编者注

②手稿中不是“社会运动”，而是“未来”。——编者注

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

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①。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政权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②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③目标。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3—4月

载于1872年6月15日《国际先驱报》第1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3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①手稿中不是“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而是“随着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而社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编者注

②手稿中不是“全国性”，而是“自然”。——编者注

③手稿中“人道”一词被划掉。——编者注



弗·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154]



1 April 73.　　Laura Lafargue
der Verfasser

Zur Wohnungsfrage.

Von

Friedrich Engels.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Leipzig, 1872.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s „Volksstaat“.

《论住宅问题》的扉页
上面写有“作者赠给劳拉·拉法格”



1887年第二版序言

本书是我1872年为莱比锡《人民国家报》撰写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时，几十亿的法国法郎涌入了德国[155]；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储存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可供支配的资本和流通中的货币量都突然大大增加，而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德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并且还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尤其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大崩溃[156]，这次崩溃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工业国家。

一个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兴起的城市中，这种住房短缺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经

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现在多半还像慢性病似地继续存在着。

正是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这种急性发作的住房短缺，使当时的报刊上登满了讨论“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在《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后来自称是符腾堡的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让德国工人领悟到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157]当我向编辑部表示我对于刊载这些奇文感到惊异的时候，编辑部就请我对这些文章作一个答复，而我也就照办了（见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在发表这一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发表了第二篇，这里我以埃米尔·萨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书①为依据分析了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观点（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米尔柏格博士先生过了很久以后对我的文章赐予了答复[158]，迫使我不得不进行答辩（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场论战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便到此结束。这就是出过单行本的这三篇文章的产生经过。现在需要出新版，这无疑要再一次归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大增，我在这里谨向它表示最衷心的谢意。

为了出新版，我校订了原著，作了个别的增补和注释，并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②，因为我的论敌米尔柏格博士可惜没有发觉它。

在这次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的事实还是：“20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

---

①指埃·萨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268页。——编者注

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①，顶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进行的进一步的片面化，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notre maître à nous tous。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的纲领，才能够在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隆工人中间占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定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遭到了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最激烈的反对。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隆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7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洪峰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如果说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那么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159]这个小小的核心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党，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无政府主义前辈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主义宣言》②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

---

① 参看本卷第270—271页。——编者注

②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鲁东主义甚至在罗曼语各国工人那里已经最终被排挤掉，既然它按照自己的本来的使命，现在只能供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用来表达其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那么今天何必再来谈论它呢？又何必把这些文章重印出来，重新去批驳一个已经死去的对手呢？

第一，因为这些文章并不仅限于同蒲鲁东及其德国代表进行论战。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这次也是这样。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不仅包含对蒲鲁东关于这个问题所持见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对我们自己观点的叙述。

第二，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不能立即就被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扫除，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历史意义。谁要去多少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就应当去熟悉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革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本书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代表。确切地说，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160]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的愿望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因而我的这部著作仍然适于用来反驳他们。另一方

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也有某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其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变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认为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是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因此，人们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视情况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侩气甚浓的国家里，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八年来反对反社会党人法[48]，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恰好出色地证明他们具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存在着的。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它为了制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但是，近20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解说。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的园圃或田地的所有者；同时，另外还有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份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着房屋和园圃或田地。同园艺业或小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的住房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同机械织机发生对抗的地方，例如在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到处可以见到，而且在某种家庭工业

作为农村手艺扎了根的地方，例如在图林根林山和伦山一带，也到处可以见到。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雪茄烟制作业也已经作为农村家庭劳动而大量出现。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某种灾祸，例如几年前在艾费尔[161]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大声疾呼要引进一种适宜的家庭工业，以作为仅有的解救手段。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工业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种完全的例外才能见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地区；在没有小农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支撑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会见到家庭服装业，它们像在德国一样由真正的农民家庭经营。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国的广大区域内，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当于采用机器以前普遍存在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工业正在发展中的各邦里，曾经是保证劳动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在有些地方还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劳动阶级思想上和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基础。手工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上个世纪中叶在英国和部分地在法国，特别是在纺织工业中，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三十年战争[162]的劫难中，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重新努力赶上来的德国，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从事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织布业，承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赋役的重压，它并没有使从事织布劳动的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农民的那种很低的水平。但是，当时农村工业工人终究

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生活保障。

随着机器的采用，这一切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只是在极少有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这样做。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织工的园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工织机同机械织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决出胜负来。在这个斗争中，特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曾使工人过较好生活的那种状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械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工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的联合劳动以及机器和科学的应用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小园圃、小块田地和他们的织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现在占有房屋和园圃已经远不及那种不受法律保护的流动生活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愿再陷入缓慢地、然而肯定地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工的地位。

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40年代，它通过1848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然而，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大路商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国生产的常轨，暂且带着对英国人说来批量太小、对法国人说来质量太差的商品挤

进世界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好样品后交劣等货的骗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几乎完全失灵；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甚至渐渐促使规矩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从而帮助了在这方面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我国就终于达到了这个地步：建立了大工业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国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生产（只有制铁工业是例外，它的生产大大超过了国内的需求），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

于是，现代工人由于自己占有房屋和田地而得到的“实惠”，就极好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未必能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的工资那样低得可怕。全家人从自己的小园圃和小块田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由于竞争被资本家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占有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在世界市场上在销售一系列小商品方面具有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取自正常工资的扣除部分，并且可以把全部剩余价值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

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够把其余各个工业部门的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这种传统的、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价格，像铅砣一样也把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况且在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取代了旧日的手工业，这里的一般工资水平

也已经压得很低，所以情况变得更糟。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园圃和田地，住房有所保障——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占有住房的工人，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农村中一切灾难的唯一单方！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扩散到德国广大地区，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发展。小农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服装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而他们的牲畜以及厩肥的堆集由于马尔克制度、共有的马尔克地产和强制的轮作制遭到破坏而无法维持，这时小农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产就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制地驱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正像爱尔兰地主的地租一样，德国的抵押高利贷者的利息也无法靠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靠从事工业的农民的工资来偿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波及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境内工业革命波及的地区广阔得多；我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较低，这就使这个革命尤其有必要向广大地区发展。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了这样强劲的发展，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同时这又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进展是平静的、稳健的和不可阻挡的。很清楚，在

德国只有当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也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在比较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决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样去取得工人的胜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革命的首都也就不会像巴黎在上述两个场合那样败于反动的外省。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地区；首都只是后来才被攻克。因此，将来首先发难的恐怕还得是法国人，但是最后解决战斗只能在德国。

然而，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虽然由于广泛发展而成为德国的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同时使德国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化，可是它们本身又不过是进一步变革的准备阶段。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那样(《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第484—495页[①])，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机器和工厂生产也会为它们敲响丧钟。敲响丧钟的时刻看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德国几乎一半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地主大地产——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么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难，那么德国一定会发起攻击，而组成“英勇军队”的农民子弟一定会英勇地助战。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41—553页。——编者注

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小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状态，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安定的、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温床，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继续履行其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想实现他们的理想却带来相反的效果，做出有利于社会革命的事情，那我们是乐于让他们自己去欣赏这个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6年12月底—1887年1月10日

载于1887年1月15和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和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论住宅问题

第一篇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下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某些早已无人问津的40年代的美文学的东西之外——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恰好在25年前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①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及时加以反驳。

目前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谓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阶级住房恶劣、拥挤、有害健康。**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而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

---

①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巴黎版。

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今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支付给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它们所雇用的仆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在这里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①）。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走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争吵和相互欺诈中完成的。因为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完全成为卖主的生存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并不是因为工人有工人这样的特殊身份。相反，只要某种一般程度的欺骗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长此下去就一定会通过工资的相应的提高而被抵消。工人对小店主来说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持有者或债务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编者注

出卖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欺骗对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的伤害要比对富有社会阶级的伤害更厉害，但是这种欺骗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会遭受的祸害。

住房短缺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除，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决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除，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政权曾通过欧斯曼在巴黎利用这种趋势来大肆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但是欧斯曼的幽灵也曾漫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维也纳似乎也感到亲切如家乡。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租房难的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厉害；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不是一种仅仅伤害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就工人阶级而言，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和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必然同样会在经济上受到某种抵消。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是蒲鲁东也归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我们已经说过的决非只是工人问题的住宅问题，并且反过来又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

"**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这完全不对。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房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可利用信贷，尽管他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这个房主本身取得这种信贷。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出现的；他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才能够拿着卖得的钱以住房用益权的买主身份出现，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在这里，不会出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资本家让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其次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可见，这里产生出一个盈余的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增加了。租赁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在承租人那里占了多少便宜，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资本家付给他的劳动的报酬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诈骗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于住房价值的房租时才有这种遭遇。因此，试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种关系。相反，我们要谈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各种调节一般商品买卖，特别是调节"地产"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要计算的是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价；最

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的供求状况。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两倍、三倍、五倍、十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忘记的是，房租不仅应该支付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坏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房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应当逐年分期得到偿还。第二，这里忘记的是，房租还应该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带来的价值增加额的利息，就是说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立刻解释说，这种价值的增加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按理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地产。我们现在就来详谈这一点，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用益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筑房屋的成本价格怎么可能会在50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偿还。他不从经济方面去研究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并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学领域，以求得救。他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每年获得一定款项的“**永恒的权利根据**”。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蒲

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权利根据，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10倍于房屋成本价格的偿还；只有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权利根据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上去了。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学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163]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5页①）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

"租赁合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其必要性就像动物躯体中的血液循环一样。如果这一切交易都能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3—104页。——编者注

平要求来进行，那当然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提到**经济上的法**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五年居然还有人能够用德文把这种混乱的东西发表出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这全部胡说意味着什么呢？无非表明，调节着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实际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径庭，而作者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得到纠正。——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它固有的要求剥削工人的法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对我们说，这并不是**他的**法的观念，我们是否就前进了一步呢？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听任他的“法的观念”自由驰骋，并发表如下一套动人的议论供人欣赏：

“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点，即人们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涡卷走……　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们自己的家园——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造成现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绝对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

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中）正好对18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劳动者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必然首先对当事的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实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到“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的发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园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深切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164]，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手工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生产，却是一种极其可恶的事情，一种本来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小资产者蒲鲁东向往的世界是这样的：每个人制造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如果那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补偿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脚步踏碎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在大工业的一切部门中消灭了单独劳动，并且在较小的和最小的部门中日益消灭着这种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终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

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自己的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在现代工业产品上进行这样的计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个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生产出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

如果蒲鲁东的这种反革命的东西确实能付诸实现，世界是要毁灭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有可能保证获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只要这句话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纯粹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

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

———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重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听到这样的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发生的房屋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形式得到两倍、三倍、五倍或十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某种**权利根据**为依据的，而这种权利根据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权利根据，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对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偿付。如果我们设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得出的结论，那么当然只要有江湖骗子的技巧就可以从口袋中现成地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这里的情形也是这样。废除住房租赁制被宣布为一种必然性，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 “赎买出租住房……　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偿付给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赎买出租住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对转归他所有的住房价值的逐年的分期偿付……　社会……就这样变成由独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

在这位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

息，而就这部分资本又体现为所购买的地产这一点来说，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迫使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亚种**资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购买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中的一种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 "所以，废除住房租赁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崇高的追求**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在集市上的叫卖声一模一样，在他那里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也总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那里的工业规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单独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这里上述设想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着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赎买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按照我们的设想，他成

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6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frac{1}{15}$的所有者。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丽的4层楼上一个相似的房间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刚刚获得了所有权的$\frac{1}{36}$，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个月，承接了上昂格尔加斯街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底层房间不多不少$\frac{11}{180}$的所有权。以后又多次迁移，这是现在的工人时常遇到的情况，于是他又承接了圣加仑一处同样能说得过去的住房的$\frac{7}{360}$的所有权，另外一处在利兹的住房的$\frac{23}{180}$的所有权，以及第三处在瑟兰的住房的$\frac{347}{56\,223}$的所有权——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让"永恒公平"有所抱怨。我们的彼得从各个住房的这全部占有份额中能够得到什么呢？谁会给予他这些份额以恰如其分的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房的其余份额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层的大楼，比方说，有20套住房，在赎买期满和住房租赁制废除后也许要属于散居世界各处的300个部分所有者，那么这样一座大楼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165]，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人的每一劳动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也会对住房的每一份额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各篇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劳动交换市场[166]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房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已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反动的基本观点之上的，这个观点认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

社会100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个人的旧的一成不变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而这种状态无非是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抛回到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涡”真的侥幸被排除了，那么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乏味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年，从而把当代工人又变成像他们的高祖们那样眼界狭隘、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奴隶。

至于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实际实现的内容，现在已经付诸实行了，但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资产者本身倡导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①：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做分期偿付住房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让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尔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套办法，不仅是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明达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军。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使之成为小地产——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成分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固定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

①保·拉法格《生活必需品。二、住宅》，载于1872年3月16日《解放报》第40号。——编者注

用发行小额国债券的办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尔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偿付的小住房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甚至反过来直接危害工人。"①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经济上供求的逐渐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构建未来社会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

①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纳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糟糕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4 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雇主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平地提升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厘**，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厘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　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的生产性”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说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但是他们还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结果不仅能收回他预付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说资本本身有一定的生产性。蒲鲁东照搬这一套关于资本的生产性的说法，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是多么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之中。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的生产性”，无非是说资本（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质。

然而，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嘉许这种“资本的生产性”，而是相反，发现它是破坏“永恒公平”的。它阻碍工人得到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必须把它废除。怎样废除呢？用强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直至最后降到零。那时，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看

来，资本就不再是具有生产性的资本了。

借贷的**货币**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本家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节利率的经济规律同调节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毫不相干，就像同一社会形式中各种规律彼此可以毫不相干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么很明显，对于在本企业中使用大量其他资本家的预付资本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多少，利润率便提高多少。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率决不会真正把所谓“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倒是只会把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调节成另一个样子，并且不是保证工人相对于工业资本家而获得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相对于食利者而获得利益。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这些条件借以获得普遍表现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事实。从这种看不见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必然是纯粹的随心所欲的命令，随时可以用直接相反的东西来替代。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借到钱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视情况按两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钱借给那些不会去打官司的人。况且，这种剥夺资本的“生产性”的伟大计划渊源久远，它同旨在限制利率的**反高利贷的法律**一样古老，然而这些法律现在

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遭到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据说就可以“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读者可以看到，越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越能看出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如果一纸法令**真的**能够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食利者**阶级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资本当做贷款贷出，而他们也必定会自担风险把资本投入自己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但是变化不大。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在现今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一般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应当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在现代社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就整个平均情况来说，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不是的，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难题完全不在这里，难题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来表达）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128—160页[①]）。

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也就废除了。因为，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4—231页。——编者注

“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吩咐人把自己手下的一个一年制志愿兵叫来并对他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那就请你常到我家走走；我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出点什么毛病的。”

那位志愿兵说：“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是哲学博士！”

少校：“这倒无所谓，反正博士就是博士。”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是租金或资本息金——这对他是无所谓的，反正金就是金，博士就是博士。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由下述几个部分构成：(1)地租；(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4)随房屋逐渐破旧逐年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其利润在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预付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而租金包含有真正的资本息金这个部分。博士就是博士。如果说反高利贷的法律在通常的资本利息方面仅仅因为有人规避就会失效，那么这个反高利贷的法律则从来没有触动房租价格的哪怕一丝一毫。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的反高利贷的法律不仅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利息，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复杂的房租。[167]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得不到好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不再舍点钱把这个“根本得不到好处”的房屋变卖掉，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

在高级的社会主义(老师蒲鲁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域中作出这番令人鼓舞的成就以后,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资格飞得更高一些。

> “现在只要再作出几个结论,就可以从各方面充分阐明我们探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前面的议论中是得不出这些结论的,正如从废除利率中得不出住房丧失价值的结论一样;去掉我们的作者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这些结论不过是说,要顺利开展赎买出租住房这项业务,最好要有:(1)有关的精确统计;(2)优良的卫生警察;(3)能胜任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辞令,它们并不能“充分阐明”蒲鲁东漆黑一团的糊涂思想。

做出了这样的大事的人,也就有权来郑重地训诫德国工人说:

>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完全值得社会民主派注意……但愿他们能像在这里努力弄清住宅问题那样,也来弄清其他如**信用**、**国债**、**私人债务**、**税收**等等同样重要的问题。”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问题”的文章,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像他论述当前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样详细,那么《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我们预先就能知道它们的内容——全都是已经讲过的那一套:资本利息一旦废除,国债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场合都可以按照无情的逻辑得出惊人的结论:资本利息一旦废除,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都是些美妙的问题。**信用**！除了逐周借钱或向当铺借钱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工人借钱是无偿的，还是有息的，甚至是当铺的高利贷，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如果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变得便宜些，那么劳动力的价格难道不是必然会下降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如果能够随时得到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这对小资产者来说尤其是一件美事。**国债**！工人阶级知道，国债不是它筹借的，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筹借国债的人偿还。**私人债务**！——请参看信用项。**税收**！这对资产阶级有很大利害关系，而对无产阶级利害关系则很小。工人应交付的税金始终不断地包括进劳动力生产费用之中，因而要由资本家一并偿付。所有这里当做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则同蒲鲁东相反，认为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使命。

至于真正同工人有关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资本家怎样靠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诚然，他的尊长和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本没有搞清楚，就连他最后写的几篇著作实质上也并没有超出《贫困的哲学》①，而这本书的浅薄无知，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已经作了极其中肯的分析。

非常可悲的是，25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

①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如果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又要在德国泛滥起来，那就加倍不幸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50年，**仅仅**拿住宅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就足够了，在这方面不必再花费力气。

第 二 篇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一

在论**蒲鲁东主义者**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那一篇中，已经说明小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大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颇大的、虽然只是间接的利害关系。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不时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当这一点由科学查明以后，仁爱的资产者便宽宏大量地争先恐后地关怀起自己工人的健康来了。于是就建立协会，撰写著作，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一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对工人居

住条件进行调查，设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特别是在英国，由于那里大城市最多，因而烈火已经烧到大资产者头上，已开展起大规模的活动；委任了调查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成了包含有或多或少严厉的干预措施的新法律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还是远远胜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产生出必须加以治疗的弊病，并且必然不断反复地产生，以致这种治疗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在德国，照例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使这里也长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危急程度。不过，谁走得慢，谁就走得稳当些，终于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淡而无味的摘录，人们用响亮华丽的辞藻把它们打扮成高明见解来欺骗人。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埃米尔·萨克斯博士的《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观点，只是因为它试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我们的这位作者当做“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妙极了！英国议会报告书，即真正的重要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的名称；整本书证明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过**；可是他却给我们介绍了一系列专讲空话的资产阶级的、好心的市侩的、虚伪慈善主义的著述：杜克佩西奥、罗伯茨、霍尔、胡贝尔的著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如说胡说)大会的发言稿，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官方报告，波拿巴当局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官方报告，《伦敦新闻画

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而务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那位**尤利乌斯·孚赫**!在这个资料单中缺少的只是《凉亭》、《喧声》和射手库奇克[168]。

萨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误解,在第22页上声称:

> "我们所说的社会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学在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确切些说,就是这门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用以达到下述目标的各种手段和途径的总和,这个目标就是:**根据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使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

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认为"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一般说来不是研究"社会"问题而是研究其他问题的糊涂观念。我们要立即来研究主要点。萨克斯博士要求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让"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换句话说,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而"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状况则应该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是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而是真正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可见,萨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径,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财产的雇佣工人这另一方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内部,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同时又继续当雇佣工人。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不吝赐教,给我们指出,法国军队中从老拿破仑时代起就有机会晋升元帅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样变成元帅而同时又继续当普通士兵,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做到使德意志帝国的4 000万臣民都变成

德国皇帝。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主义宣言》[①]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想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②]。我们已经看到，萨克斯先生恰好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解决了住宅问题便解决了上述问题；他所持的意见是：

>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房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这种办法——**仅仅**用广泛改善住房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常常几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实实在在的高峰。”（第14页）

顺便说说，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而掩饰这个阶级的存在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萨克斯先生在第21页上向我们说明：劳动阶级应被理解为除工人本身以外，还包括一切“无财产的社会阶级”，“全体小百姓，即手工业者、寡妇、领恤金者〈！〉、下级官吏等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

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萨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61页。——编者注

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产生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知道这点的。它不**可能**用现存条件来解释住房短缺现象。因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道德说教来把住房短缺归之于人的邪恶，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论！〉——，过错……一部分应归之于渴望得到住房的**工人本身**，另一部分并且是更大的部分应归之于负责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或者应归之于那些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责任的人们，即各**有产的上等社会阶级**。后者的过错……就在于他们不愿意设法充分供应良好的住房。”

蒲鲁东曾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学领域，而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则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说教，而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时一碰到竞争，就又会立刻烟消云散。这种说教同站在水池边的老母鸡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欢快地游来游去的小

鸭所作的说教是一样的。虽然水里容易淹死，小鸭还是下了水；虽然利润不讲温情，资本家还是趋求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①——老汉泽曼早就这样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比萨克斯先生见解深刻。

> “良好的住房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对于建造供劳动阶级居住的住房望而却步……因而这些阶级由于需要住房而大部分落入投机活动的罗网。”

可恶的投机活动！大资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但是，阻止大资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恶意，而只是无知：

>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满足住房需要……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照例这样不负责地供给人们以恶劣的、有害的住房的时候，**他们会使人们受到怎样的损害**；最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害处。”（第27页）

但是，资本家的无知还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一起造成住房短缺。萨克斯先生承认，“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致露宿街头，总有必要〈!〉设法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而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自卫能力和孤立无援的”，接着他对我们说：

> “有个事实大家毕竟都知道，这就是，他们〈工人〉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轻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几乎可以说是被巧妙地夺走其机体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他们**丝毫也不懂得**合理的保健，特别是不懂得住房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27页）

但是在这里，资产者露出马脚来了。资本家的“过错”不声不响地

---

①引自大·汉泽曼《在1847年6月8日第一届联合议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第一届普鲁士国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页。——编者注

变成了无知，而工人的无知则成了发生过错的根由。请听一听吧：

> "所以，结果就是〈自然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暗、潮湿、狭小的住房，简言之，搬进对种种卫生要求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的住房……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处住房，甚至合租一个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少花一点房钱，同时他们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挥霍在酗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

工人"挥霍在烟酒上面"（第28页）的钱、"成天泡酒馆的生活及其种种悲惨后果，像铅砣一样一再把工人等级拖进泥坑"——这确实像铅砣一样压在萨克斯先生的胃里。至于在现今环境下，工人酗酒，像伤寒、犯罪、寄生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都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它必然产生，甚至人们可以预先计算出酗酒者的通常的人数，这一点又是萨克斯先生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启蒙老师早就说过："平民进酒馆，上等人进俱乐部。"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

关于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和谐的老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房，并改善工人的整个处境；如果工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从事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乖乖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发现自己的利益完全不是萨克斯先生及其无数前辈在说教中所讲的东西。关于劳资和谐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讲了50年了，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通过设立模范设施来证明这种和谐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50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

我们的作者现在要来实际解决问题了。蒲鲁东要把工人变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计划是多么缺乏革命性，这仅仅从下面这个事实中

就可看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早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尝试——并且现在还在尝试——从实际上实施这个计划。萨克斯先生也宣称，住房问题只有使住房所有权转归工人才能完全解决(第58页和第59页)。不仅如此，他一想到这里就如诗人一般陶醉，写出了如下激动的文字：

“在人所固有的对于地产的眷恋中，在连现代**繁忙的营利生活**也不能使之削弱的本能中，潜藏有一种奇特的东西。这就是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地产这种家当意义重大。人一旦获得了地产，也就获得了可靠的地盘，仿佛在土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经济〈！〉都在地产中获得最稳固的基础。然而，地产的赐福的力量还远远超出这些物质利益之外。谁有幸能把一块土地称为自己的东西，他就**达到了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他就有一个他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支配的领域，他就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实力，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他的自我意识就生长起来，从而他的道德力量也随之生长起来。因此地产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深远意义的…… 这样一来，现在无可奈何地听任变动不定的市场行情摆布的、总是听从雇主的工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可以通过他因此而能够利用的不动产抵押信贷来避免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危险。**通过这种办法，他就会从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第63页)

萨克斯先生大概设想人本质上就是农民；否则他就不会硬说我们大城市中的工人眷恋地产，而以前谁也没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发现过这种对地产的眷恋。对于我们大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地产对于他们只能是一种枷锁。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许偶然能卖掉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普遍危机的时候，受牵连的工人的所有房屋都会上市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于成本价格。如果他们全都找到了买主，那萨克斯先生的全部伟大的住房改革便又告吹，只好再从头做起。不过，诗人总是生活在想象世界

里的；萨克斯先生也是这样，他想象土地所有者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已经有了“可靠的根据地”，“**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可以通过他因此而能够利用的不动产抵押信贷来避免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危险”等等。但是，让萨克斯先生去仔细看一看法国和我们莱茵河流域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在他们的“领域”内可以独立自主地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这对高利贷者来说的确是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而为了使工人能够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给高利贷者来独立自主地支配，好心的萨克斯先生就周到地告诉工人可以利用**不动产抵押信贷**。他们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利用这种信贷，而不必去加重济贫事业的负担。

无论如何，萨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这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1 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萨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会称他是资本家。

但是，我们这个工人身上的资本家特征还有其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在某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已经成为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的铁的规

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

可见，萨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资本家。

附带说一句，上面所说的话对于终究会节约或降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一切所谓社会改革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革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就会跟着相应地降低；如果它们始终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时它们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大规模实现这些改革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我们假定，某个地方由于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而使工人的食品价格降低了20%；那么这个地方的工资经过一些时候就会降低将近20%，也就是说，降低的比率同这些食品费用在工人生活费用中所占的比率相一致。比如说，假若工人在这些食品上平均花费自己一周工资的$\frac{3}{4}$，那么工资最终会降低$\frac{3}{4}\times 20=15\%$。简要地说，只要这类节约性改革普遍推行起来，工人通过这种节约能缩减多少生活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出52塔勒的自主收入，那么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1塔勒。总之，他越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越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有什么办法能“最有力地激发他发扬……首要的持家之道，即节俭精神”呢？（第64页）

不过，萨克斯先生接着又告诉我们，工人成为房主，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仅工人等级，而且整个社会都极其关心的是，期望看到尽可能多的成员依附于〈！〉土地〈我很想哪怕是有一次看到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萨克斯先生〉……假如……工人自己通过这种办法转变成有财产者阶级，那么使我们脚下燃烧的叫做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恨、憎恶……危险的错误思想……都一定会像晨雾碰到朝阳那样消散。”(第65页)

换句话说，萨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随着占有房屋而发生的无产者地位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重新像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胆小怕事的人。这可能是蒲鲁东主义者们念念不忘的事情。

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社会问题解决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这个曾经有许多人怎么也猜不出的斯芬克斯之谜，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可以捉摸的事实而摆在我们面前了吗？它不是因此已经脱离理想领域而进入了现实领域吗？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不就是达到了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中的最极端的派别也视为自己理论顶峰的**最高目标之一吗？”(第66页)

真是幸运，我们总算攀登到了这个地方。这一声欢呼正是萨克斯先生这本书的“顶峰”，此后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从“理想领域”降到平坦的现实；而当我们到达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这里是毫无变化，的确是毫无变化。

我们的向导为了让我们往山下迈出第一步，教导我们说，工人住房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小园圃，像在英国那样；另一种是营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许多户工人，像在巴黎、维也纳等等地方那样。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德国北部流行的制度。诚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恰当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制度；营房制对健康、道德和家庭宁静来说确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房短

缺的中心地点，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为地价昂贵而不能实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营房而能建造有四至六套住宅的房屋，或者运用各种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营房制的最重大缺点消除，也就应该感到欣幸了（第71—92页）。

我们不是已经往下走了一大段了吗？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是在乡间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尽可能把工人营房修造得还能过得去。

可见，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显然遭到了失败，由于碰到**城乡对立**而遭到了失败。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对此，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有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模范大楼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可见，这里的情形恰好与萨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荒谬的。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的问题，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接过现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现有的手段来消除最难容忍的祸害。我们已经看到：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

立即弥补住房**短缺**。

萨克斯先生接下来又走出大城市，长篇大论地论述应当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工人移民区，并且描写了这种工人移民区的一切妙处，这里有公共"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干燥室、浴室等等"，还有"托儿所、学校、祈祷室〈!〉、阅览室、图书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豪华气派的跳舞厅和音乐厅"，还有传送到每所房子里，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从工厂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力。然而这套议论丝毫也不会使情况有所改变。他所描写的移民区是胡贝尔先生直接从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抄袭来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一笔勾销而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也就完全变成空想的了。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并且除了在法国的吉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移民区；而且法国的那个移民区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不是作为赢利的投机事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建立起来的。①同样，萨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40年代初由欧文在汉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共产主义移民区"和谐大厦"[170]，来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杜撰方案。

然而，这一大套关于建立移民区的议论，不过是一瘸一拐地试着再度快速登上"理想领域"，可是这一回也立刻掉了下来。我们于是又大步走下山来。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

> "雇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适当的住房，或者是由雇主自己来建造住房，或者是供给地皮，借给建筑资金等等，鼓励和帮助工人自行建房。"（第106页）

---

①并且这个移民区最后也完全变成了剥削工人的地方。见1886年巴黎《社会主义者报》。[169]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走出根本谈不上这一切的大城市而返回到乡村去了。萨克斯先生现在证明说：厂主帮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强可用的住房是合乎自己的利益的，一方面因为这是有利的投资去向，另一方面也因为这必然会

“提高工人的生活……一定会使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劳动力跟着提高，这自然……同样……是对雇主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也就确立了关于雇主参与解决住宅问题的正确观点：这种参与是**无形联合**的结果，是雇主多半在人道意旨的外衣下关怀他的工人的身体、经济、精神和道德状况的结果，这种关怀由于产生应有的结果，即由于吸引和保持能干、熟练、勤劳、知足和**忠实的**工人，自然在经济方面得到报偿”（第108页）。

胡贝尔企图用“无形联合”①的说法给资产阶级慈善家的呓语加上一层“崇高的意义”，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农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也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房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蓝图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英国，许多村落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一些后来已经发展为城市。可是工人并不感谢仁爱的资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议。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必须为房屋付出垄断价格，因为厂主没有竞争者；而且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马上就把他们抛到街头，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至于详细情形，可以参看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224页和第228页②。但是，萨克斯先生认为这种论据“几乎不值一驳”（第111页）。难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拥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

①见维·艾·胡贝尔《社会问题。四、无形联合》1866年北豪森版。——编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9—470、473—474页。——编者注

权吗？自然是想的。可是“雇主必须时时有可能随意支配住房，以便在解雇一个工人时能够为接替者提供住处”，所以……应该“**事先约定，**遇有这种情况**可以取消所有权**”（第113页）。①

这次我们出乎意料很快就降了下来。起初是说工人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随后我们得知，这在城市中办不到，只有在乡下才行得通；现在又告诉我们，这种所有权即使在乡下也只是“事先约定可以**取消**”的东西！由于萨克斯先生新发明了这种适用于工人的所有权，由于他把工人变成“事先约定可以取消”的资本家，我们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平坦的大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研究资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决住宅问题方面**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二

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这位萨克斯博士的话，那么资本家先生们现在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消除住房短缺，并且这就证明住宅问题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得到解决。

首先，萨克斯先生给我们举出例子——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表面

①在这一方面，英国资本家也不仅早已实现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萨克斯先生的全部宿愿。1872年10月14日星期一在莫珀斯，法庭为了审定议会选举人名册，必须就2 000名矿工申请把他们列入选民名册一事作出裁决。结果发现：依据这些人所在的矿场的规章，他们大多数都**不是被视为**他们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些**被准许**待在那里的人，不经任何事先通知就可以随时被抛向街头（矿主和房主当然是同一个人）。法官裁决说，这些人并不是承租人，不过是些**仆役**，因此他们无权被列入名册（1872年10月15日《每日新闻》）。

上是为了草拟关于法国各劳动阶级状况的报告，实际上是为了替帝国增光而把这种状况描绘成真正的天堂。而萨克斯先生就来引证**这个**由波拿巴主义的腐败透顶的工具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因为它的工作成果，“据专门为此任命的委员会**自己声称**，对法国是相当圆满的”！这些成果是什么呢？在提供信息的89个大工业企业或者股份公司中间，有31个**没有**修建工人住房；在已经修建起来的住房中，据萨克斯先生自己估计，顶多能容纳五六万人，而且这种住房几乎都是一户两室！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资本家，如果被自己的生产条件——水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山等等的位置——束缚在某个乡村地区，而又没有现成的工人住房，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房。但是，要把这一点看做存在“无形联合”的证明，看做“对这件事及其重要影响有更多理解的明显证据”，看做“大有前途的开端”（第115页），——那要有根深蒂固的自我欺骗的习性才行。另外，在这方面各国工业家也因各自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萨克斯先生在第117页上向我们说：

> “**在英国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这方面加紧行动。特别是在乡下遥远的村落里……工人从最近的居民点到工厂去也往往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工厂时已经十分疲乏，工作时效率不高，这种情况就是**促使**雇主为自己的劳动力**修建**住房的主要**原因**。同时，对这种状况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革**同其他一切无形联合因素联系起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繁荣移民区的产生正应归功于他们……　海德的阿什顿、特顿的阿什沃思、贝里的格兰特、博灵顿的格雷格、利兹的马歇尔、贝尔珀的斯特拉特、索尔泰尔的索尔特、科普利的阿克罗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联合王国享有盛名。”

天真得令人起敬，无知得更加令人起敬！英国乡村中的工厂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房！亲爱的萨克斯先生，不对！英国资本

家不仅就钱袋来说，而且就脑袋来说也都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出现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们就已经明白，在农村开办工厂时，修建工人住房的投资是全部投资中一个必要的、能直接或间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资产者之间进行的斗争给予德国工人以结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冶炼厂主就从实践中得知，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罢工的工人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格雷格、阿什顿、阿什沃思这些人的“繁荣移民区”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40年以前它们就已经被资产阶级当做样板加以宣扬了，而我自己在28年以前已经对此作过描写（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28—230页脚注①）。马歇尔和阿克罗伊德（Akroyd——他的姓是这样写的）所创立的移民区也差不多有这样久，斯特拉特的移民区年代就更久了，它还在上一世纪就开始出现。既然英国工人住房的平均寿命假定是40年，那么萨克斯先生就是掰手指头也可以算出这些“繁荣移民区”现在处于怎样的破败状态了。况且这些移民区的所在地现在大多数都不再是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地处拥有两三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秽多烟的市镇中间，但这并不妨碍以萨克斯先生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科学现在还分毫不爽地重唱那些早已不适用的1840年的英国老赞美歌。

特别要提到的是老阿克罗伊德。这个老实人无疑是个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工人，尤其爱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约克郡的那些不如他那样仁慈的竞争者们常常说：在他的工厂中做工的全都是他自己的儿女！可是，萨克斯先生断言，在这些繁荣移民区，“私生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73—474页。——编者注

子越来越少了”(第118页)。完全正确,**未婚姑娘生**的私生子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在英国工厂区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随同**工厂一起建造工人住房,这在近60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工厂乡村有许多已经变成了后来形成的整座工厂城市的中心,并且出现了工厂城市所产生的一切弊害。因此,这些移民区并没有解决住宅问题,而是由此**才**在当地**造成了**这种问题。

反之,在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蹒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实际上只是从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里,在法国,尤其是在德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巨型冶炼厂和制造厂(如克勒佐的施奈德工厂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下决心修建一些工人住房。大多数农村厂主都让自己的工人冒着炎暑和雨雪清晨步行几德里赶到工厂,晚上再步行赶回家。这种情形特别常见于多山的地区——法国和阿尔萨斯的孚日山脉,以及伍珀河、锡格河、阿格河、伦讷河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区。在厄尔士山区,情形也不见得好些。不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同样是小气的吝啬鬼。

萨克斯先生很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大有前途的开端也好,还是繁荣移民区也好,都毫无意义。因此他现在企图向资本家证明,他们从修建工人住房方面能获取多么可观的收入。换句话说,他企图给他们指出一条欺骗工人的新路。

首先,他给他们举出伦敦的许多建筑协会作例子,这些协会一部分是慈善性的,一部分是投机性的,它们已获得了4%—6%以至更高的纯利。至于投在工人住房上面的资本带来很好的收益——这用不着萨克斯先生来向我们证明。现在投在建造工人住房方面的资

本为什么并不那么多，其原因在于更昂贵的住房会给房主带来更优厚的利润。因此，萨克斯先生给资本家的忠告仍然不过是一种道德说教罢了。

至于这些伦敦建筑协会，萨克斯先生大肆赞扬说它们取得了辉煌成绩，而据他自己的估计(他把任何一种建筑投机事业都包括进去了)，它们总共也只是使2 132个家庭和706个单身汉，即总共还不到15 000人有房子住！这类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德国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描绘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单是在伦敦东头，就有100万工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所有这些慈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可怜和微不足道的，甚至英国议会关于工人状况的报告连一次也没有提到过。

在文章的整个这个部分中暴露出来的对伦敦情况的可笑的无知，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说了，只是要指出一点。萨克斯先生以为索霍区内供单身汉住宿的客栈歇业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顾客”。看来萨克斯先生以为整个伦敦西头都是无与伦比的豪华城区，而并不知道最优雅的街道背后紧挨着就是污秽不堪的工人区，例如索霍区就是其中的一个。萨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23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索霍区模范客栈，当初客人很多，但后来歇业了，因为谁在那里都受不了。而这还是最好的客栈之一。

那么，阿尔萨斯的米卢斯工人镇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成就吗？

米卢斯的工人镇对大陆资产者说来，正如阿什顿、阿什沃思、格雷格等人当年的“繁荣移民区”对于英国资产者一样，是引以自傲的地方。可惜这个工人镇不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与阿尔萨斯资本家的“无形”联合的产物，而是他们的公开联合的产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一。国家曾为它垫付了三分之一的资本。它在14年内

(到1867年为止)依照一套在英国(这里人们对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行不通的有缺陷的办法修建了800所小房子,让工人在13—15年内每月付出昂贵的房租以取得房屋所有权。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获取所有权的方法在英国的互助性的建筑协会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阿尔萨斯的波拿巴分子来发明。为购买房屋而付出的加价房租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内累计付出4 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 300法郎的房屋。一个工人如果要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哪怕仅仅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在这种场合,他就可以被赶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价的$6\frac{2}{3}$%计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价值是3 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数退还给他,但**不付分文利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协会即使没有"国家帮助"也会大发其财。同样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提供的住房,只因为位于城外半农村地区,才优于城内的旧的营房式的住房。

关于在德国所做的几个可怜的实验,萨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页上承认它们是很不像样的,我们也就不去讲了。

所有这些实例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仅仅证明:修建工人住房,即使不践踏各种卫生法,对资本家说来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一点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满足某种需要的投资,只要合理经营都会带来收益。问题仅仅在于:**虽然如此**,为什么住房短缺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如此,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数量的良好住房呢?于是萨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资本提出劝告,而对问题却仍不作答复。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我们在上面已经作出了。

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短缺,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弄清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

萨克斯先生是一个自助办法的热烈崇拜者，在住宅问题方面也能说出自助所创造的一些奇迹。可惜他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自助只是在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农村，才能起点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国，只能产生极有限的作用。然后，萨克斯先生喟然长叹道：

“依靠这个方法（自助）的改良只能**间接**实行，因而**永远**只能不完全地实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原则有力量影响住房质量的限度内实行。”

并且连这也很值得怀疑；无论如何“私有原则”对我们这位作者的文笔的“质量”决没有起过改良的作用。虽然如此，自助在英国依然造成了奇迹，“结果，在那里为解决住宅问题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切，都**被远远超过了**”。这里指的是英国的建筑协会，而萨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别详细地研究它们，是因为

“关于它们的实质和活动普遍存在着很不充分的或错误的看法。英国的建筑协会根本不是……建筑社或建筑协作社，用德语来讲倒不如……把它们叫做‘购房协会’；它们作为协会，目的是要由会员定期交费来构成基金，根据资金积累的多少从这笔基金中贷款给会员们去购买房屋…… 因此，建筑协会对于一部分会员说来是储蓄协会，对于另一部分会员说来是预支金库。可见，建筑协会是一种旨在满足工人需要的抵押信贷机构，主要是利用……工人储蓄……扶助储户同仁去购买或修建房屋。如事先规定的，这种贷款要有相应的不动产作抵押，并且要在短期内分批清偿，包括付息和分期还本在内…… 利息并不支付给储户，而总是**按照复利记在他们账下**…… 想要把储金连同积累的利息一并取回……只要在一个月前预先声明，就可以随时办到”（第170—172页）。“这样的协会在英国有2 000个以上…… 其中筹集的资本约有1500万英镑，并且已经约有10万个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购置了自己的房屋；眼下这无疑是难以比拟的社会成就。”（第174页）

可惜，这里有个“疑虑”也跟着蹒跚地走来：

“然而问题**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决，这至少是因为购置房屋……只有**收入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　并且对于卫生条件往往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第176页）

在大陆上，“这种协会……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这种协会是以存在小宅子制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这里只是乡下才有；而乡下的工人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自助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可能成立真正的建筑协作社的城市里，建筑协作社会遇到“各种极其明显的和严重的困难”（第179页）。建筑协作社只能修建小宅子，而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话，“这种协作社式的自助形式”不可能“在现今条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未必可能——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起主要作用”。要知道，这种建筑协作社还处在“初始的、尚不发展的萌芽阶段”。“甚至在英国也是这样。”（第181页）

总之，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没有**能力**。我们本来到此可以结束这一篇了，不过因为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资产者总是把英国的建筑协会摆出来给我国工人作模范，所以绝对有必要对英国的建筑协会稍加说明。

这些建筑协会根本不是工人的团体，它们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使工人购置归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工人购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这些建筑协会实质上是投机性的组织，它们起初规模很小，但就其投机性来说不亚于它们的规模巨大的仿效者。在某个酒馆中，通常是在酒馆主人的发起下——然后就每星期在他那里聚会一次——一些常客和他们的朋友，如小贩、店员、推销员、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有的地方还有一个机器制造业工人或另外一个属于本阶级贵族阶层的工人，共同凑成一个建筑协作社。最直接的起因，通常是酒馆主人探听到邻近或其他某个地方有一块比较便

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数参加者由于他们的职业关系并不是被拴在了某个地方；甚至许多小贩和手工业者在城内也只有摊位，没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谁都更愿意住在烟雾弥漫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买下一块供建筑用的地皮，在上面修建尽可能多的小宅子。比较有钱的会员们凑出的贷款就能买地皮；每周交纳的会费，再加上一些小额借款，就够支付每周的建筑费用。那些想购置自有住房的会员，凭抽签分得建成的小宅子，靠相应的加价房租分期偿清买价。其余的小宅子出租或出卖。这种建筑协会，在事业顺利的时候，就会积起或大或小的一笔钱，这笔钱在会员们交纳会费期间是属于会员们的，并且在他们之间偶尔进行分配或者在协会停办时进行分配。英国建筑协会十有八九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其余的则是较大的，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业的借口下成立起来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地产投机，使**小资产阶级**的积蓄能有较好的有抵押作保证的投放处所，获得优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红利。

至于这些协会究竟是指望着哪一类主顾，这可从一个即使不是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之一的协会的广告中看出。伦敦"伯克贝克建筑协会，法院巷南安普敦大厦29号和30号"自成立以来收入已达1 050万英镑（合7 000万塔勒），它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家证券的款项在416 000英镑以上，现有会员和储户21 441人，它的广告内容如下：

"许多人都知道钢琴厂主采用的所谓三年制度，其内容是租赁钢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终了时即成为钢琴所有人。在采用这个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们很难购置一架好钢琴，正如很难购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样；人们逐年出钱租钢琴，所花的钱比钢琴价格高一两倍。在钢琴上可行的办法，在房屋上也可行……然而因为房屋比钢琴要贵……所以要有较长期限才能用房租偿清买价。因此，本协会理事与伦敦城内各处和郊外各处的房主们达成协定，由本协会理事向伯克贝克建筑协会会员及其他人提供城市各处的大量房屋以供挑选。本协会理事

打算采取的办法是这样的：房屋出租期限为12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交纳，出租期满之后，房屋就成为承租人的绝对财产，无须再付其他任何费用……　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缩短期限，或减低租金以延长期限……　**凡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中当伙计的人**以及其他人，一加入伯克贝克建筑协会，就可以立刻摆脱任何房东而独立。”

这说得够明白了。丝毫也没有提到工人，却讲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当伙计的人等等；并且还假定申请人通常**已经有了一架钢琴**。事实上，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者和那些想要成为**并且能够**成为小资产者的人；这些人收入虽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说来总是在逐渐上升，店铺伙计以及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就是如此，而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金额保持不变，实际上则随着家庭人口增加及其需要增长而降低。事实上只有很少数工人才能作为例外参加这种协会。他们一方面收入太少，另一方面收入又太不可靠，所以他们不能承担为期12年半的义务。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少数例外，若不是报酬最优的工人，便是工厂监工。①

---

①尤其是关于伦敦建筑协会的经营情况，在这里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大家知道，伦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属于一打左右的贵族，其中最显贵的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贝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起先这些人把一些建筑地皮出租99年，期满后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东西收归己有。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房屋按照所谓修缮租约出租一个较短的时期，例如39年，承租人应依照这个租约把房屋修好并加以保持。签订了这种契约以后，地主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筑师和该区建筑管理局官员（surveyor）去检查房屋并确定必须修缮的地方。修缮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的，甚至包括重建全部前墙、屋顶等等。这时承租人就把租约当做抵押交给建筑协会，以借取必需的款项——每年租金130—150英镑的可以借到1 000英镑以至1 000英镑以上——，由自己出钱来进行修建工程。于是，这些建筑协会便成了一套办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这套办法的目的就是用不着自己费力气并利用公众的资金来不断重新修整伦敦地区的属于大土地贵族的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米卢斯工人镇的波拿巴分子无非是英国这些小资产阶级建筑协会的可怜模仿者罢了。只不过，波拿巴分子虽然得到国家帮助，但对自己主顾的欺骗却比这些建筑协会要厉害得多。他们的条件大体说来比英国平均的条件还要苛刻；在英国，每次交纳的钱都计算单利和复利，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能全部退还，而米卢斯的工厂主则把单利和复利一并纳入腰包，只退还原来用五法郎硬币交纳的数额。没有人会比萨克斯先生对于这个差异更感到惊讶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这一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见，工人自助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现在只剩下国家帮助了。萨克斯先生在这方面能向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呢？三件东西：

> “第一，国家必须考虑到，应通过国家立法和行政手段消除或适当地改善一切可能以任何方式加重劳动阶级住房短缺的做法。”（第187页）

这就是说：修改建筑立法并保证建筑业自由，使建筑费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国，建筑立法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筑业像空中飞鸟一样自由，而住房短缺却依然存在。况且，现在英国的建筑费用已经便宜到这样的程度，只要附近有一辆马车跑过，房屋就会摇晃起来，并且每天都有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25日，在曼彻斯特一下子倒塌了六所房屋，并且有六个工人受了重伤。可见，这也无济于事。

> “第二，国家政权应制止个别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扩大或重新招来这种灾难。”

房屋并使之保持适于居住的状态。

而这竟被当做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措施！

这就是说：卫生和建筑管理部门对工人住房实行监督，授权当局封闭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房。英国从1857年起就已经这样做了。但那里的情况怎样呢？1855年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消灭传染病法），萨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认，始终是“一纸空文”，1858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页）。然而，萨克斯先生认为，只适用于住有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个法令手工业者住宅法，“无疑是英国议会深刻理解社会事务的良好证明”（第199页）。但是，这个说法又只是萨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国“事务”的“良好证明”。英国在“社会事务”方面一般比大陆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现代大工业的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发展得最为自由和最为广阔，其后果在这里也最为显著，因而在立法方面获得反映也较早。工厂立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但是，如果萨克斯先生以为，一个议会法令只要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实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任何议会法令（只有工场法除外）都是这样，地方自治法恰好也是这样。这一法律委托给城市当局去执行，而城市当局在英国几乎到处都被公认为是一切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和Jobbery[①]的中心。这些城市当局中的通过种种家族关系谋得职位的官吏，不是没有能力实行便是不愿意实行这种社会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国，负责准备和实行社会立法的政府官吏多半曾以严格忠于职守而著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严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不卫生的和有倒

①Jobbery一词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职权图谋个人或家族的私利。比如说，某一国家的国家电报局局长当了某个造纸厂的匿名股东，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给这个工厂，然后委托这个工厂为电报局供应用纸，那么这就是虽然很小，但毕竟是干得不错的job，因为这件事足以表明Jobbery的原则是什么东西，顺便说说，这在俾斯麦统治下是天经地义和十分自然的。

塌危险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员会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强有力的代表。按小区选举市政委员的办法，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卑劣的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委员，都不敢投票赞成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都受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现在还只是在群情激愤的场合才被采用，并且多半还是在已经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如去年在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天花流行时的情形那样。向内务大臣进行的请愿以往总是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起作用，因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革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执行。这个法律，也像英国其他许多法律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意义：当一个受工人控制或威逼的政府终于真正推行这个法律时，它才会在这个政府的手中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可用来在现今社会状态下打开一个缺口。

"第三"，在萨克斯先生看来，国家政权应当"极其广泛地采取它可以运用的一切积极措施来解决当前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

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应当给自己的"下级官吏和职员"（但这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营房，"真正的模范大楼"，并且"贷款给……各个市镇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以求改善各劳动阶级的住房"（第203页），英国遵照公共工程贷款法已经这样做了，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米卢斯也这样做过。但是，公共工程贷款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政府拨给委员们支配的至多不过5万英镑，这笔钱顶多能建筑400所小宅子，40年能建造16 000所小宅子或住宅，顶多只能供8万人居住。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即使假定委员会的资金在20年后经过偿还增加了一倍，因而在后20年又修建了总共能供4万人居住的住房，那么，这也

仍然是沧海一粟。况且，因为小宅子平均只能维持40年，所以在40年后每年就得花5万或10万英镑现金来整修势将倒塌的最旧的小宅子。萨克斯先生在第203页上谈到这一点时竟然说：这一原则在实际中已得到真正的贯彻，并且是在“无限的规模上”得到贯彻。这样就承认了，甚至在英国，国家也是“在无限的规模上”毫无作为的，到这里萨克斯先生就结束了自己的书，只是顺便对所有有关的人再一次作了一番道德说教。①

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与问题有关的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资本家对住房短缺虽然也感到遗憾，却未必会受触动而去从表面上掩饰由此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那么，**总**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经成为通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有人可能反驳说，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德国，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正因为这

---

①最近在授权伦敦建筑主管当局可征用地皮用于修筑新街道的英国议会法令中，对于因此无处栖身的工人给予了若干照顾。其中规定：新建的房屋必须适于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各种居民阶层居住。因此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为工人修建起六至七层营房式出租大楼，这样就是符合了法律条文。这种为工人所根本不习惯并且与四周古老伦敦风貌极不协调的建筑效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所能容纳的也未必有实际上由于修筑新街道而失去住所的工人人数的四分之一。

样，这个力量也就代表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家自然能够做出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做出的许多事情；在社会领域中，也可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来。

这是反动派的论调。其实，就是在德国，现有的这种国家也是它赖以生长起来的那个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而普鲁士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仍然强有力的大地主贵族相并存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和极其胆怯的资产阶级，它至今既没有像在法国那样争得直接的政权，也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争得或多或少间接的政权。但是，跟这两个阶级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迅速增加、智力十分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以外，还存在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但是，不论在旧专制君主制中或者在现代波拿巴主义君主制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是掌握在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手中，这个等级在普鲁士一部分由他们自身补充，一部分由小世袭贵族补充，在少见的情况下由大贵族补充，极少的部分由资产阶级补充。这个似乎站在社会以外并且可以说是站在社会之上的等级的独立性，给了国家以独立于社会的假象。

在普鲁士（依其发展情况也在德意志的新帝国宪法中）从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状态中必然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是假立宪制；这个国家形式既是旧专制君主制的现今的解体形式，也是波拿巴主义君主制的存在形式。在普鲁士，假立宪制从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盖和促成了专制君主制的缓慢腐朽过程。但是，从1866年以来，尤其从1870年以来，社会状态的变革，从而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目共睹下并且是在急速加剧的程度上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证券交

易所欺诈事业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旋涡中。1870年从法国传入的贪污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施特鲁斯堡和贝列拉互相脱帽致敬。大臣、将军、公爵和伯爵，竟同最狡猾的证券交易所犹太人为伍，做起股票生意，而国家也承认这些犹太人的平等身份，把他们大量地封为男爵。很早以来就以糖厂主和酒厂主身份从事工业的农村贵族早已度过了昔日的规规矩矩的时光，现在把自己的名字列入种种讲信用的或不讲信用的股份公司经理名单中了。官僚对盗用公款抱越来越轻视的态度，不再把它看做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们把国家置之脑后，一味追逐高收入的工业企业管理职位，而那些还留任国家官职的人们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样搞股票投机，或"参与"铁路之类的事业。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就是尉官们也搞些投机活动来发点小财。一言以蔽之，旧国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制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制；在行将来临的工商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而且整个旧普鲁士国家都要崩溃。①

这样一个非资产阶级因素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哪怕只解决一个住宅问题吗？恰恰相反。在一切经济问题上，普鲁士国家越来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了。如果说1866年以来经济方面的立法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适应尚未越出原已达到的水平，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主要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过错：第一，它过于胆怯，不能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要求；第二，任何让步只要同时会使具有威胁性的无产阶级获得新的武器，它就加以拒绝。如果说国家政

①现在，1886年，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基础即依靠保护关税确立的大地产同工业资本的联盟之所以还能维持下来，不过是因为惧怕1872年以来在人数和阶级意识上都已大大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

权，即俾斯麦，企图为自己拼凑一个御用的无产阶级，以钳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么这岂不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这个手段对于工人没有承担任何义务，只是讲一些友好的空话，顶多也只能提供某种最低限度的国家帮助，也就是路易·波拿巴式的建筑协会所提供的那种帮助。

至于工人能从普鲁士国家那里期待什么，这从法国几十亿赔款[155]的使用情况中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证明。这笔赔款使普鲁士国家机器在社会面前的独立性获得了一个新的短暂的缓刑期。难道这几十亿中有过一个塔勒曾用来使流落街头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吗?相反。当秋天来临时，国家甚至把工人们在夏天用做蔽身之所的那几间可怜的木房也下令拆毁了。这50亿赔款很快就在要塞、大炮和军队上挥霍殆尽；尽管瓦格纳说了许多善意的蠢话[171]，尽管同奥地利举行了几次施梯伯会议[172]，这几十亿赔款中用在德国工人身上的数目，甚至还不及路易·波拿巴从法国盗取的几百万法郎中用在法国工人身上的数目多。

三

实际上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问题解决了，但又层出不穷。这就叫做“**欧斯曼**计划”。

我这里所说的“欧斯曼计划”，并不单单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套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这样做，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一个依赖于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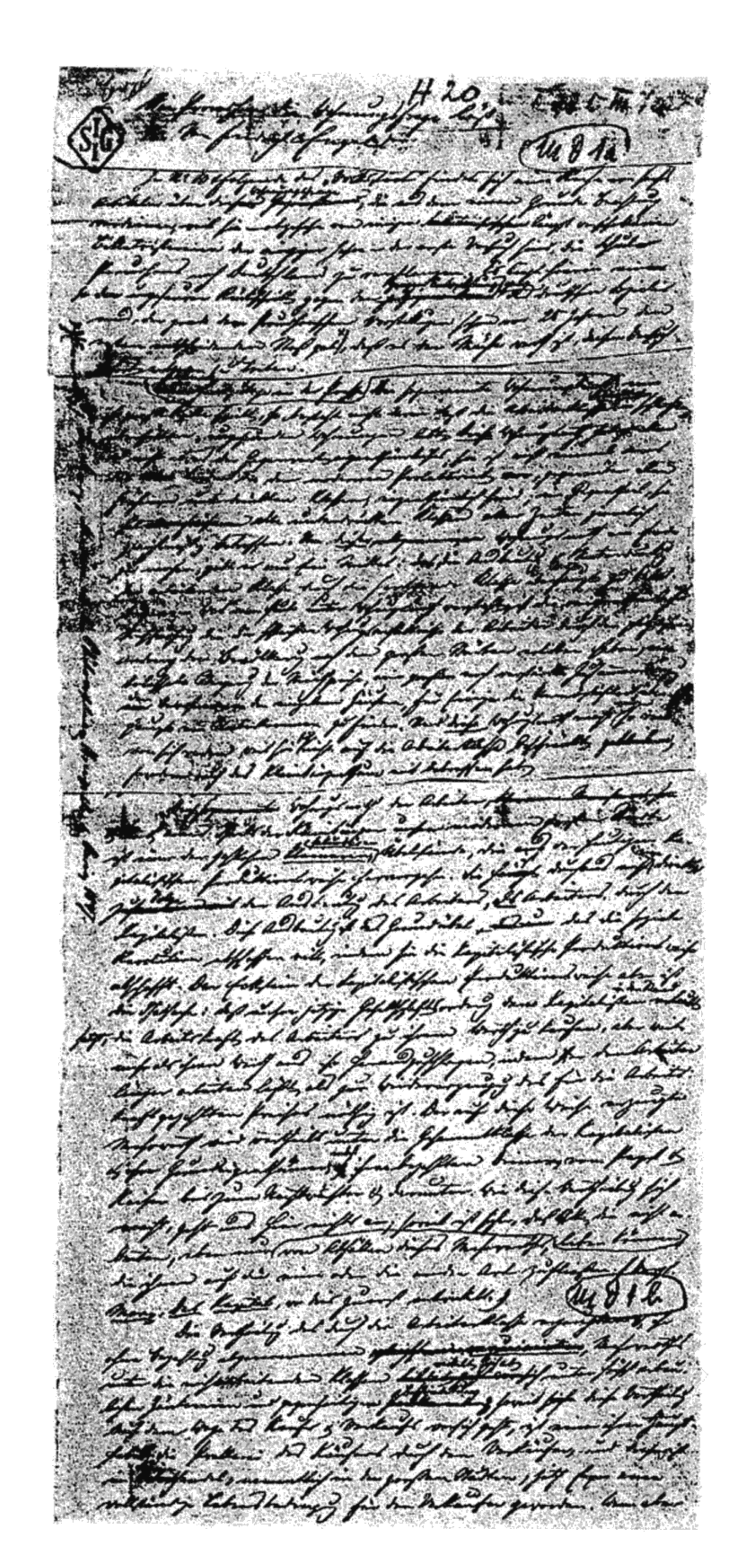
纯粹的豪华都市。我所说的“欧斯曼计划”，是指把工人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区从中豁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我描写过1843—1844年曼彻斯特的情况。从那时以来，由于修筑了横贯市中心的铁路，修建了新街道，建筑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写的最恶劣的街区中有一些已经被打通，被暴露出来和被改建了；有一些则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还有许多街区——尽管从那时以来实行了更严格的卫生警察监督——处于同样恶劣或者甚至比那时更加恶劣的状况中。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大大膨胀，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也同从前最声名狼藉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在我那本书的第80页及以下几页中，我描写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这个地方名叫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多年以来就已经是曼彻斯特的一个污点。①小爱尔兰早就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基座很高的火车站；资产阶级吹嘘说，顺利地彻底拆毁小爱尔兰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去年夏天发生了一次大水灾，因为筑有堤堰的河流由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总是年复一年地造成越来越大的水灾。结果人们才发现，原来小爱尔兰根本没有被消灭，只是从牛津路南边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41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迁移到了北边，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糟糕。不妨看一看曼彻斯特激进资产者的喉舌曼彻斯特《泰晤士周报》1872年7月20日的报道：

“我们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带来一个良好的结果：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卫生法遭到公然嘲弄的种种事实上来，那里的人们在城市官吏和市卫生委员会的眼皮底下忍受这种嘲弄已经很久了。本报昨天刊载的一篇犀利的文章，只是极不充分地揭露了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鲁克街一些地下室住房的恶劣状况。仔细调查了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们有权证实文中所谈的一切情况，并表明我们的看法：这个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应该封闭了；更确切些说，本来就不应当容忍它们继续住人。在查理街和布鲁克街拐角地方的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甚至在布鲁克街最低的地方，在铁道高架桥下，行人每天来来往往就踏在这些住房之上，但决不会想到在他们脚下深深的洞穴中还住着人这种生物。这个大院是公众看不到的，住到这里来的只是那些迫于贫困不得不在墓冢似的隔绝之处找寻栖息之所的人。甚至在筑有堤岸的、通常死水一潭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过平常水位的时候，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过只高出水面几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下水道中令人作呕的脏水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每次河水泛滥都留下这样的纪念…… 四方大院比布鲁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室还要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从污水坑中溢出来的脏水涨到了屋顶。我们知道这一点，因而料想这个大院不会再住人，或者只会遇见卫生委员会的人员在那里洗刷臭气熏天的墙壁并加以消毒。可是不然，我们竟看见一个人在某个理发师的地下室里忙活……把墙角的一大堆腐烂的脏东西铲到手推车中。这个理发师的地下室打扫得还算干净，此人叫我们到更低的一些住所去，关于这些住所，他说他如果会写字的话，就要向报纸投稿，要求把它们封闭起来。最后我们来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健康的、看样子来自爱尔兰的女子，她正在忙着洗东西。她和她的丈夫——一所私宅的更夫——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住了6年，并且家里人口很多…… 他们刚离开的那所房屋，水已经没了屋顶，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废物。这位丈夫说，住户每两月要用石灰把墙壁粉刷一次，才能使房子免去难以忍受的臭气…… 在我们的记者此时才走得进去的内院里，他看见有三所房子，后墙紧靠着刚才描写过的那些房屋，其中两所还有人住。那里臭气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待几分钟也一定会呕吐起来…… 这个可憎的洞穴住着一个七口之家，他们在星期四晚上〈河水开始泛滥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觉。更确切些说，如那个妇人所立刻改口说的，他们并没有睡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气熏得不断呕吐。星期六他们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出



《论住宅问题》手稿第一页



去。她也认为这个洞穴连养猪也不合适，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个半先令〈15个格罗申〉，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没有工钱。这个大院和住进这个像活人坟墓般的大院内的居民，给予人们一种完全走投无路的印象。此外，我们必须指出：根据我们的观察，四方大院不过是这个地区其他许多地方的一个样本——也许是夸张了的样本——，这些地方的存在，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是不能辞其咎的。如果这些地方将来还允许住人，那么，卫生委员会所负责任之重大，以及邻近地区受传染病威胁之严重，我们就不用再去说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产生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第 三 篇

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

一

在《人民国家报》第86号上，阿·米尔柏格宣称他就是我在该报第51号和以下几号中[①]批判过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替自己辩解的文章中对我大加责难，同时对所谈到的一切观点大肆歪曲，所以我好歹都必须予以答复。很遗憾，我的反驳大部分只能在米尔柏格给我划定的个人论争的范围内进行，但是我将竭力把主要的论点再次加以发挥，而且尽可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哪怕米尔柏格又会责难我，说这一切“不论对他或对《人民国家报》其他读者说来实质上都没有什么新东西”。这样，我的反驳也就会有某种普遍意义。

米尔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内容。说到形式，只要指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论文出自谁的手笔，这就够了。因此，根本谈不到对于作者有什么个人“成见”；不过对于这些论文中所阐述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我当然是有“成见”的，因为我早已从蒲鲁东那里知

①见本卷第250—271页。——编者注

道了这个解决办法，并且对这个办法的看法是确定不移的。

关于我的批判的“语调”，我不想同朋友米尔柏格争论。像我这样参加运动很久的人，皮肤已经厚得不怕什么攻击了，所以很容易以为别人也有这样厚的皮肤。为了使米尔柏格得到补偿，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语调”适应他的Epidermis（表皮）的敏感程度。

米尔柏格对于我说他是蒲鲁东主义者这一点特别感到冤屈，并声明他根本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我当然应该相信他；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些论文——我讲的也只是这些论文——中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在米尔柏格看来，我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轻率的”和很不公平的：

> “小资产者蒲鲁东的学说，在我们德国已经成了一个确定不移的教条，许多人甚至连他的著作中的一行字都没有读过，就宣扬起这个教条来了。”

我惋惜说，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在20年内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对此米尔柏格回答说，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蒲鲁东所表述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这一点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什么“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归结为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第二，说蒲鲁东的所谓“原则”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起了米尔柏格所硬说的那种决定作用，说“无政府状态、组织经济力量、实行社会清算等原则在那里已成了……革命运动的真正载体”，都是不正确的。暂且不说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蒲鲁东的万应灵丹只是以被巴枯宁修改得不成样子的形式出现才有了一点儿影响。每一个熟

悉国际工人运动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事实：在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只形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宗派，而法国工人群众则根本不愿理会蒲鲁东提出的冠以“社会清算和组织经济力量”称号的社会改革计划。顺便说说，这种情况在公社时期就已经有过。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本不曾尝试过根据蒲鲁东的建议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激励人心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协作社等这样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是公社覆灭的部分原因。所谓布朗基主义者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一旦尝试由纯政治革命家转变为提出一定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派别——如那些流亡到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国际和革命》[①]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样——，他们就不是宣告蒲鲁东的救世计划的“原则”，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宣告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宣言》[②]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如果米尔柏格根据德国人不尊重蒲鲁东这一点作出结论说，德国人对于罗曼语地区的“直到巴黎公社”为止的运动缺乏理解，那么就请他为证明这个结论而说明一下，罗曼语著作中有哪一部在理解和描述公社方面哪怕近似于德国人马克思所写的《国际

---

①爱·瓦扬《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中所作的正确论述。

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正因为如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从无通过无到无”①。

如果说我认为罗曼语地区的工人20年来只是从蒲鲁东那里才直接或间接得到精神食粮是一种不幸，那么我认为这种不幸并不在于被米尔柏格称为“原则”的那套蒲鲁东改良药方占有完全虚构的统治地位，而是在于那里的工人对现存社会的经济批判受了完全谬误的蒲鲁东观点的传染，他们的政治活动也被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败坏了。至于问到究竟是谁“更多地信奉革命”，是“蒲鲁东主义化的罗曼语地区的工人”，还是理解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要比罗曼语地区的工人理解自己的蒲鲁东不知好多少倍的德国工人，那么我们只有知道了“**信奉**革命”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听说过有人“信奉基督教，信奉真正的信仰，承蒙上帝恩宠”等等。但是何谓“信奉”革命，即最具暴力的运动?难道“革命”是人们不得不信仰的恪守教义的宗教吗?

其次，米尔柏格责难我，说尽管他文章中说得清清楚楚，我却硬说他把住宅问题仅仅说成是有关工人的问题。

这一次，米尔柏格确实是对的。我把那个有关的地方忽略了。这种忽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因为这是最能表明他的论文的全部倾向性的地方之一。米尔柏格确实清清楚楚地说过：

“由于人们常常对我们提出**可笑的**责难，说我们推行**阶级政治**，力求实现阶

---

①黑格尔《逻辑学》1834年柏林版下册，见《黑格尔全集》第4卷第15、75、145页。——编者注

级统治等等，因此我们首先要强调说：住宅问题并不是仅仅有关无产阶级的问题，**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间等级**，即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全体官僚**有极大的**利害关系…… 住宅问题正是社会改革中的一点，这一点显然比其他任何一点都更能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中**真正中间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在租赁住房的沉重的桎梏下，各中间阶级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 现在社会中各个真正中间阶级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们是否……有力量……与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工人政党结成联盟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而这种改造过程的好处将首先为他们所享有。**”

总之，朋友米尔柏格在这里证实了如下几点：

(1)“我们”不推行“阶级政治”，也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推行“阶级政治”，即工人阶级的政治。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7]起，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当做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当做斗争的最近目的。米尔柏格既然宣称这是“可笑的”，也就是自外于无产阶级运动，而投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中了。

(2)住宅问题有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仅仅是有关工人的问题，而是“同小资产阶级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因为“真正中间阶级”由此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谁要是宣称小资产阶级——哪怕仅仅在一个方面——所受的痛苦“比无产阶级也许还更厉害些”，那么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时候，他就确实不能抱怨了。因此，当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时，米尔柏格怎能有理由感到不快呢：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

苦，是蒲鲁东也归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我们已经说过的决非只是工人问题的住宅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①

（3）“社会中真正中间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而且当前的社会改造过程的“好处将首先”正是为这些真正中间阶级所“享有”，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所“享有”。

这样，工人进行当前的社会革命“首先”是为了小资产者的利益。其次，小资产者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既然小资产者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那么工人的利益也就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了。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运动中也就与无产阶级的观点同样合理了。而这种同等合理的说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所以，当米尔柏格在自己的单行本的第25页上②把“小手工业”颂扬为“社会的真正**支柱**”时，他也是前后完全一致的，“因为小手工业按其本质来说把三个要素，即劳动——获得——占有集于一身，并且还因为它把这三个要素集于一身时并不给个人发展能力设置任何限制”；而且他特别责难现代工业破坏培养正常人的这一温床，并“把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不断更新的**阶级**变成**一堆**不觉醒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目光投向何方的人”。可见，小资产者是米尔柏格心目中的模范人物，而小手工业是米尔柏格心目中的模范的生产方式。我把他

①见本卷第252页。——编者注

②1872年2月初和3月初《人民国家报》上匿名登载了阿·米尔柏格的六篇文章并加了编辑部按语，后来这些文章印成了单行本。下面的引文引自阿·米尔柏格《住宅问题。社会问题简述。〈人民国家报〉论文专集》1872年莱比锡版第25页。——编者注

列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难道是诬蔑了他吗?

既然米尔柏格拒绝为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这里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说明,蒲鲁东的改革计划将怎样指向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这一目标。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详谈小资产者利益和工人利益的所谓的同一性。要讲的话,都已经在《共产主义宣言》①中讲过了(1872年莱比锡版第12页和21页)②。

总之,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是:在"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传说"之外,又出现了关于小资产者米尔柏格的真事。

二

现在我们来谈一个主要点。我曾指责米尔柏格的文章按照蒲鲁东的方式歪曲了经济关系,办法是把这种关系翻译成法律用语。我举出了米尔柏格的下列论点作为例子:

>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两倍、三倍、五倍、十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

于是米尔柏格发出了如下的怨言:

> "这样**简单冷静地陈述事实**,竟促使恩格斯对我大施教诲,说我本来应该说明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的——可是这完全不在我的任务范围以内…… **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那么这样一来,我就要把现代社会**描述**成一个即使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1—42、56—57页。——编者注

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观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观念**的社会——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我们首先来谈谈这所一旦建造起来的房屋吧。这所房屋出租以后，就以房租形式给建造人带来地租、修缮费以及他所投入的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建筑资本的利润在内。视情况的不同，陆续交付的租金总数可能达到原来的成本价格的两倍、三倍、五倍以至十倍。朋友米尔柏格，这就是“简单冷静地陈述”具有**经济**性质的“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结果就是”这样的事实，我们就必须在经济方面进行研究。这样我们就得把这个事实更仔细地考察一番，以便连小孩也不会再发生误解。大家知道，出卖商品就是商品占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取得它的交换价值。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各不相同，其中也在于消费它们所用的时间不同。一个圆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条裤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依我看要100年才住得坏。因此，使用期限很长的商品就有可能每次按一定的期限零星出卖其使用价值，即**将使用价值出租**。因此，零星出卖只是逐渐地实现交换价值；卖主由于不把他预付的资本和由此应得的利润立刻收回，就要靠加价即收取利息来获得补偿，加价即利息的高低并不是任意决定的，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决定的。在100年终了之后，这所房屋就用坏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们这时候从所付的租金总额中扣去(1)地租，包括在此期间可能发生的提价，(2)日常修缮费用，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余数大致是由下列各项组成：(1)原先的房屋建筑资本，(2)建筑资本的利润，以及(3)逐渐收回的资本和利润的利息。的确，在这个期限终了之后，承租人并没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没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这是属于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筑材料，但这些材料已经不是房屋了。如果在此期间房屋的“原先的成本价格

得到了五倍或十倍的补偿”，那么我们将看到，这全靠地租的加价；在像伦敦这样的地方，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在伦敦，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多半是两个人。租金的这种大幅度的加价，发生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而决不是发生在建筑用地的地租几乎始终不变的乡下。大家知道，扣除地租的上涨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资本（包括利润在内）的7%，并且还得从中开销修缮费等等。一句话，租赁合同是一种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论上，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对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涉及劳动力买卖的场合是一个例外；在实践上，这个租赁合同是作为资产阶级千百种欺诈形式之一出现在工人面前的，关于这些欺诈形式我在单行本第4页[①]上已经讲过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的，这些欺诈形式也要经受某种经济上的调节。

相反，米尔柏格认为租赁合同无非是纯粹的“任意行为”（见他的单行本第19页），而当我向他证明情形是相反的时候，他就抱怨说：我向他讲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但是，对于房租的任何经济研究，都不会使我们把废除住房租赁制变为“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崇高的追求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从冷静的经济领域移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得多的法学领域中去。“房屋成为”房租的“永恒的权利根据”——“**结果就是**”，房屋的价值以房租的形式得到两倍、三倍、五倍和十倍的补偿。要明白为什么“结果就是”这样的，“权利根据”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正因为这样，我说米尔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为权利根据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结果就是”这

---

①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样。只有像我那样去研究房租的**经济**本质，而不是对统治阶级用来使房租合法化的法律术语表示愤慨，我们才能知道这点。谁要提议采取经济措施来废除房租，谁就有责任对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说它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对于这一点米尔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

这样一来，房屋虽然决不是永恒的，却被我们变成房租的永恒的权利根据了。不管“结果就是”怎样，我们总是发现，由于这种权利根据，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带来高于它的价值好几倍的收入。由于翻译成法律用语，我们便顺利地远远离开了经济领域，以至于我们只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逐渐支付的房租的总额可能是一所房屋价值的好几倍。既然我们借助于法学来思想和谈话，我们对这个现象也只能用法的标准即公平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是与“革命的法的观念”——不管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不相符合的，因而权利根据也就毫无用处了。其次，我们又发现，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生息资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们就有理由把这几种财产从其他各种财产里划分出来，并且给以特别的处置。这种特别的处置要求：(1)剥夺所有者废除合同的权利，即剥夺他索回自己财产的权利；(2)把租借给承租人、债务人或租佃人的、而并不属于他的财物的用益权无偿地让渡给他；(3)用长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进行清偿，此外不再付利息。这样一来，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把蒲鲁东的“原则”说透了。这就是蒲鲁东的“社会清算”。

附带说说，显然，这整个改革计划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资产者和小农，它**巩固着**他们作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地位。因此，米尔柏格所说的那个传说中的“小资产者蒲鲁东”的形象在这里忽然获得了完全可以捉摸的历史存在。

米尔柏格继续写道：

> “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那么这样一来，我就要把现代社会**描述**成一个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观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观念的社会——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尔柏格在这里得到满足。米尔柏格期望社会**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并且把这叫做描述。如果法庭派一个法警来催促我偿还一笔债务，那么照米尔柏格看来，法庭所做的无非是把我**描述**为一个欠债未还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则是另一回事。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之间的本质区别正好就在这里。我们描述——而每一真实的描述，与米尔柏格的说法相反，同时也就是说明事物——经济状况，描述经济状况的现状和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经济状况的这种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状况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越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就必然要把它炸毁，同时生产力又提供了为社会进步本身的利益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手段。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范（“法的**观念**”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来改造自己。在我们提出证明的地方，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进行**说教**和哀诉。

“革命的法的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根本无从猜测。诚然，蒲鲁东把“**革命**”变成一种体现和实现他的“公平”的神灵；同时他陷入一个不寻常的错误，把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尤其是1848年以后的著作中，都是这样做的；我只举1868年出版的《革命的总观念》第39—40页作个例子。但是，既然米尔柏格拒绝为蒲鲁东承担任

何责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鲁东那里去寻求对“革命的法的观念”的说明，因而我就继续停留在埃及的黑暗[①]中。

米尔柏格接着说：

> “但是，不论蒲鲁东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诉诸于‘永恒公平’以求**说明**现存的不公平状态，更不是像恩格斯强加于我的那样，期望诉诸于这个公平以求改善这种状态。”

米尔柏格想必以为“蒲鲁东在德国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吧。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中，这个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justice éternelle。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这一著作中，下面的一段就反映了这整整三卷说教的内容（第1卷第42页）：

> “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原则，统治、保护、压制、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　这个原则在我看来就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呢？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创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是虚无。它应当是什么呢？是一切。”

这个作为人类自身本质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恒**公平，那又是什么呢？这个作为各社会中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公平，这个至今依然是虚无但应当成为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来衡量一切人间事物的标准，不是在每一冲突下人们所诉诸的最高裁判官，那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不恰好说过，蒲鲁东在判断一切经济

①意即极度的黑暗，语出《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0章。——编者注

关系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只是依据这些经济关系是否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以此来掩饰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无知和无能吗？既然米尔柏格期望“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变更……都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实行”，那么他与蒲鲁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我不会阅读呢，还是米尔柏格不会写作？

米尔柏格接着说：

> “蒲鲁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清楚地知道，人类社会的真正推动力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法的关系；他也知道，一个民族某一时代的法的观念只是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反映和产物…… 总之，在蒲鲁东看来法是历史地生成的经济的产物。”

如果蒲鲁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我愿意不理会米尔柏格的含糊说法并对他的善良愿望信以为真），那么我们还争论什么呢？但是问题在于，蒲鲁东知道的东西恰恰是另一回事。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而在刚才引证的蒲鲁东的主要著作中的那个地方，他明明白白地写着，“各社会中起调节作用的、有机的、至高无上的、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他的一切著作的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都重复着这一点。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米尔柏格继续说：

> “……蒲鲁东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发挥得最透彻的经济上的法的观念，同拉萨尔在其《既得权利体系》序言中叙述得极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战争与和平》也许是蒲鲁东的许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我没有料到这部著作竟会被援引来证明蒲鲁东似乎领会了德国的唯物史观。德国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而蒲鲁东的书

竟是这样缺少唯物主义，以致它不求助于**造物主**，就表达不出它的战争构想：

“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有他自己的目的。”（1869年版第2卷第100页）

至于这本书究竟是依据着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这从它相信历史上存在过黄金时代这一点就可看出：

“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类的需要。这曾是黄金时代，是丰足的升平时代。”（同上，第102页）

蒲鲁东的经济观点是最明显的马尔萨斯主义[173]观点：

“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106页）

那么，这本书的唯物主义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断言战争的原因向来一直是而且始终还是“赤贫”（例如，第143页）。当布雷西希大叔在1848年的演说中冷静地发表“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穷”的宏论时，他也是一个可笑的唯物主义者。

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不仅囿于法学家的种种幻想，而且还囿于老年黑格尔派的种种幻想。拉萨尔在第VII页上明确地宣称：“在**经济方面**，既得权利概念也是推动一切继续向前发展的喷泉”；他想证明：“权利是一个**从自身内部**〈这就是说不是从经济的先决条件中〉发展出来的合理的机体”（第XI页）；在拉萨尔看来，问题是要证明权利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意志概念本身，而法哲学不过是对这种概念的阐发和叙述”（第XII页）。那么这部书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

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不过是一个门外汉。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而著称的蒲鲁东，有时也发表一些言论，表明他似乎是用事实来说明观念的。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一贯思想倾向来说是毫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论即使有也是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的。

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越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越远离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比较是以共同点为前提的：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的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这样便有了共同点。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

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174]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以判断的各种情况很简单，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这一类说法甚至应用于社会事物也不致引起什么误会，可是在经济关系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说法却会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试图保留燃素说的术语会引起混乱一样。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或者像米尔柏格那样硬说燃素①同氧气一样是十分确实的，这种混乱还会更加厉害。

三

再往下，米尔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议论叫做反

①在发现氧气以前，化学家们为了说明物体在空气中燃烧的原因曾假定存在着一种特别的燃烧物质，即在燃烧时消散的燃素。因为他们发现简单的物体在燃烧后比燃烧前重，他们就说燃素是具有负重量的，所以物体不含燃素时就比含有燃素时重些。这样人们便把氧气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渐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颠倒了。当人们发现燃烧就是燃烧的物体与另一种物体即氧气相化合并且已提取出纯氧的时候，就把——然而也还是经过守旧化学家的长期抗拒之后——这种假说打破了。

动的耶利米哀歌：

>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

的确，如果米尔柏格像他自己硬说的那样，只是局限于描述“现时代的惨状”，我当然就不会说坏话来评论“他和他的朴素的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这些“惨状”描述为工人“**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的结果**。不论把“现时代的惨状”说成是废除工人的房屋所有权的结果，还是如容克们所说的那样把这说成是废除封建制度和行会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这种抱怨都只能是反动的耶利米哀歌，只能是目睹不可避免的东西、历史上必然的东西的突然袭来而发出的悲歌。反动性就在于米尔柏格想恢复工人对房屋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已被历史消灭了的东西；就在于他所能设想的工人解放无非是使每个工人重新成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往下他又写道：

> “我要最明确地声明，真正的斗争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出发**，才能期望住房状况得到改善。恩格斯丝毫看不出这一点……　我把社会问题的充分解决当做采取赎买出租住房办法的前提。”

可惜我至今还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当然无法知道我甚至连其名字也不知道的一个人在其头脑中一个秘密角落里把什么东西看做前提。我只能以米尔柏格发表出来的论文为根据。而在那里我直到现在还看见（单行本第15和16页上），为了着手赎买出租住房，米尔柏格所设定的前提不过是……租赁住房。只有在第17页上他才“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关于这点我们回头还要谈到。他甚至在替自己辩解的文章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 “问题倒是应当说明，**从现有情况出发**，怎样才能实行住宅问题方面的完全变革。”

“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应当说废除〉出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啊。

米尔柏格抱怨我把多尔富斯先生和其他厂主帮助工人购置自有房屋的慈善之举看做实际实现他的蒲鲁东主义计划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尔柏格懂得蒲鲁东的救世计划是一种完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驰骋的幻想，那他自然就不会相信这个计划了。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怀疑过他的善良的愿望。但是，雷绍埃尔博士向维也纳市政委员会提议仿效多尔富斯的计划，他究竟为什么要加以称赞呢？

接着米尔柏格又宣称：

> “至于单就城乡对立而言，那么想把它消灭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　问题不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去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形式。这样才可望达成和平的调整，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的均衡。”

总之，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我们且把这个逻辑应用到现代社会的其他对立物上面，看一看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方去。例如：

“至于单就”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而言”，“那么想把它消灭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问题不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去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形式。这样才可望达成和平的调整，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的均衡”。

这样一来，我们又走到舒尔采-德里奇那里去了。

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著作中一贯坚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人应当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只能阻碍这一点的实现。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还要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庞大的设施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毒害伦敦全城，那么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实际基础。甚至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秽气中喘息至少也有30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鲁东那样想变革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同时又保留农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同时这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当有人硬要"从现有情况出发"预先规定一种据说可用来消除现存社会中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对立的**形式**时，那才是空想。米尔柏格采用蒲鲁东的公式来解决住宅问题时，就是在这样做。

其次，我说过米尔柏格对"蒲鲁东关于资本和利息的闻所未闻的见解"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对此他抱怨不已，并且宣称：

> "我是假定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既定的**，而调节利率的过渡性法律并不涉及生产关系，而是涉及社会交易即流通关系…… 生产关系的变更，或者如德国学派更精确地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当然不是如恩格斯所强加于我

的那样，有了取消利息的过渡性法律就会发生，而是只有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拥有全部工业后才会发生。至于劳动人民在这里将热衷于〈!〉赎买还是热衷于立即没收，这一点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我惊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我把米尔柏格的文章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说过，他提出的赎买出租住房是以“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拥有全部工业”为前提的。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它并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实际占有”等等。不过在第17页上却说过：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厘**，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厘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　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　因此，我们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赎买出租住房**是根本消灭资本的生产性的必然后果。**”

可见，与米尔柏格最近的转变完全相反。这里是毫不含糊地说，资本的生产性——他这个混乱的说法连他自己也承认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是可以通过废除利息的法律“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并且正是由于有这个法律，“赎买出租住房是根本消灭资本的生产性的必然后果”。现在米尔柏格却说，绝对不是这样。这个过渡性法律“并不涉及**生产**关系，而是涉及**流通关系**”。碰到这种如歌德所说的“智者和傻瓜同样都感到神秘莫测的”[①]十足的矛盾，我就只好假设我是在和两个不同的米尔柏格打交道：一个米尔柏格理直气壮地抱怨我把另一个米尔柏格发表的东西“强加”于他。

---

①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里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编者注

至于说劳动人民既不会向我也不会向米尔柏格请教在实际占有时他们应“热衷于赎买还是热衷于立即没收”，那是千真万确的。最可能的是，劳动人民宁愿什么也不“热衷”。但是，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涉及过，而涉及到的只是米尔柏格的如下论断(第17页)：“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词中。”既然他现在承认这种赎买是极成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我们两人和读者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

不过，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和拥有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住房、农民田园、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总所有者。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同样，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决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去简单地运用暴力占有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还是为此立即给以补偿，或者是通过缓慢的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试图预先面面俱到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留给别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费这样多的笔墨纸张，才穿过了米尔柏格的重重借口和遁词，终于触到米尔柏格在替自己辩解的文章中小心翼翼避免涉及的问题。

米尔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肯定意见呢？

第一，“房屋、建筑用地皮等等原来的成本价格同其现今价值间的差额”，照理应该属于社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差额就是地租。蒲鲁东也想把地租交归社会，这一点我们在他的《革命的总观念》1868年版第219页中可以读到。

第二，住宅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不再是承租者。

第三，实行这种解决办法，就得通过一项法律把支付房租变为分期支付住房的买价。——第二第三这两点都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每个人都能在《革命的总观念》第199页及以下几页中看出这一点，而且那本书第203页甚至还载有已经编纂好了的有关法律的草案。

第四，通过一种过渡性法律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根据这种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厘，预计以后还要继续降低。这同样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在《总观念》第182—186页中可以详细地读到这一点。

在这几点中的每一点，我都引证了米尔柏格的抄袭品所依据的蒲鲁东原书的有关段落。现在我要问：我是否有权把一篇彻头彻尾蒲鲁东主义的和除了蒲鲁东主义观点外一无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称为蒲鲁东主义者？但是米尔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一“碰见蒲鲁东所特有的某些**说法**”就称他为蒲鲁东主义者。恰恰相反。一切“**说法**”都是米尔柏格的，**内容**则是蒲鲁东的。而当我随后用蒲鲁东的话来补充蒲鲁东主义者的论文时，米尔柏格就埋怨说我把蒲鲁东的“闻所未闻的见解”硬加到他头上了！

那么我对这个蒲鲁东主义计划提出了什么反驳意见呢？

第一，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就等于消灭个人地产。

第二，赎买出租住房并把住房所有权转交给原来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在大工业和城市的当前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谬又反动的；重新实行各个人对自己住房的个人所有权，是一种退步。

第四，强制降低资本利息，丝毫也不会侵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如反高利贷的法律所证明的，这是既陈旧又行不通的。

第五，房屋的租金决不会随着资本利息的消灭而消灭。

对于第二点和第四点，米尔柏格现在已经表示同意了。对于其余各点，他无一字反驳。而这恰好是争论中涉及到的几点。但是，米尔柏格的辩解并不是反驳；他小心地回避了一切正好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这个辩解只不过是针对个人的怨言罢了。例如，我曾预见并谈到他对其他问题如国债、私人债务、信用问题所预告的解决办法，并且指出他的这些解决办法将到处都是一个样子，即像解决住宅问题那样：废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转变为分期清偿资本额，实行无息信贷。对此，他大肆抱怨。尽管如此，我现在仍愿意打赌：如果米尔柏格的这些文章能够出世，它们的基本内容将与蒲鲁东的《总观念》（信用——第182页，国债——第186页，私人债务——第196页）相一致，正如他的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与我从同一书中引证的各段相一致一样。

米尔柏格就此开导我说，这些问题，即税收、国债、私人债务和信用问题，加上公社自治问题，对于农民和乡村宣传都极其重要。我对于这点大体上同意，但是，（1）直到现在并没有谈到过农民；（2）蒲鲁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如他对于住宅问题的解决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米尔柏格暗示说我没有看到吸引农民参加运动的必要性，对于这一点我无须为自己辩白。但

是，为此目的而向农民推荐蒲鲁东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蠢事。德国还存在很多大地产。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大地产都应该分割成为小农户，这种办法在今日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有了法国和德国西部推行小地产的经验之后，简直就是一种反动的东西。相反，现存的大地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走在所有其他社会主义者前面的丹麦社会主义者，早已认清这一点了。[175]

至于责备我似乎把现代悲惨的工人住房状况看做“没有什么意义的琐事”，我也同样无须为自己辩白。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用德文对这种状况的英国的典型发展形式作出描述的人，我这样做并不是像米尔柏格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些东西“打击了我的**法理感**”——谁要是想把一切打击自己的法理感的事情都写成著作，那真是不胜劳碌了——，而是因为，如我在这本书的序言①中所指出的，是想通过描写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态来给当时正在产生的、一味在空话中盲目兜圈子的德国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但是，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没有去研究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细节一样。如果我能证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并且证明现有的房屋足以暂时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么我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苦思冥想未来的社会将怎样调节食品和住房的分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根据对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的认识，我们顶多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5—387页。——编者注

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覆，以往社会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时存在的情况；这些措施在小地产国家里和在大地产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企图单独解决像住宅问题之类的所谓实际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米尔柏格本身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他首先用了28页的篇幅来详细说明"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词中"，后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狼狈地支吾说，在实际占有房屋时"劳动人民将热衷于赎买"还是其他某种剥夺方式，确实还是很难确定的。

米尔柏格要我们**实际些**，要我们"面对现实的实际状况"不要"仅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们"脱离抽象的社会主义，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如果米尔柏格自己这样做了，那他也许对运动会有很大功劳的。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这些状况，根据它们的实际的经济联系来考察它们。但是我们在米尔柏格那里看到的又是什么呢？看到了两个完整的论点，即：

> (1)"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我在单行本第6页[①]中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不对的，而米尔柏格对此则根本无言可驳。

> (2)"必须〈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那头牡牛，就是国民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派所谓的**资本的生产性，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它却以其假想的存在**来掩盖压在现代社会身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

可见，必须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那头牡牛"**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也就没有"双角"可抓。祸害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假想**

①见本卷第253—254页。——编者注

的存在。虽然如此，“所谓的〈资本的〉生产性却能从土地中变出房屋和城市”，而这些东西的存在决不是“假想的”（第12页）。一个虽然“也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却这样不可救药地胡言乱语的人，竟然要向德国工人指明一条新的更好的道路，并且还自命为“至少大体明了未来社会建筑结构的建筑师”呢！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了。他用了25年工夫来从各方面研究社会状况，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总是包含有一些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尔柏格不满足于此。这都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尔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却满足于阅读蒲鲁东的几卷著作，这几卷东西在关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方面虽然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东西，可是却给他提供了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明确具体的神奇药方。米尔柏格于是把这个现成的救世计划，把这个蒲鲁东**体系**奉送给德国工人，借口是：**他**本想“对**体系**说声再见”，而据说我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要弄通这一点，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尔柏格是聋子，我们彼此根本无法沟通。

够了。这场论战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处，无论如何总有一个好处：它表明了这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到处都总是由那些宗派鼻祖们炮制出来，而这些人总是出现在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幼年期的时代。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很快就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产生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对于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

要知道在每个具体场合下应该反对哪些社会制度并以何种方式发动主要攻击，这是**永远不会**有困难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5月—1873年1月

载于1872年6月26和29日，7月3日，12月25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53、103和104号；1873年1月4和8日，2月8、12、1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2、3、12、13、15和1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4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弗·恩格斯

论 权 威[176]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要想给这种或那种行为定罪，只要把它们说成是**权威的**就行了。[177]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迫使我们不得不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以另外方式行事的办法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状态来，使这种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孤立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孤立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照管着由蒸汽推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划桨船和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棉纺厂作例子吧。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机械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粗工把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所确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就工作时间取得一致；而工作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的细节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①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

①这里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第3篇第3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编者注

再拿铁路作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以某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拿世界开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将只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

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

载于1873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年鉴》1874年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178]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从事某种政治活动，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一些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该谴责一切温和的运动，如英美工人由于坏习惯而从事的那种运动。工人不应该努力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仍能对他们进行10小时或12小时的剥削以代替14小时或者16小时的剥削。工人也不应该努力争取从法律上禁止10岁以下的女童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10岁以下的男童的剥削：工人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一种新妥协，破坏了永恒原则的纯洁性！

“工人更不应该要求靠勒索工人阶级来编制**预算**的国家去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就像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还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上国立学校教师的课好些。即使无知和每天16小时的劳动使工人阶级变得麻木不仁，也比违反永恒原则要好得多！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暴力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

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违反原则的滔天大罪，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平凡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各行各业的单独的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导致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当前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所有这些运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成果。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也要保持永恒原则的洁白无瑕！'工人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渴求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一日在世上某个角落发生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和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做天堂，就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惧怕警察，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他们应该当心，只能围绕没有可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空发议论，此外千万不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任何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么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看做资产阶级空论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

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的名义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已经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他们过于胆怯，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诉诸优良的旧传统、谦逊、诚实和永恒原则究竟能走多远。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然仅仅去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并谴责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一切尝试，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参与政治活动。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将是不可饶恕的。

但是后来，在1839年，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欧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鲁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论**的人中间的一个——出版了一本题为《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的书。

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的一切补救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评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时间、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但不能使

我们摆脱目前的社会状态，反而会使我们依附于这种状态，并使对立进一步尖锐化。

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抵触的任何经济运动（如组织同盟、罢工等），但是他却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自参加的行动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则不敢公开反对这种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伟大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出版时，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①]。但是在1864年，当奥利维埃法（诚然，这个法律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给了法国工人以组织同盟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鲁东回过头来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又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这位老师的抨击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伦敦裁缝大罢工时，《泰晤士报》赞赏地摘译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用他说过的话来斥责罢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证。

里沃-德日耶的采煤工人曾举行罢工；为了使他们头脑清醒，往那里派去了士兵。蒲鲁东大声疾呼道：

> "枪杀里沃-德日耶的采煤工人的当局已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它是像古人布鲁士斯那样行动的。布鲁士斯不得不在父爱和自己的执政官的职责之间作出选择：必须牺牲自己的儿子，以拯救共和国。布鲁士斯没有犹豫，而后世也不敢谴责他。"[②]

工人们都不记得，有哪一个资本家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牺牲

---

①见《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弗兰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

②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社版第327页。

他的工人的时候曾经犹豫过。这些资产者算是什么布鲁土斯!

> "不,没有组织同盟的权利,就像没有欺骗和盗窃的权利,没有乱伦和通奸的权利一样。"①

但是,必须承认,肯定有**愚蠢**的权利。

在永恒原则的名义下,这位老师发出不可思议的诅咒,而这些永恒原则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第一条永恒原则:

> "工资水平决定商品价格。"

一个人即使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且不知道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②一书中已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这个因袭的错误说法,他也会知道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英国工业能够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商品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国的工资却相对地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

第二条永恒原则:

> "准许组织同盟的法律是极端反法学和反经济学的,是同任何社会和制度相抵触的。"

总之,它是"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抵触的"。

如果这位老师不是那么激烈的沙文主义者,他会自问,在英国,早在40年前就颁布了一项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完全相抵触的法

---

①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社版第333页。

②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

律，这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这个同**一切社会和制度**完全相抵触的法律，甚至迫使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把它当做某种必要的东西加以采纳。他也许就会发现，这种**权利**（大写的权利）只存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无知兄弟们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不乏下面这样一些珠玑般的妙语：**财产是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加上**他人的**这几个字。

第三条永恒原则：

>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阶级摆脱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竟去诽谤整整一个市民阶级，即老板、企业主、雇主和资产者的阶级；他们煽动工人民主派鄙视和仇恨这些不体面的中等阶级的代表；他们宁肯要商业战争和工业战争而不要合法的抑制手段，宁肯要阶级对抗而不要国家警察。"①

为了阻碍工人阶级摆脱他们的那种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师谴责那种使工人阶级组成同**雇主**、**企业主**、**资产者这类**可敬的人相对立的阶级的同盟，这类人当然和蒲鲁东一样，宁肯要**国家警察**而不要**阶级对抗**。为了使这个可敬的阶级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鲁东在**互助论王国**到来以前，向工人推荐"自由或竞争"，认为它（尽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为"我们的唯一保障"。②

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如果说曾同样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的早期基督徒曾经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们自己从被压迫者

---

①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社版第337—338页。

②同上，第334页。

变成压迫者，那么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则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永恒原则将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世的享受和暂时的特权。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会以基督教殉道者应有的禁欲主义精神来忍受落在工厂工人肩上的14小时或16小时的劳动。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底—1873年1月初

载于1873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年鉴》1874年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179]



一　波兰人的声明[180]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佐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市中心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战略原则作了严格部署，——可是，所有这些辛劳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佐夫斯基，没有响过一次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辛劳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5英镑，督察员每人2英镑（合100马克和40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181]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期间在伦敦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外，伦敦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①，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沙

①本段和以下引文，均引自《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第2—5页。——编者注

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自诩为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么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从而使这两个各在自己的时代领先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头等的军事大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而令其感到不快。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随时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捍卫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先锋。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不受干扰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而且只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于16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所以能继续向前发展，工商业和财富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200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代理人才被解除了武装。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波戈金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俄国躯体中的一根刺，现在应当使它成

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 “我们将用一个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重新亲近起来。现在所有斯拉夫族都在受奥地利的压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的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①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

>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说我本来就该活着的话，那么我就要而且也一定要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了波兰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被第一次瓜分[182]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借助1791年5月3日的宪法[183]在维斯瓦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昔日的混乱状态由此而被消除；如果再有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

---

①引自《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第3页，另参看米·彼·波戈金《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1867年》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编者注

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东北欧而站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做到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做到的事情。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独立的丧失，依靠自己的爱国心，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锋，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它本身、历史以及未来所赋予它的义务。”

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的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都作了阐述。[184]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1845年的宣言是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得到波兰各地代表的确认；它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提法——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归咎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上述决定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作出了，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要确立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一贯图谋的一个幌子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185]，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以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

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野蛮的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行动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最后就是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的特点，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来就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所具有的重要性谈几点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有了怎样的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有了多么大的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尽管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一直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82]；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泰申和约[186]要求并得到了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王朝成员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又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违背己愿跟着俄国走，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准备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18]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

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28]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加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沙皇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不让他的德国藩臣袒护他们，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推行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60]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①，——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保护伞，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其他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的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

①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中已经谈到。

动势力和俄国军队。

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本质上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怀有贵族欲望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1846年[187]和1863年[185]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把文化斗争[188]引入波兰并且借口教皇受亵渎而取缔波兰文教科书，限制使用波兰语，并且利用各种办法迫使波兰投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越来越接近俄国，以便在它的统治下至少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参加国际的斗争行列。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波兰的恢复，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身来说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俄国失去波兰之日，

也就是俄国国内的运动强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之时。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而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陷入崩溃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了，而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189]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它们互相责难，说对方把事情搞糟了，骂别人有背叛行为和犯了种种可能的重大罪孽。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出版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内就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而是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互相间的责难就越积越多，最后发展为普遍的吵闹。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明智的人，只要有可能以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的争吵，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的诽谤运动，特别是在伦敦，由于那里设有被法国全体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而对流亡者掀起了诽谤运动，有一个时期，流亡者们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争执。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

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连一篇像样的宣言也提不出来;而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33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取得革命胜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在搞密谋时通常会发生的事情:那些对没完没了地保证马上就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听任密谋瓦解,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方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制造出来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能无可救药地充当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33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33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①]，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顺便说一下，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来说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居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当做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在无所事

①席勒《保证》。——编者注

事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情形一样，他们卷入了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界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老头》，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的可怜的模仿。[190]为了回答他的对手们的道义上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

>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①

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的33位布鲁土斯认为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一展身手！

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过了1871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高见。

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次大危机，由于灾难深重似乎陷入绝境并走向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对于那些硬要在一个从他们的角度，即从革命攻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有所作为的时刻成为“实干家”的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信条。

---

①海涅《罗曼采罗》第3集《希伯来调》第86行。——编者注

这已成为老一套的成规。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到来了”。

于是，这33个人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3)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与巴枯宁主义者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后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的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困难。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那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整个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也仍然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但愿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昔日苦难的这个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苦难的这个原因〈这个不存在的神竟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

而这个要求,即遵照穆夫提的吩咐①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体验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用不着去实际执行;其次,迫害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条,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188]中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在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一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并且声称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是由于国际拒绝按这五个人的意见推行革命。[191]现在33人委员会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者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下了从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个可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

①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编者注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①等等。

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下降到实践的领域，这33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寿命。”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抱有善良的愿望，想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令人信服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这33个人是“革命家”。

而在这个方面，就大言不惭而言，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

---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编者注

有责任要胜过他们。怎样胜过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

>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处死人民的敌人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接着列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我们要求对旨在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纵火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评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月的那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硬要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做了各种蠢事,尽管他们让小伙子卡尔[①]装出吓人样子的种种尝试变成一出出滑稽戏,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

①此文在1874年发表时在“卡尔”这个名字之后还写有“(或爱德华?)”。后者暗指爱德华·瓦扬。——编者注

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事实看做良好的预兆。

三[192]

在伦敦有一家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ëd!”）。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①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做是真正的革命的食人者、那些把对任何东西的尊敬都叫做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指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比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连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重要的是，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

①彼·拉甫罗夫。——编者注

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着急去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是蠢举。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种闹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么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得到了巨大发展。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捏造种种借口，通过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又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责任心，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193]作出决议，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以证明开除是正当的。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贡品奉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①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矛头指向站在联邦主义者前

---

①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 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①

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人证明，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报》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②，这篇小品文

>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队伍中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其对立面则是所谓的**集权主义者**，这说明作者似乎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事实将证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的一篇作为订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结论，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政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换个方式就会使自身遭到实际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暗自称快一下的，只要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

①引自彼·拉甫罗夫《工人运动年鉴》，载于1874年《前进！》杂志第2卷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编者注

②卡·塔勒《耶稣会会士罗特》，载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3285号。——编者注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凭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作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推事乌尔里希斯）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而只迷恋男性，而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那么，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另一个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

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尽可以吃惊不已,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拙劣作品,那么这种做法是很难确定其性质的。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个报告,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明明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的人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是为了更好地描绘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耶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欧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务的俄国人自己,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只是在俄国建立自己的英雄业绩,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应把他们当做靶子。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自己的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应当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

况且,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大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像

癞蛤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世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负有的共同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

“我们不知道，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们如何看待该书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本小册子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共享快乐。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站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监禁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中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与《前进！》杂志的工作；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请注意，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事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从

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请注意,后边这些人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编写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主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里,一种稚气立即暴露出来了,它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虽然不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编写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则不是那么粗野。朋友彼得同样“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的。深受委屈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从那里用自己的小册子向朋友彼得开火,称其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者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已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指责朋友彼得,说他的罪行就是要人民为革命**预先做准备**,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据说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信徒,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懂得人民是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的”;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明白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耶夫这位“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做好发动革命的准备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60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194]。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有权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此外还发表了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平庸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泛泛空话的九霄云外进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指责自己的对手，当然就不能回答对手的指责。发生这种"可悲现象"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沉重"，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很清楚地知道，俄国流亡者的全部文献包括的都是些互相指责的小册子，其中争论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

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争的文献，使读者感到厌烦，对革命斗争事业也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 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必须写这些篇章，必须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厌烦，敌人称快…… 所以必须这样做，因为两害相权应取其轻。"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么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不是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吗？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不幸的了。他怀着完全知罪的意识还没有做完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赶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在《新自由报》上撰写小品文提供新材料。

"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两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可耻地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两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耶夫。他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

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品质…… 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在斗争中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做是这种可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劫掠和不劳而获的旧欲望…… 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他们在口头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把他们的信徒培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工具,好像社会革命通过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通过一个由那些在行动上经常否定在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似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很像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两者的相像看起来就像两个鸡蛋一样,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做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该书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作者们如何看待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篇文章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迄今的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好像是天书一般,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

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肮脏的东西，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通晓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罕的事情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学习的。俄国人应当融入国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要在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前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因以前与外界隔绝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处于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从终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

四[195]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打交道，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根据作者不朽著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中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竟认为有必要和这样的对手周旋。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1874年由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的彼得·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这封信把这位特卡乔夫先生理应知道我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不在乎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向德国工人提供了有关俄国状况的完全不真实的描述，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有关俄国的活动作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以最不利的色调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

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硬要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的话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差别和重大的环境差别充分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30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像癞蛤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①]。因此,必须首

①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

先确定，“俄国革命者”无论先前和现在都与这里的问题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做“我”。

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打击**，彼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几下，但是**主意**？①劳驾请提出证据。

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10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

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他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不过，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引文。

此外，据说我还“嘲笑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单调乏味的人，而且在许多时候确实也应该博得这样的称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巴枯宁主义者那样单调乏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察、检察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气质；我为什么要否认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力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同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

①“打击”的德文是“Schläge”；“主意”的德文是“Ratschläge”。——编者注

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他们在暗处这样干的时候，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活动，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俄国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来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面前败坏作者自视为其代表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责骂，即所谓讽刺挖苦，是最有效的雄辩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著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么这本身也决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做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以下一段文字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

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编写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再列举证据来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成熟。下面那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已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么《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

> “我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慨…… 学习吧！提高自己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深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提高自己上面？”（第14页）“知识——这确实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①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单纯号召学习都表示愤慨，既然他宣称一切知识对革命者说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点知识的痕迹，那么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自己为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们看来**顶多**只能达到中学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达到了他可能达到的这种最高的程度，决不是骂他，而是给了他甚至可以说是过多的荣誉。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

①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

话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这也是准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充分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克,比做德国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著作家之一,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从那里用自己的小册子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一听到学习二字就勃然大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诗句

> "他自己为自己赢得
> 他自己的全部无知"①

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就为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提供了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

①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 您会指出，既然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为什么不这样干，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您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 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只是我们深信这一点，那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别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越多，我们就越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我们就越容易实际完成这个任务。"①

这简直太好了！这听起来多么亲切，多么通情达理，多么善良崇高，多么令人信服。这听起来完全好像是说，特卡乔夫先生写自己的小册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文字宣传的益处，而我这个没有耐性的黄口孺子却回答他说：文字宣传见鬼去吧，现在就该举事！——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报刊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报刊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就是这样崇尚一般文字宣传的。如果就细节来说，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者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而必须探究根据，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

"您的哲学斗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

①彼·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页。——编者注

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①

你们看，我们越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我们就越陷入绝境，越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

"难道您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起义；他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向他指示时刻，而来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知道人民随时都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0页）…… 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得很久以后才干，也许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的作用，都是革命的；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 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页）…… 现在哪有工夫长期集训，哪有工夫没完没了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知道怎么干就怎么干。"（第39页）①

我认为这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在于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么，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

①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

的话，末了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

他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声称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我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说要进行**文字宣传**，而连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厚着脸皮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

等待！搞文字宣传！而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革命拖延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革命必须现在就干，不然也许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据说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说话的人就叫做彼得·特卡乔夫！

这套现在被轻蔑地抛弃的关于立即起义的大话，我称之为“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套大话竟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段话。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绘：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载歌载舞的快活日子来……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应有尽有，要多少有多少。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总是有节日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从早到晚

随时可以享用。他又吃又喝,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干少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什么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①

一个编得出这类宣言的人,对于我仅仅把他叫做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居然还要愤愤不平!

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

"您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责骂我们还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②

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再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刚刚还在强调从国外传入俄国的文字宣传的重要性吗?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途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被杜绝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什么说法。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俄国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学生,而是工人。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我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那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

①彼·拉甫罗夫《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伦敦版第47页。——编者注

②彼·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编者注

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诩为“活动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同谋者为根基的欺诈性密谋，即不去搞涅恰耶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即不去搞幸而被揭穿从而被摧毁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放开喉咙演出一场四重唱，各自喊着：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套关于广泛进行的密谋的牛皮大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无非用来掩盖对于各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以及在革命党内进行充满野心的帮派活动的事实。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①，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所处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只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原来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他的最糟糕的作品。上述著作把他描绘得还过于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196]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污秽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

①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柱”。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明，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以讲，并且在适当时机确实也要讲。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即摆出一副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极为相称的面孔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些论断，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涉及个人的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97]

特卡乔夫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的确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　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198]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是生产

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不是无产者，而是**有产者**"——要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权力…… 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 在你们那里国家不是虚幻的权力，它用双脚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 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式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过去，而不是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认为经济利益需要有它们本身所创造的国家来充当自身的**体现者**这样一种混乱的观点，也不去谈论说什么俄国的社会形式〈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其中的〉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样一种大胆的论断，也不去谈论认定这个国家本身同据说是由它创造的现存社会制度"毫不相干"这样一种矛盾的说法。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 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简便起见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 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 300俄亩。可见，农民

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充当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后盾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交纳19 500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交纳1 300万！贵族的土地收获量平均比农民的高一倍，因为在赎免徭役后接着分配土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走而转交给贵族的，不仅是大部分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免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无法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由国家替他们垫付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消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份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交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从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交纳土地税，交付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和分期偿付赎金以外，自从新近建立地方管理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交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专为高利贷者制造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阶段的贸易，利用有利行情和玩弄与此密不可分的欺诈手腕方

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越来越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也常常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实物工资制十分盛行。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挨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国有土地,当土地不用施肥就能得到很好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耗尽地力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实物工资制,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不折不扣的爱尔兰式的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便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而所有这些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同运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吸血鬼的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近10年来那批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空前迅速发展并在最近的投机年代倒霉地“一同遭到破产”的大资产阶级,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颇有分量的、迅速成长的因

素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俄国、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群体,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同义反复。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从赫尔岑年代起,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它就具有某种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狩猎民族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事实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事实,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拉普族、萨莫耶德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

以见到。[①]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德意志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②]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领导(starosta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1)是为了暂时性的事业而建立的，事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

(3)是为了真正的工业企业，即永久性的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么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全体以雇佣工人身份受雇于某个企业主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样就为资本

①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Sbornik materialov ob Arteljach v Rossiji”(《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

②此文在1875年发表时接着还写有下面这句话：交易所也是一种劳动组合。——编者注

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给他们生活资料，从而又实行起最可鄙的实物工资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雇用本团体**以外**的人作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建有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40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土方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劳动组合本身应当能够向前发展，抛弃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为工人不如说为资本家服务的形式，并且它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即使这一次可以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问题也远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人为地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自担风险、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如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

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它甚至必然要亡于大工业。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的故乡威斯特伐利亚也能找到不少公社所有制的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有义务确切了解这种残余的情况。①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能达到多远的境地〉深深地生长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的各种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些原则想把个人所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来，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后者是较有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度日耳曼语系各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在发展中曾受到印度影响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见到。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合法存在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曾被英国人用做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

①参看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编者注

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德意志公社所有制的更精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199]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取消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首先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状态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阶段，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在俄语中，*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mup*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状态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同这种状态竟“毫不相干”！——俄国向**资产阶级**的方向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有地，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不时在各个家

长之间进行分配，并且每家各自耕种自己的一份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社员间在富裕程度上的极大差异，而这种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

> "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详细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沉重打击的仍然是赎免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只勉强够，往往是根本不够维持生活。此外，森林也转归地主；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用，不能保证他一家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①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

①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W Zacholusti i w Stolice"(《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写的。

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是单独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①;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有产者",但比西欧无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率。他说,俄国人民用"组成教派……抗税……建立强盗集团〈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有利于人民事业。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

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

---

①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分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

时发动起义，则“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早就去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了**冒名沙皇的人**充任农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俄国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哀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免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也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我们设想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么请问：是否容许一个12岁以上的人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那样极其幼稚地设想革命的进程呢？大家还要进一步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在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在那里人们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3 000个士兵，在14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

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1]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额已无法再往上提高,旧国债的利息要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举借新公债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筹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下降。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越来越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越来越失去信用。同时,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但他们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这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反对奥地利的

---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战争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5月中—1875年4月

载于1874年6月17和26日，10月6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4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200]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终的理想,至少也要看做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它去统治谁呢?这就意味着(这就是说,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从属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例如,大家都知道,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чернь,即普通农民,贫贱农民,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统治。"

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农业短工取代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

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迄今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有产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从他们的状况来看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当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和城市工人**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做；尤其不能像在巴枯宁的革命进军中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分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地产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

"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278页）

小学生式的蠢话！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至少应当善于变通，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想得真妙，劳动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压迫！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这方面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是具有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形式）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经济形式下，**彻底的革**

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按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间的差别。但也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别！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 “如果有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就必然有统治（господство），因而也就有‘奴役’；离开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页）
>
> “‘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一个个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获得的力量和组织使它足以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时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政府的首脑？”

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工会全体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中，人人都在“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员将同时掌管一个“地区”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地区”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

> “德国人大约有4 000万。难道4 000万人全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当然如此！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

"全民都将成为统治者，而被统治者也就没有了。"

如果人自己统治自己，那么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统治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而如果有国家，就会有统治者和奴隶。"(第279页)

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即巴枯宁〉所理解的人民的统治，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统治。"

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瞎扯！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

像全民这样的东西，在目前的意义上是幻想——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进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貌似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让位给合作社的

真正意志。

"因此结果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

在哪里说的？

"将由工人构成。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而决不像目前的工厂主，他们并不因当了市镇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

"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代表的，将不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统治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页）

如果巴枯宁先生对工人合作工厂中的经理的地位只要有一些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见鬼去吧。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会具有什么形式。

（第279页）"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狂热而坚定的信念的、并且是博学的社会主义者。'**博学社会主义**'这个词"——

还从来没有人使用过。

"**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

“在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使用。这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博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统治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知识的，这就是说，他们将从从事统治的操劳中完全被解放出来，完全被当做被统治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啊！”（第279—280页）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博学者的统治〈简直是胡说！〉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憎恨、最可鄙的统治，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他们便想象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

不，我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的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只能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教育人民和从经济上与政治上提高人民〈酒馆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统治很快都变得无用，国家丧失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自行变成各种经济利益和各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大众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么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大众的国家呢？”（第280页）

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是同《共产主义宣言》①等等相抵触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谈，这里的意思只不过是：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因此自己的运动还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放弃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什么也别干，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通过同他们的**论战**〈这场论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和《共产主义宣言》问世以前，甚至早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好一个逆序法！〉，**我们**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先生仅仅是把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状态翻译成野蛮的鞑靼语罢了〉，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胡说八道！〉，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任何‘国家’，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280页）。

卡·马克思写于1874—1875年初

第一次发表于1926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201]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给我们通报任何情况，因此，我们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登载的东西，而且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直到大约一星期前才登出了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202]，因而就连每个小孩子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跑来表示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无法靠损害我们党的利益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否合并要看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203]或这个纲领的适合目前情况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

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放弃国家帮助这个救世良方，即使不完全放弃，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次要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204]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这样的国家，那里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国家和社会，而且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跟着资产阶级彻底完成了这种变形。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么，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够多年同他们，同人民党[205]携手一道走呢？《人民国家报》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怎么能够取自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呢？怎么能够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不下七项在字句上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完全一致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5和1—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206]。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实际上在当前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坚持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性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尝试，而各国工人到处都极力强调这个原则的时

候，竟要德国工人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207]中的资产者的“欧洲合众国”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始终准备着一如既往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本国工人移居国外，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刊物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在这种战争期间采取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208]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过多（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非常复杂，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件事根本不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就能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

积累过程》①这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在这之前，白拉克已经非常出色地指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209]，并且我们党的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几乎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都已经被迫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我们党不能比这更忍辱屈从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德·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针对社会主义者**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排挤他们！

但是，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下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这个目的在纲领草案中是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这样说：德国工人党力求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日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这种组织即使今天遇到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也决不会被摧毁。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51—887页。——编者注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做的。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多。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官吏对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都应当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①和后来的《共产主义宣言》②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

---

①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②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别”，这也很成问题。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更精确的叙述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它是这样一种纲领，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还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210]人们就是以为，我们在这里指挥着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会理解，这个纲领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同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一道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倒退一步。我们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

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208]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比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①不可。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想必已经使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重新获得"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有力地反对它自己一度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么,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以外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被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说成"反动的一帮"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暗中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知道我们的意见。因此,我把这封信寄给他,由他转寄,这样他也可以看一下此信,而我就用不着把这件麻烦事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也把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

---

①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1幕第3场。——编者注

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虽说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多次不愉快的通信——，而这一次做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颇有裨益。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弗·恩格斯写于1875年3月18—28日

第一次发表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卡·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211]



Nr. 18. IX. Jahrgang, I. Band. 1890-91.

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s.

Aus dem Nachlaß von Karl Marx.

Das hier abgedruckte Manuskript — der Begleitbrief an Bracke sowohl, wie die Kritik des Programmentwurfs — wurde 1875 kurz vor dem Gothaer Einigungskongreß an Bracke zur Mittheilung an Geib, Auer, Bebel und Liebknecht und spätern Rücksendung an Marx abgesandt. Da der Haller Parteitag die Diskussion des Gothaer Programms auf die Tagesordnung der Partei gesetzt hat, würde ich glauben, eine Unterschlagung zu begehn, wenn ich dies wichtige — vielleicht das wichtigste — in diese Diskussion einschlagende Aktenstück der Oeffentlichkeit noch länger vorenthielte.

Das Manuskript hat aber noch eine andere und weiter reichende Bedeutung. Zum ersten Mal wird hier die Stellung von Marx zu der von Lassalle seit dessen Eintritt in die Agitation eingeschlagnen Richtung klar und fest dargelegt, und zwar sowohl was die ökonomischen Prinzipien wie die Taktik Lassalle's betrifft.

Die rücksichtslose Schärfe, mit der hier der Programmentwurf zergliedert, die Unerbittlichkeit, womit die gewonnenen Resultate ausgesprochen, die Blößen des Entwurfs aufgedeckt werden, alles das kann heute, nach fünfzehn Jahren, nicht mehr verletzen. Spezifische Lassalleaner existiren nur noch im Ausland als vereinzelte Ruinen, und das Gothaer Programm ist in Halle sogar von seinen Schöpfern als durchaus unzulänglich preisgegeben worden.

Trotzdem habe ich einige persönlich scharfe Ausdrücke und Urtheile da, wo dies für die Sache gleichgiltig war, ausgelassen und durch Punkte ersetzt. Marx selbst würde dies thun, wenn er das Manuskript heute veröffentlichte. Die stellenweise heftige Sprache desselben war provozirt durch zwei Umstände. Erstens waren Marx und ich mit der deutschen Bewegung inniger verwachsen als mit irgend einer andern; der in diesem Programm-Entwurf bekundete entschiedene Rückschritt mußte uns also besonders heftig erregen. Zweitens aber lagen wir damals, kaum zwei Jahre nach dem Haager Kongreß der Internationale, im heftigsten Kampf mit Bakunin und seinen Anarchisten, die uns für Alles verantwortlich machten, was in Deutschland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geschah; wir

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上发表的
恩格斯为《哥达纲领批判》写的序言



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序言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212]召开以前不久寄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213]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而且既涉及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也涉及他的策略。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15年以后的今天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地道的拉萨尔分子只是还有个别的残余存在在国外，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制定者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放弃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内容不受影响的地方，把一些涉及个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同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密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

的明显的退步，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那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93]闭幕才两年，我们正在同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我们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负责；因而我们不得不预先想到，他们也会把我们说成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制定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保留有关词句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

还由于新闻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也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在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加上了方括号。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1月6日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给威廉·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下面对合并纲领的批判性批注,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注意:手稿必须退还给您**,以便我必要时使用。①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量。所以,写这么长的东西,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朋友们(这个通知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

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212]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214],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②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从这里秘密地操纵所谓爱森纳赫党[215]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③

①这句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写在信头上,并标上一个符号+。1891年发表时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②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③指巴枯宁1873年在瑞士用俄文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编者注

中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205]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①

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哪怕用外交式的沉默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203]，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把这件事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

拉萨尔派的首领们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这就等于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无条件投降。[216]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妥协代表大会以前**又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217]人们显然是想回避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②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完全要不得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分册寄给您。排印工作

①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不仅”二字和“甚至……负责”这半句话。——编者注

②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

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分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伯恩哈德·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把最后几分册[218]寄给他。①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219]有自己的习惯。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②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75年5月5日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①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②指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第2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

一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现在不管这句话有什么毛病，我们且把它放在一边。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样的字眼硬接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而不是从第一句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按照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可以说，只有在社会中，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种行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游手好闲过日子，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那只能是产生预期的有益结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其中只有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才归各个劳动者所得。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先驱**[①]提出过。首先要满足政府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者[②]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词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③]。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首要口号写在党的

---

①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捍卫者"。——编者注

②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③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社会祸害"。——编者注

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 2."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错误的了。①

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指名。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仅仅**攻击资本家阶级，而不攻击土地所有者。[220]在英国，资本家甚至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加在消耗掉的生

---

①马克思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的原话是："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编者注

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①]**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狭隘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现在，"劳动所得"一语本身也在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

---

①1891年发表时没有"直接"一词。——编者注

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

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①]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义，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

①1891年发表时这里没有“他们的”。——编者注

4."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①;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补偿,后一句引用了地道的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主义宣言》②中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③

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在这里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而封建主和中间等级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④

①马克思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的原话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编者注

②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1页。——编者注

④同上,第42页。——编者注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221]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说过：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主义宣言》①，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他的格言是勉强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而且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222]所干的廉价的蛮横行径之一。

> 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主义宣言》①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进行活动以后！

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就内容来说，而像《共产主义宣言》①所指出的“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207]那里抄来的话,是要用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德国工人阶级竟然应当这样去对付为反对它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实现兄弟联合的本国资产阶级,对付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223]!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信念,比自由贸易派[224]的国际信念**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意识到一切民族只在本国从事贸易。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使其主子满意,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这倒是完全说对了。[225]

二

>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后面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必须信奉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208]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围绕着这个所谓的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宗派已经获得胜利，应当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226]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正统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所说的意义上的规律，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起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所表明的[227]，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3]。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

把雇佣劳动废除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50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表述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在我们党内越来越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的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终于发现了自己受奴役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念所束缚的奴隶竟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某个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竟如此粗暴地践踏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纲领时是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轻率，多么无耻[①]！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道路"确实"开辟"得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一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

①1891年发表时没有"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和"多么无耻"。——编者注

的民主监督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深入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的、被《工场》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228]，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说工人们想要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国的范围内创造合作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力争变革现存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有的合作社，它们**只是**在工人自己独立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四

现在我来谈民主的一节。

A. “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争取建立“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229]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

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205]、和平和自由同盟[207]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了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国家”就是**现代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还没有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应当忘记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切美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①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204]也不体面的②手

①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既然他们不可能”。——编者注

②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①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85]，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交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因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 B．“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
> 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

①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并且……这类东西！”这半句话。——编者注

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一级的"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项第5条所要求的"实行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他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中,至少应当把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同国民学校联系起来提出。

"**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词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整个纲领是这两种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这两种信仰都同样远离社会主义。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188]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①，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附带部分不是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正常的工作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工作日是正常的。

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儿童劳动。”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工作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么工作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就应当说清楚。

“禁止儿童劳动”！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

①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编者注

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当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

5.“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性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当明白说出，工人们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应当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什么意思。

顺便指出，在正常的工作日这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附带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①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230]

①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

哥达纲领批判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75年4月底—5月7日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1923—1939年间载有《哥达纲领批判》中译文的部分书刊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231]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里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但不久就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232]，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在他的协助下，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等人，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报》，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233]，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书报检查机关对它没有办法①。《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那些重要的文章；先是给书报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有十家报纸有《莱茵报》这样的勇气，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么德国的②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行不通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

①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务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隆日报》上关于**菲拉莱泰斯**（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翻译的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不应拿神圣的东西搞喜剧”。

②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删去了“德国的”一词。——编者注

它把书报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它要受双重检查，在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查封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他以在该刊物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①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234]。据说亚历山大·洪堡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235]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236]，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237]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得到根本的改造；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国、比利时、法

①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国、瑞士的几乎所有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是在伦敦)多次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曾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16]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运动，看来比利时的时局就要发生突变的时候，比利时政府便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盲目行动。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当即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238]以后，马克思迁到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家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

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行为是“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239]，因为上自国王①和帝国摄政②，下至宪兵都遭到该报攻击，而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当时拥有8 000兵员的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隆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就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告知科隆的检察官，要求进行法律追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报纸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当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抗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被宣判无罪[240]。最后，1849年德累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241]，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242]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100]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要么迁到布列塔尼，要么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奥地利大公约翰。——编者注

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版；第二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其后在波士顿，近年又在莱比锡印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隆被判罪[243]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10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浑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以争取德国持中立的，甚至同情的立场。福格特蓄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大肆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们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证明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244]所收买。整整10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

雇佣人员名单里，在字母V①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②

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本要点。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的定稿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夙愿：创立一个把欧美最先进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资产者及各国政府面前，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体现，会使无产阶级受到鼓舞，变得坚强，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感到恐惧。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1]成立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193]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1864年的成立宣言直到1871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撰写欧洲工人还记忆犹新的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无法存在下去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的前台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都无法再展开任何

①"福格特"德文的第一个字母是V。——编者注

②见《皇室文件和通信》(两卷集)1870—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页。——编者注

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245]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招致失败和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而不了解或无视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那些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局势下不可能满足仍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而要照旧充分展开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鉴于这种形势,它暂时退出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常常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任何想假借国际的名义策划无谓暴动的企图被制止了;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唤起的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一条纽带,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条纽带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种束缚。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开始他的理论工作,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

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农民公社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并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交往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跻身于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区域，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而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有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它在落后国家里排挤旧式手工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创造出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被排除于政权之外，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

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专业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156]以及工

业不振的状态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总额，而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这种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体现在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量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

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表现为同样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①]。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让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7小时、第8小时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酬劳动的产品，首先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首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数不多并且仍在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在《资本

---

①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的“劳动”一词改为“报酬”。——编者注

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愿马克思不久就能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中

载于1878年在不伦瑞克发行的《人民历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246]

编辑先生：

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①，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的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②的批评性插话③。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④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⑤的努力的看法

①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②亚·伊·赫尔岑。——编者注

③参看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译)1987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750—751页。——编者注

④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编者注

⑤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这段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引用的是俄文原文。——编者注

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①。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

①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二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①）。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247]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前面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

①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70页。——编者注

详细阐述。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涵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涵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248]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

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10—11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886年《民意导报》第5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249]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8月20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的《年鉴》①来了，而后赫希柏格本人也来了。

我只好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拿给您看，而这一点我是特别嘱咐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 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重新创办的党

①指社会改良派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由卡·赫希柏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于1879—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编者注

的机关报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这第一点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几个月就一命呜呼；另一点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主宰报纸的立场。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安排就绪，其余情况你将从苏黎世得知。"（李卜克内西7月28日给希尔施的信）这封回信希尔施并没有接到。他倒是收到了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的信（7月24日），信中伯恩施坦通知说："（报纸的）组织出版和**监督权**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辛[1]和**我们**[2]"开过会，会上有人认为：

> "您担任《灯笼》编辑时和个别同志发生的分歧，会给您的地位造成一些困难，但**我**认为这种疑虑并非十分紧要。"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财政状况。哪些同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无关紧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使报纸维持一年的资金"。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关于他打算给报纸设定的立场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并接到一项**指示**：

> "**监督委员会**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见，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

---

①指保·辛格尔。——编者注

②指"苏黎世人"爱·伯恩施坦、卡·赫希柏格和奥·施拉姆。——编者注

是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人①商议。他8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一定是知道的，因为他曾**坚决要求**转达给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意见，并请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这期间李卜克内西于7月28日写信给希尔施：

>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包括）赫希柏格在内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细节，我就不管了。"

李卜克内西在下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只字未提，而是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卜克内西8月14日给我的信还是这么写的，并要求我们说服希尔施接受。直到8月20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所以您写信对我说：

> "他〈赫希柏格〉在报纸的编辑方面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有更多的发言权。"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8月11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 "住在苏黎世的三个人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份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三个莱比锡人的同意之下挑选一名编辑……**据我的记忆**，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

---

①指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路·菲勒克。——编者注

项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 根据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协助,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至少知道了**一些**确实的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在苏黎世人面前所处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任;没有他们的协助,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一直不知道姓名的苏黎世的三个人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菲勒克的信的下边写了一段附言,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像菲勒克所认为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而实质上是管理委员会,对党即对我们负责报纸的财务;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受权**监督**你。"

三个苏黎世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唯一**参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要求,希尔施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已经作出的决议,因为那里边包括了要求他接受的条件,对这一点,人们丝毫没有加以考虑,特别是看来莱比锡人也根本没有想到要**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么会产生上述矛盾呢?

如果说莱比锡人在授予苏黎世人哪些职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苏黎世人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施拉姆8月14日写信给希尔施:

"假如当时您没有写信说,遇有类似事件(如凯泽尔事件[250])仍然要采取同

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就不会对此多费唇舌。但是鉴于您提出的这个声明，我们必须保留对新报纸刊载什么文章的决定权。”

听说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谈过这一点，而这封信是7月26日写的，也就是在苏黎世的那次确定了三个苏黎世人握有全权的会议以后**很久**。但是，苏黎世人如此陶醉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以致在答复希尔施这封写得比较晚的信时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原因何在呢？

(1)由于莱比锡人和苏黎世人都顽固地拒绝告诉他任何一点有关报纸的经费基础和报纸能否维持下去——哪怕仅仅一年的确实情况。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项。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赫希柏格)，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就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现在还远没有排除。这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800马克的款子**正好**等于这里的协会在**上半年**补助《自由》周报的经费(40英镑)。

(2)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世人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工作的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见不一的滑稽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人不仅要监督，甚至要检查编辑工作，给希尔施分派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只能同意他的做法。我

们从赫希柏格那里[①]听说，莱比锡委员会由于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员而得到了加强，因此只有在三个莱比锡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迅速进行干预。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二　给报纸确定的立场

伯恩施坦早在7月24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担任《灯笼》编辑时和个别同志的分歧，会给他的地位造成困难。

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立场，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的立场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引起诉讼，在德国不应引起不必要的惊恐。他问那些同志是谁，并继续说道：

> “我只知道一个人，并且我向您保证，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纪行为**，我对此人将仍然照此办理。”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 “至于报纸的立场，监督委员会的意见自然是，《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报纸不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立场。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同志异口同声〈!〉斥责的事件，无论如何应

①手稿原件上“从赫希柏格那里”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抨击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柏格说，像凯泽尔这类事件，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此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表态和善意的提示”。

菲勒克也写道：

“已经指示”新报纸“……采取冷静克制的立场，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切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人们至多可以指责伯恩施坦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如果说在我们确实不能打出鲜明旗帜的时候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据说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唯一在帝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纪律，因为他：

（1）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2）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党整个策略的首要基本准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不可否认希尔施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可以说是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确定不移的首要基本准则，竟投票赞成**拨款**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48]，那么我们认为，希尔施同样也完全有权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人们怎么会对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柏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动，而有了这一准许，人们认为凯泽尔便得到了庇护。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有点不像话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耻辱，以前还可以推给凯泽尔一人承担，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耻辱就更大了，同时，希尔施的功绩也更大了，因为他把凯泽尔的愚蠢言论以及更加愚蠢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名誉。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染上议会症了吗，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会降临到当选者的头上，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永无谬误的宗教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触犯的教条？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议庇护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注意维护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公然违反党的纪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通过他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其他议员们通过他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了党纪，因为他不顾这个决议——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在迄今实际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①]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不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尤其是《前进报》特别喜欢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去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保护关税问题突然成了现实

---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20—424页。——编者注

问题，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没有一个人具备作出鲜明而正确的判断所需的条件：了解德国工业的状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各种思潮有时还不可能绝迹，这些思潮确实也要顾及到。摆脱这种混乱的唯一途径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把握问题（像《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并没有坚决地这样做；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场辩论中第一次表现出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和糊里糊涂，以致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新的报纸万万不可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不可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和冷静克制的立场。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是适合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打出鲜明的旗帜。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打出鲜明的旗帜，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新闻出版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惯常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直言不讳地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恰好证明，他就只配受制于这些德国法律，他实际上只会说在非常法颁布以前的德国所允许说的话。编辑部成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于这种可能性不应有所顾忌。谁不做好冒此风险的准备，谁就不适于走上如此引人注目的光荣岗位。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严肃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放弃这个唯一

严肃的反对党的角色，表现温顺，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忍受脚踢，以此来向俾斯麦表示感谢，那么它只是证明，它该挨脚踢。1830年以来，德国流亡者在国外出版的所有报刊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灯笼》都算过于狂妄无理，那么新的报纸只会在非德意志国家的同志们面前损害党的名誉。

三　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①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②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他们为新机关报的立场所提出的真正纲领，既然这一立场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①载于1879年《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1年卷第1册第75—96页。——编者注

②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施韦泽使这里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这是由于他**加深了**运动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①其次谴责他"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门外"。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该党的愿望；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这个党，那也只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一个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的政党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据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么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

---

①本段开头这两句话作者在改动以前原来是这样写的："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　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为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以此来制造借口，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构成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确实如此。但是之所以说片面，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对于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根本没有兴趣。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堕落之处在于，他**加深了**运动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编者注

弃他们的显要职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可见，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一点，它首先必须抛弃无产者粗野的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85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举止"也就会让位于可以很好调教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举止"（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有失体统的举止并不是最不值得谴责的东西似的！）。那时也就会

>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种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三个苏黎世人以为，他们有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六十万社会民主党选民都极其有理智，不去用脑袋撞墙壁，不去以一对十地试图进行"流血革命"，那么这就说明，他们今后永远**不可能**去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会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251]，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88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英勇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野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越是心平气和、务实谨慎，清醒的反动派以赤色幽灵恐怖来吓唬资产阶级这一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得逞的伎俩，就越不可能重演。"（第88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产生一丝一毫的恐惧，竟要明白无误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正是资产阶级对它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现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那又是什么呢！只要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并进了"！但是上当的是谁呢？只能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举止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各种"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正是这些行为给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口实。

如果它自愿地作出承诺，愿意只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活动，那么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大发善心，取消这个届时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 "请大家理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那些在开始考虑实现长远的追求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长远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说真的，我倒更喜欢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垮台，就大搞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年的危机，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崩溃做了一些事情。

另一件损害良好的风度的事，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儿"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儿"，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么对任何人我们都不应该再去攻击，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停止；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儿"，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变本加厉地回报他们以脚踢，反而

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毕竟也有有害的一面：

> “使那些本来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48]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党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仍很熟悉1848年以来所有这些言词的人来说是如此。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心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迫于自己的革命地位，可能“走得太远”。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应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而应尝试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要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应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遥无期的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对后者来说也是遥遥无期的，因此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人们承认这种斗争，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实践中却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给旧的社会制度以新的

支持，从而把最终的大灾难或许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后来又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们而走自己的路。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早已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

在至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输送教育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因素。但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相反，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尝试；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首先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搬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炮制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

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

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收回迄今为止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①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9年9月16日—18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第23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①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弗里茨舍、布·盖泽尔和威·哈森克莱维尔。——编者注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252]

Bibliothèque de la REVUE SOCIALISTE

I.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

FRÉDÉRIC ENGELS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PAUL LAFARGUE

Prix : 50 centimes



PARIS
DERVEAUX LIBRAIRE-ÉDITEUR
32, Rue d'Angoulême, 32

1880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法文第一版的扉页

马克思写的
1880年法文版前言[253]

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早先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的三篇文章，它们译自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报的撰稿人。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236]，这个协会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应**正义者同**

①指《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在保·拉法格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出版的版本中，此处有如下补充："文章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作了一些补充。"——编者注

盟[254]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237]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团体还必须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16]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①。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255]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代表。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的编辑，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1848年在科隆创办的，由于普鲁士发生政变，于1849年6月被查禁。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以后，作为志愿军团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起义（1849年6—7月）。[256]

1850年，他在伦敦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稿，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首次发表《德国农民战争》，该文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并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成为《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意

①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作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联系。

他为《前进报》撰写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5月4—5日前后

载于1880年在巴黎出版的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257]

后面这篇论文是由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1882年刚刚在日内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出现许多外来语这一点可能引起疑虑。但是拉萨尔在他的演说和宣传性文章中已经根本不避讳使用外来语，而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提出抱怨。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

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来语。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那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我没有加上所谓解释性的翻译。这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大部分是通用的科学技术用语，如果能翻译出来，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用语的含义；这样做解释不清楚，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相反，在内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工人，比对“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么实际上我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冯·艾内恩先生、枢密顾问亨利希·冯·济贝耳先生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遏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确凿无误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唐·吉诃德手执长矛同风车搏斗，这是合乎他的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乔·潘萨去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

①1891年柏林版中，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条脚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

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9月21日

载于1882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态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得出确实的结论。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这条脚注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是篇末注，题为"对序言作的注"，原注开头引述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在德国"这一段话。——编者注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258]

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1万册，而且这是在现今已寿终正寝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说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有点过于简略；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处关于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25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5月12日

载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1892年英文版导言[260]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本大书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当然，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发生时，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合并[212]，因而不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全力以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独立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件事虽然不太困难，显然也很麻烦。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有一种非常严肃的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随你怎么说都行。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

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巨著[261]，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262]，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我承担这个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曾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①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这篇附录收入这个译本，是因为人们对所有条顿部落都同样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知道得更少。我让这篇附录仍保持原状，就是说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庞大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①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的；后来，公社范围扩大，共同经营已日益不便，就出现了公社土地的分割。[263]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264]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为了交换；也就是说，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盈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

---

①扎德鲁加(Zadruga)是古代南方斯拉夫人、凯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编者注

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场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推动的机器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转。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颇大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及英国"体面人物"①的偏见，那么我们的处境也许更加糟糕。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也许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本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265]。唯名论是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提出种子说的阿那克萨哥拉[266]和提出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确实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就在于把理性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

---

①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体面人物"的后面加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

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它不仅表现为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①。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另一方面，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为了能够在对手，即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唯灵论的领域制服这种唯灵论，唯物主义就不得不扼杀自己的肉欲，成为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之物变成理智之物；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了理智所特有的无所顾忌的全部彻底性。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无非是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哲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通过感官

---

①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而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此注被删去："'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人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词；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编者注

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非个别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所以我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中对此作了论证。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也同样消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自然神论[267]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派的前辈，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18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这次革命

---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268]

的成果，我们这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还总想移植哩。

这是无可否认的。在本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于创世记的神话；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特别是去寻访那些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①给英国这个岛国的闭塞状态敲响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逐渐变得国际化了；这种变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国的某些风尚和习惯能在大陆上传播，就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传播那样。总之，随着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大陆上对宗教问题的怀疑论也必然传了进来，以致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269]。我时常这样想：许多人对这种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现象痛心疾首，咒骂谴责，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制造”的商标，而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而且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200年前已经走得比今天的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

①指1851年5—10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编者注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兰开夏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又说，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也许还有点价值，那时拿破仑曾问拉普拉斯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何他的《论天体力学》①只字不提造物主，对此，拉普拉斯曾骄傲地回答："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如今，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关于宇宙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说，在整个现存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最高存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以为，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然后他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也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们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已。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②。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

①指皮·拉普拉斯《论天体力学》1799—1825年巴黎版第1—5卷。——编者注

②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违背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这时就说:我们可能正确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感觉过程或思维过程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处于我们认识的彼岸。对于这一点,黑格尔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这一事实,你也就完全掌握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个著名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还可以补充一句:在康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们对于各个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做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

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必借助有机过程，就能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制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宣称：只要知道不管何种物体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准确地认识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不会有这种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制造人造蛋白。我们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就制造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只要作出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如今所谓的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创造出来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他立刻就会让你闭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认可能有唯灵论，但是他不想具体地知道是否有唯灵论。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并没有什么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功能；我们只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是一些不变的规律，等等。所以，当他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当他还**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他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书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嘲笑我，不可知论者也将厉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

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①]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如果我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也是有益的，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宽容一些。我已经说过：大约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现在我就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②]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尽管发生了各种内部战争，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

---

①在德译文中，“体面人物”后面加有“用德语来说叫做庸人”。——编者注

②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起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512页），恩格斯将英文用语“middle class”（“中等阶级”）、“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Bürgerthum”；后面，恩格斯又把这些用语译为“Bourgeoisie”，后两个德文用语都指的是资产阶级。——编者注

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

以上只谈到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的两点原因，但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率先振臂一呼的是一些大学和城市商人，那么热烈响应的必然是而且确实是广大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搏斗。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270]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就不详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各地诸侯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信条，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刚

刚改信路德教派，就从自由人降为农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271]他的宿命论的学说，从宗教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决定成败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全凭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恩赐；在经济变革时期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时旧的商路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打开大门，甚至最神圣的经济信条即金银的价值也开始动摇和崩溃了。加尔文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派已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派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派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而农民恰恰成为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如果没有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决不会单独把斗争进行到底，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哪怕只是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1793年和德国在1848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

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①。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②称为"大叛乱"的这段辉煌时期，以及随后的斗争，以自由党历史学家誉为"光荣革命"272的较为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

新的起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③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在当时和现在均被称为贵族，其实早已开始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转变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273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

①在德译文中不是"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而是"超出自己的目的"。——编者注

②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

③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处，恩格斯将英文用语"middle class"（"中等阶级"）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Bourgeoisie"（"资产阶级"）。——编者注

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尊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这同样的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①学说，不仅震撼了中等阶级的宗教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于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完全不同于适合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的宗教。它随同霍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274]，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等阶级仇视，既是由于它是

---

①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加有“无神论的”。——编者注

宗教的异端，也是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267]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派[275]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276]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277]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他国

家，包括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英吉利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只有英吉利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

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胃口。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它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资产者怎么能没有本国的贵族呢？因为是贵族教他们像贵族那样待人接物，替他们开创新风气，为他们提供陆军军官以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以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当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因妥协而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278]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一旦失去宗教本能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资产阶级赢得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等人，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越来越被工厂主推向后台。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步作了调整以后，也不再适合这次妥协的参与者们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有所改变；1830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们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这种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279]，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除[31]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以后它取得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280]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

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281]，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282]。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声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283]，从美国输入了奋兴派[284]，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做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统治那个王国，大部分资产阶级则因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

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但为时不过三年；资产阶级的无能使第二帝国得以产生。只有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执掌政权20年以上；可是已经显露鲜明的衰落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连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即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未独掌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职。富裕的中等阶级何以如此恭顺，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篇公开演说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说中敦劝布拉德福德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前程学习法语，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出入于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曾感到多么羞怯！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夹杂着精明生意经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领。①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

①民族沙文主义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业上，也是会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尊严的，当他们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英国，使他们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还引以自傲。他们根本没有觉察，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国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都受到控制，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们也没有觉察，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40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时，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10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便询问英国的

英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已经胜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顿、那些布莱特、那些福斯特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20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285]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英国的资产阶级迄今还痛切地自惭社会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钱豢养一个装饰门面的有闲等级，好在一切庄严的场合去体面地代表民族；当资产阶级中间一旦有人被准许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权集团时，便引以为无上光荣。

这样，工商业的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全部逐出政权，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7]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又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了，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那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不可遏止；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时机，在城镇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①，并且重新划分选区。随后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再次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286]这一切措施显然

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们再也不能维系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英国式的那一套。

①在德译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中的文字是“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编者注

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现在，至少在150—200个选区中，工人阶级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么，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的“优秀人物”即中等阶级。的确，大约在15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谦恭有礼，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温顺克己，这使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160]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安慰，他们正苦于本国的工人不可救药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

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更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宪章运动的年代，他们对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会有什么作为已经有所领教了。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联合王国的法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在学校董事会中牧师就占优势；于是，资产阶级不断自我增税，以维持各种奋兴派[284]，从崇礼派[287]直到“救世军”[269]。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终于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在选择夺取统治权的手段时，有极充分的理由毫不考虑是否合法。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举行这种仪式了。法国资产者

每逢星期五吃素，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听新教的冗长布道。他们已经因唯物主义而遭殃。“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对他们自己来说，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材！这个我早在200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重新开始活动了。无疑地，他们还拘泥于各种传统。首先是资产者的传统，例如，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并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最初尝试独立行动时所因袭下来的传统，例如，凡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都被许多旧工联关在门外；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这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288]工人阶级在前进，如同英国的种种事情一样，迈出的是缓慢而适度的步伐，有时踌躇不定，有时作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尝

试，在前进中有时过分小心地猜疑"社会主义"这个词，却又逐渐吸收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现在它已经唤醒了伦敦东头的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么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以后照例是永不会化为乌有的。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么，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运动的进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进着。如果德国的中等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活力和毅力，那么，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400年前，德国曾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又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4月20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

①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有如下一段话："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现在创立了宪法，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

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都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289]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①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

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因此，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到处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正是现在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正是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害社会秩序的颠覆学说吗？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这个短语。——编者注

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①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290]和托马斯·闵采尔②，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29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292]，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

---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这几个字不是黑体。——编者注

②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是“托马斯·闵采尔派”。——编者注

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联系中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293]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恐怖时代，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294]，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调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

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①；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②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③；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④，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罗伯

---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现在已经实现的……失去财产的自由”这段话。——编者注

②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

③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

④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①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前后，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293]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甚至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引导资产阶级革命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

①苏格兰拉纳克附近的一个棉纺织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编者注

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一点已经弄清，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去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去宣扬自己的清醒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利用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借承办军需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294]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有了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么，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

而这种纽带是一种必然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活动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的受托人，但是对工人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特别是银行家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①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

“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②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295]如果说经济状况是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的命运”这一整段文字。——编者注

②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编者注

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296]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会战[297]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预言者和革命后得到利益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应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

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98]但是，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①所以，比如说，

>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②。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③，而且他还把这种考察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

---

①参看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编者注

②《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编者注

③参看《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①]，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

---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从乡村……的劳动阶级”这句话。——编者注

身份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 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

> “可是，这2 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 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创业资本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

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①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到目前为止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商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②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包括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在内，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致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

---

①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致全体"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呈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王的责任顾问"的备忘录》。

②参看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编者注

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方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方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299]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工会大联盟。[300]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166]，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165]，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①，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这句话是："现在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正热衷于这种观察方式，还在不久前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就曾热衷于这种观察方式。"——编者注

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去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的卵石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二

在此期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301]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

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较，或者说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302]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①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一条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亡的那一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亡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

①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

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既是彼此对立的，又是彼此不可分离的，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交汇起来，融合在普遍相互作用的看法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提到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发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

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303]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

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

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派的运动[7]，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

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

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1]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么,照此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

①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编者注

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

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的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

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怎样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①]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种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编者注

败，社会化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人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

形式[①]。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不得已时单靠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会条例是要使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

①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还是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①]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唯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贡赋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不是“特殊的”，而是“个人的”。——编者注

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①，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单个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业，就把那里的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305]。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

①见书末的附录。[304]

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更确切地说，运动沿螺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

①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

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①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②；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③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

①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1、560页。——编者注

②同上，第532页。——编者注

③同上，第743—744页。——编者注

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而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多血症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①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

①参看《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

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①]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 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会被废除。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②]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这种转化为

---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以下从"国内同一工业部门"起，至"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这部分文字。——编者注

②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

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①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①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

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306、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托拉斯”一词。——编者注

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质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质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

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

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307]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这些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

领导变成对群众加紧剥削。

但是，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错乱，成为过时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

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①。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

---

①有几个数字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扩张力有个大体的概念。根据吉芬的统计308，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 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 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 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统计，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制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 500万马克。

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没有触及交换形式。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

竞争的强制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①,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

---

①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编者注



1912—1943年间载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译文的部分书刊

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1月—3月上半月

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3、4和5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卡·马克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309]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形式：

(1)个体形式，这种形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事实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形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所以，法国社会主义工人确定其经济方面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使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决定提出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以此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5月10日
前后

载于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
第25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
版第19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310]

[初　　稿]

(1)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①。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为什么呢?请看第三十二章,那里写道:

"它被消灭的过程,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源……　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第341页第2栏)②

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

---

①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69、770页。——编者注

②同上,第825页。——编者注

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一论述又如何应用呢？

(2)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农民**的公社**必然解体**的唯一有力论据如下：

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向那些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大家都将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另外一个有利于(通过发展公社)保存俄国公社的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经历了这种社会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著作家(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①。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

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些波折。然而,关于这些波折,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

不管怎样,这种公社是在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的情况下灭亡的,很可能是亡于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时,那里的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一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于各地,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里尔专区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有财产,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

①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第552页。——编者注

后，就能还原出它的古代原型。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区引入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如果说，在塔西佗时代以后，我们关于**公社**的生活，关于公社是怎样消失和在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一点也不了解，那么，至少由于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起点还是知道的。在凯撒的那个时代，已是逐年分配土地，但是这种分配是在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的**各氏族**和部落之间，还不是在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的。由此可见，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是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亚洲现成地输入的东西。在那里，在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并且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

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始终以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经受得住同外界的接触。

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引入农业以前，共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农民自力经营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

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环境的一切影响不说，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甚至有像农奴这样一种财富的积累），动产因素在农业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相关的许多其他情况（如果我要对此加以阐述就会离题太远），都起着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那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森林、牧场、荒地等等。正由于这个原因，“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见第10页）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

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311]，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言人要否认现代农村公社上述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从各方面来看对它都是不利的。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①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

①这个词马克思写的是俄文：волость。——编者注

展来保存这种公社的情况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而且，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将是逐步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把它置于正常条件之下。

因此，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3)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不是农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曾抛弃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无情压榨的借口的财产。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把俄国公社置于不正常的

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枯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总之，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俄国的最巨大的生产力）、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

破坏性影响的这种共同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这种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因而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最近十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言人才把公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仅仅考察它的

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么一看就很清楚，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此外，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集体劳动过渡，而且，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公益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劳动了。但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需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们的土地贫瘠。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况且，现在他们连种两三俄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东西，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10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

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

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去寻找它的“新生的因素”。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既然这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者，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二世仁慈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新栋梁”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那么，为什么他们还合谋要使公社灭亡呢？为什么他们的代言人还把公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确凿证据呢？为什么他们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

只是因为经济上的事实（我要来分析这些事实，就会离题太远）揭开了这样一个秘密：**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由于事物的必然性，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因此，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有制，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

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

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残存的微缩模型那样以不久前在西方还可见到的那种古代形式零星地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

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相反，作为开端，必须把它置于正常条件之下。

但是，同公社相对立，出现了这样的地产，它掌握了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更不用说国有土地了。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新生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能获得。

甚至仅仅从经济观点来看，俄国能够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在农业上所处的绝境；通过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的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①

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

撇开敌对环境的一切其他有害因素的影响不说，仅仅是个别家庭手中的动产，例如它们的牲畜、有时甚至是奴隶或农奴这样的财富的逐步增长，这种私人积累，从长远来看足以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触及作为公共财产的耕地，最后扩展到森林、牧场和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已经变成

①初稿中原来没有这段话，这里是马克思从他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三稿第4页上移过来的。——编者注

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公共财产。

(4)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①]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的衰落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但是，无论如何，研究的进展已经足以证明：(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米特人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2)它们衰落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越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今日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

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②]

(5)[③]您完全清楚，现在俄国公社的存在本身由于强大的利害关系者的阴谋而处于危险境地。除了被国家的直接搜刮压得喘不过气来，除了遭受侵入公社的"资本家"、商人等等以及土地"所有者"的狡诈的剥削以外，公社还受到乡村高利贷者以及由于它所处的环境而在内部引起的利益冲突的损害。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社所有制。相反，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

①"地质的层系构造"和"历史的形态"中的"层系构造"和"形态"，原文为"formation"。——编者注

②参看亨·梅恩《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马克思在这段文字旁画了一条竖线，可能是删除记号。——编者注

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听你们指挥的宪兵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大土地所有者）就曾抛弃自己的土地，成为流浪者，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压榨的借口的"财产"。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所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衰老的征兆；并宣称，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涉及的已经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应给以打击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三　稿]

亲爱的女公民：

要深入分析您2月16日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必须钻研事物的细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但是，我希望，现在我很荣幸地写给您的这一简短的说明，就足以消除对所谓我的理论的一切误解。

一、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①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②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从这一分

①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69、770页。——编者注

②同上，第825页。——编者注

析中，至多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

二、用来反对俄国公社的最有力的论据如下：

如果您回顾一下西方社会的起源，那么您到处都会发现土地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又到处让位给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推论，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现，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经不存在了。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部落**之间已经逐年分配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间分配；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在日耳曼尼亚本土，这种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然的发展而变为塔西佗所描绘的那种**农业公社**。从那时起，我们就看不到它了。它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灭亡了；它有可能是亡于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所证实。这种类型的一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于各地，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里尔专区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农业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现在从

它产生出来的新公社里面，以致毛勒在辨认了新公社后能够还原出这种“农业公社”。在新公社里，耕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而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仍然是**公共财产**；这种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引入所有被征服的地区。由于它继承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间也有“农村公社”。但是，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近类型**的公社，也可以说，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形式。为了指出这一事实，所以我就谈了关于日耳曼公社的一些细节。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公社的最主要的特征。

(1)所有其他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缘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组织。

(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畜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原始的公社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改换占有者。这样，个人用益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它的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处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

(3)耕地是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一社员自力经营分配给他的田地，并把产品留为已有。而在较原始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

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为自己的稳固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地块耕种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机体不相容的个性的发展。

但是,同样明显,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源泉——小地块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根源。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极大的作用)将对整个农村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异质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触及作为公共财产的耕地,然后触及作为公共财产的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它是唯一在一个巨大的帝国内的农村生活中尚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311]，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作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置于正常条件之下，那它就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

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

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不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吗？**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中消失。

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并且他们在翻晒草料，以及像排除积水等公社的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一种与古代类型十分相似的特性（这是现代农学家感到头痛的东西）也有利于实行合作劳动。如果您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垄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您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死亡的农业公社的地产！农业公社的社员并没有学过地租理论，可是他们了解，在天然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农业劳动，会得到不等的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机

会均等，他们根据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把土地分成一定数量的地段，然后按农民的人数把这些比较大的地段再分成小块。然后，每一个人在每一地段中得到一份土地。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相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做法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做法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小块土地……①

①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复　　信]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312]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①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

①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69、770页。——编者注

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①]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您忠实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81年2月18日—3月8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版第1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①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25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313]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过去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销声匿迹，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绝口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314]到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中间，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①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物神的膜拜或雅利安人[315]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们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僧侣的欺诈很快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考证新约[316]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指出了一般现象，并没有说明这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第2版第11—15页。——编者注

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由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以致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最后竟认为接受这种荒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独裁者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依存关系①,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1849年以后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②,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完全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317]。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中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证实的历史事实,以致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可以认为是成问题的,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被联结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最卓越的研究成果是:

①参看克·哥·维耳克《最初的福音书作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诠释性考证研究》1830年德累斯顿—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参看大·施特劳斯《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编者注

他指出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亚派的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318]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理性主义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物。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这种调和，已经包含着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全部观念——人的原罪、逻各斯[319]（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通过供奉牺牲而是通过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神来进行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受苦受难的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奥古斯都·凯撒神人（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320]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一块拱顶石：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人类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块拱顶石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亚—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史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块拱顶石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亚派砌上的。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的人创立的，而那些组成学派的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例如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

得到广泛传播。如果说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那么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和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理性主义地庸俗化了,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①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唯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吸收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而且基督教一经创立,也就能够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接受。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是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那种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最初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②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止肉欲这一条,相反,幻想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书信[322]已经写成。其中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亚派哲学,特别是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书信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

①埃瓦尔德已经证明[321],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发音符号的手稿中,在雅赫维(Jahweh)这个忌讳说出的名字的辅音底下,写上了这个名字的代称阿特乃(Adonai)一词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华(Jehovah)。可见,这个词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在希伯来语中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词。

②《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编者注

塞涅卡。[①]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编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是在同正在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裔基督徒和非犹太裔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②]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么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这样一来，凡是与罗马法制不相符合的本地社会制度都被宣布无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国居民达几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居民中间的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

①参看布·鲍威尔《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一书中的《新约中的塞涅卡》一章（1877年柏林版第47—61页）。——编者注

②参看布·鲍威尔《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874年柏林版；《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编者注

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往往在被征服后的斗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意大利首都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323]）、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民，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特别从提比里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它很像雇佣军，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民，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即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也许还同公有制有联系），或大地主的债务奴仆（如在高卢）。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①。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主见，不可能解放

①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324]，直到9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

自己，如斯巴达克失败所证明的那样；可是他们当中大部分原是自由民或是被释放的奴隶的后裔。所以他们必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极为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教书匠，便是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有些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卡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亚派[318]，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写进福音书中的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极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意识形态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一起。宗教的这种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传统的政治设施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从属于此的宗教自然也就会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作用(我简直想说是伏尔泰主义[20])

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由于罗马帝国的奴役，以及由于那些从前以享有自由而自豪的战士被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所取代，同样也做到了。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猥鄙的感官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那些人**是如此，可是这只是极少数人。其余的人就只好俯首帖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亚学派[318]，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两个学派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哲学体系；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藉。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当时甚至直到17世纪，一切能够打动群众的东西莫不如此。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后一方面是宽容的，而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等等)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是古代东

方衰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典世界的祭祀和巡礼。这样一来，由于它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由于有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份。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裔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仍很流行），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征服的和由阿拉伯贝都因人新垦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而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匮乏和道德沦丧。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并且只能是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罪在我[Mea culpa]！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份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被安排得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么，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清人类罪孽的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由于基督教把人们的普遍堕落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个人的罪孽意识；同时，由于基督教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普遍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而获取内心得救即心灵上的安慰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它就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当时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提出了无数革新宗教的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曾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以说是达尔文式的精神上的生存斗争。主要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异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个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4月下半月

载于1882年5月4和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和2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弗·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325]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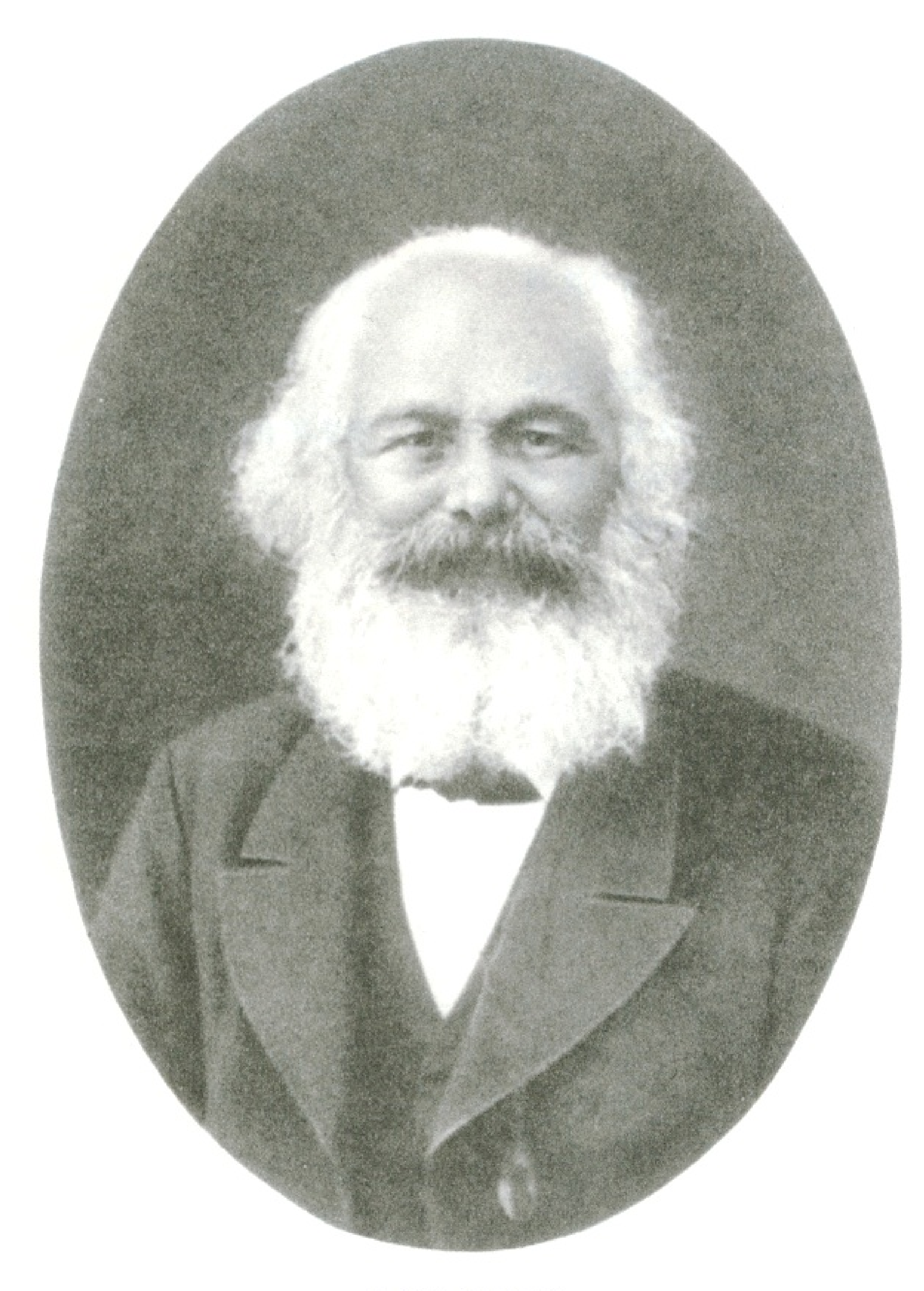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

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326]。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7]，——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



马克思（1882年）

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18日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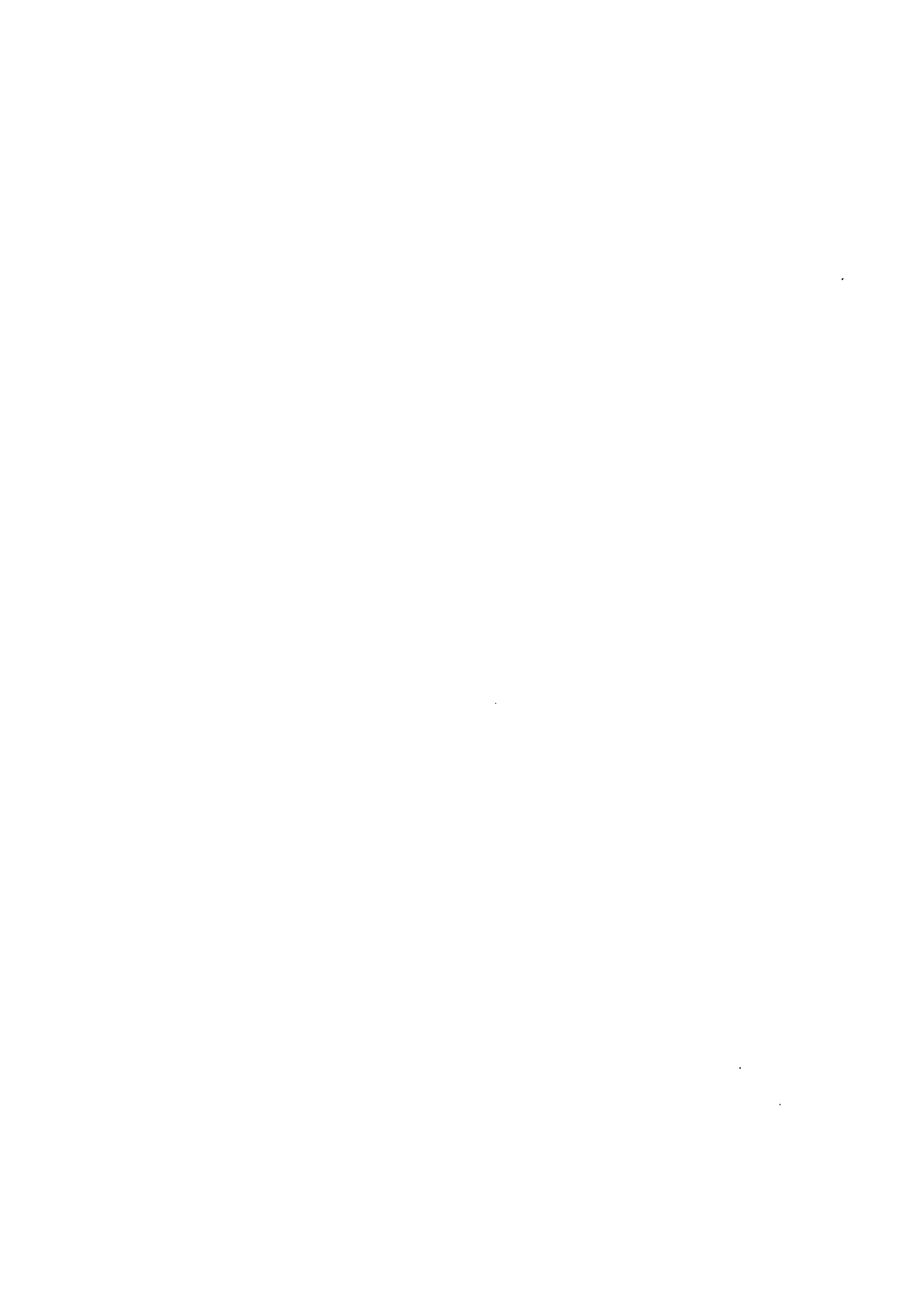
载于1883年3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附　　录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327]

摘自1871年5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解释说，他由于生病而没有能完成他承担起草的宣言，但他希望在下星期二之前起草完毕。至于巴黎的斗争，他说，恐怕快要结束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打败，斗争也只是推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普鲁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他们正给梯也尔充当宪兵。搞垮公社的阴谋是由俾斯麦、梯也尔、法夫尔共同炮制的；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就说过，梯也尔和法夫尔请求他参与此事。结果表明，他确实是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只是没有用德国士兵的生命去冒险，——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用人命去换取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削弱，以便他能够勒索得更多。他允许梯也尔拥有比协定①规定的更多兵员，但是只允许数量有限的粮食运进巴黎。这只不过是历史重演。上层阶级总是联合起来压制工人阶级。在11世纪，法兰西骑士和诺曼骑士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举行了起义。骑士们马上就忘掉自己的纠纷而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运动。为了说明普鲁士人是怎样充当警察的，可以举出一件事实：在普鲁士人所占领的鲁

---

①指1871年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与德国签订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编者注

昂，有500人遭到逮捕，借口就是他们是国际会员。国际是让人害怕的。若贝尔伯爵——一具干巴的木乃伊，一位1834年的大臣，一个以支持对新闻出版采取严厉措施而闻名的人物——前几天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说时曾说，在恢复秩序以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并加以取缔。

载于1871年5月27日《东邮报》第139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328]

[1871年]7月3日于伦敦

我①直截了当地进入本题。我说，看来世人对国际并不了解，人们非常恨它，但又说不清他们恨的是什么。某些自诩比别人深窥其奥秘的人声称，他们看到的是像雅努斯那样的形象：有着两副面孔，一副是工人和善憨厚的微笑，另一副是阴谋家狰狞可怕的凶相。我向他[马克思]请教此说法的秘密所在。这位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他有点笑我们这样害怕他。

他②开始用一种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方言谈了起来[329]：先生，这里没有任何需要揭开的秘密。如果说有，也许就是有些人身上的人类的愚昧。这些人顽固地无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它的活动的最详细的报告都是公开发表的，任何想读的人，都可以读到。您花一个便士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用一个先令买到些小册子，将使您对我们了解得差不多就像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一样。

兰：差不多——是的，或许如此；但是，会不会我了解不到的东西就是极其重要的保留？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这种普遍贬低你们的态度，除了一般人由于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敌意以外，必定还意味着别的什么东西。虽然您已经对我做了解释，但我觉得仍然需要再问一下：国际协会

①兰多尔。——编者注

②马克思。——编者注

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您只要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行了。

兰：对，不过不一定能凭士兵判断指挥他的人的治理才能。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而且我可以相信他们不是搞阴谋的那种人。何况上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了。然而，要是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个勇敢的——请原谅我再加上一个词——不太选择手段的秘密集团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一点。

兰：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首先，我要请您证明那里到底有过什么阴谋，证明那里发生的一切不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假定有阴谋，那我要求拿出证据来说明国际协会确曾参与其事。

兰：在公社队伍中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330]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把整个起义都算在共济会会员的账上，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试找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会成为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而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可是协会本身决不能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兰：外界对此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甚至还谈到金钱的援助。能否肯定地说您所谓协会活动的公开性完全排除了秘密联系的可能性？

马克思博士：有过什么组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呢？但是，谈论什么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把它比做来自教皇的某个统治中心和阴谋中心关于信仰和德行问题的敕令，那就完全误解了国际的性质。要是那样，国际里就要有集权的政府，而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使地方能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独立性。其实，国际对工人阶级说来根本不是什么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不如说它是联合的纽带。

兰：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通过赢得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利用这个政权来达到社会目的。我们的目标必须广泛，足以包括工人阶级活动的一切形式。如果我们使这些目标具有某种特殊性，那就是使这些目标只适合于某一部分——某一国家的工人的需要了。但是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去为了达到少数人的目标而联合起来呢？如果那样做，协会就失去了称做国际的资格。协会并不规定政治运动的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保证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遍布整个劳动世界的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络，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问题的某个特殊方面都会出现，这要由那里的工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在纽卡斯尔和巴塞罗那，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联合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完全一样。例如，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英国工人阶级是敞开的。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在法国，迫害性的法律成百上千，阶级对立你死我活，这使得社会战争这种暴力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选择这种解决办法是这个国家工人阶级自己的事。国际不能在这件事上下命令，甚至无法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寄予同情并在自己

章程所规定的范围内给以援助。

兰：那么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马克思博士：举个例子，解放运动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罢工。从前，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发生了罢工，从另一个国家输入工人，就可以使罢工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罢工在准备的时候它就得到消息，它把这个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它的会员们立刻就知道，发生罢工斗争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必须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能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人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罢工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援助。他们自己或与他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的捐款给他们提供资金；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而且罢工是协会所赞同的，就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前不久巴塞罗那雪茄烟工人的罢工[331]就是靠这样的办法取得胜利的。但是协会与罢工并没有利害关系，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协会在金钱方面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倒是容易受到损失。让我们把整个问题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面对日益增长的财富仍然贫穷不堪，面对日益奢侈的世界仍然处境悲惨。他们在物质上的贫困使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摧残。他们不能指望别人来解救。因此，他们就绝对有必要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必须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必须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大家知道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332]，工会和互助会，合作商店和合作生产，都不过是实现这一共同目的的手段。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在各地显现出来。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现在，在我给您讲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关

于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您大概能够得出自己的看法了吧。

兰:我不完全理解您的意思。

马克思博士:难道您没看出来,旧社会无力用自己的武器——辩论和组织来对付国际,不得不采取欺骗世人的办法,给它加上搞阴谋的罪名。

兰:但是法国警方宣称他们能够证明国际参与了最近这次事件,更不用说以前的图谋了。

马克思博士:但是,对不起,我们倒要说说这些图谋。因为这些图谋最能检验所有关于国际搞阴谋的指控是否严肃。您想必记得上次"阴谋"之前的那一次吧。当时宣布要举行一次全民投票[138]。许多投票人显然都动摇了。他们不再深切地感到帝国统治的好处,他们已经不相信会随时发生社会危险而似乎要帝国统治把他们从中解救出来这种说法了。这就需要找个新的吓唬人的东西。警方着手去找这个东西。一切工人联合组织都是他们所仇恨的,他们自然就该给国际使坏了。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能不能拿国际来吓唬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败坏了该协会的声誉,又帮助了帝国事业?按照这个好主意,就产生出了一个谋害皇帝的可笑"阴谋"——好像我们要杀掉那个可怜的老家伙。他们逮捕了国际的领导成员。他们捏造罪证。他们为把案件交付审判进行准备。在此期间,他们举行了他们的全民投票。然而这出蓄意制造的喜剧太明显不过是一出粗野拙劣的闹剧。明智的欧洲看了这场表演以后对其实质一刻也没有认错,只有法国农民选民上了当。你们的英文报纸报道了这桩卑鄙事件的开端,可是忘记注意它的结尾。那些出于官方礼节承认阴谋存在的法国法官却不得不

宣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际是同谋。请相信，第二次阴谋与第一次阴谋一样。法国的某个官吏又忙开了。他奉召来解释这次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国民运动。成百上千的时代征候应当可以提示正确的解释——工人才智增长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奢侈无能加剧了；政权从一个阶级最终转到人民手中的历史进程继续向前发展；时间、地点和条件显然都适宜发生这场伟大的解放运动。然而要看到这些，官吏必须是一位哲学家，而他却只是一个**警探**。因此，他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律求助于**警探的**解释——"阴谋"。他的旧公文包里的伪造文件给他提供了证据。而这一次被吓坏了的欧洲将会相信这种谎言。

兰：欧洲看到每家法国报纸都这样报道，它不能不相信。

马克思博士：每一家法国报纸！看，这里就有一家（他拿起《形势报》），请您自己来判断它关于事实的证据有多少价值。〔他读道：〕"国际的卡尔·马克思博士企图潜入法国时在比利时被捕。伦敦警方久已对那个与他有联系的协会进行监视，现在正对它采取积极的查禁措施。"

两句话，两条谎言。您通过亲眼目睹就能证明这则报道是否真实。您看见了，我现在不是蹲在比利时的监狱里，而是待在英国自己家里。您也一定知道，英国警方无权干涉国际协会，正像协会无权干涉它一样。但通常的情况是，这种报道将会登遍大陆的报纸而不会有一则辟谣。即使我从这里把实情通告欧洲每家报纸，它们还是会继续刊载这种报道。

兰：您是否打算过对这许多虚假报道进行反驳？

马克思博士：我打算反驳过，一直到我对这种无效劳动感到厌

烦。为了说明这些报道胡编得多么粗心大意，我可以举例。我曾在一篇报道中看到，费利克斯·皮阿竟被说成是国际成员。

兰：他不是国际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在协会里很难容下这样一个不受约束的人。有一次他竟擅自用我们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草率的声明，我们立即予以否认，①不过各报照例无视我们的否认，这样说并不冤枉他们。

兰：那么马志尼是你们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就不会有多大的成就。

兰：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当然一直认为，他代表最进步的观点。

马克思博士：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不想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可是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仍然被认为是未来文明民主制度的使徒。他们有个时候是这样的人——也许是在1848年以前，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英国意义上的）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全都转向反动派一边，无产阶级不再理会他们了。

兰：有些人认为他们看出了你们组织中有实证主义成分的迹象。

马克思博士：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中间有实证主义者，也有的实证主义者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工作也做得不错。但是这并不是凭

---

①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费·皮阿演说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他们的哲学，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不相干；这种哲学追求的只是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333]

兰：既然如此，我认为新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建立自己的哲学，就像他们建立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完全正确。例如，要是我们的战术来自，比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那我们就不能期望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描述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我们想指出，劳动和资本之间是另外一种关系。

兰：关于宗教呢？

马克思博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代表协会讲话。我自己是无神论者。在英国听到这样坦率承认无疑会令人吃惊，但是想到在德国或者法国不必悄悄这样做则感到欣慰一些。

兰：可是您把您的总部设在英国这里？

马克思博士：理由很明显：结社权在这里是已经得到承认的东西。的确，结社权在德国也存在，但是遭遇重重困难。而在法国，多年来结社权根本就不存在。

兰：那么美国呢？

马克思博士：我们的主要活动中心目前都是在旧大陆欧洲各国。到目前为止，有许多情况使得工人问题在美国还没有呈现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洲一样，

随着一个不同于社会其余部分并与资本分离开来的工人阶级的成长，工人问题很快就会凸显出来。

兰：看起来，在英国，人们所期望得到的解决——不论会是什么样的——将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实现。利用讲坛和报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英国的这个办法是有希望的。

马克思博士：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只要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总是表现得很愿意接受多数做出的决定。但是，请注意，一旦它在自己认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遭到多数否决，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一场新的奴隶主战争。[334]

载于1871年7月18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卡·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335]

摘自关于1871年9月24日伦敦庆祝大会的报道

关于国际，他[马克思]说，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应归之于并非国际的会员们所能左右的环境。国际的建立就是这种环境造成的结果，而决不能归之于参与此项工作的人们的努力。这并不是哪一批能干的政治家的事；世上所有的政治家都创造不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环境。国际从未提出任何特殊的信条教义。它的任务就是组织劳动力量，团结各种各样的工人运动，使它们联合起来。协会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就在于这样一种环境：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越来越遭受压迫；而这就是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为自身的解放必须进行斗争。各国政府对国际的迫害，酷似古代罗马对原始基督教徒的迫害。这些人最初也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大功告成，罗马帝国就会灭亡。古代罗马的迫害未能挽救帝国，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国际的新颖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的。国际建立以前的所有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为工人阶级建立的一些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宪章运动[7]的兴起就曾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当然，果真有所

成就，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组织程度，使这个阶级能够利用普选权来为自己谋利益。

接着，他又提到二月革命[16]这场受到部分资产阶级支持的运动，他们支持这个运动是为了对付统治集团。二月革命只是向工人阶级许下一些诺言，并且用统治阶级中的一批人代替了另一批人。六月起义[18]是对整个统治阶级，包括其中最激进的那部分人的一次反叛。在1848年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掌权的工人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用一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他们感觉到被出卖了。

最近的运动就是巴黎公社，这是迄今最伟大的运动。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公社曾有很多误解。公社不能建立一个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促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但是，在实行这种改变以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并联合起来。

载于1871年10月15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1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见本卷第12—13页）。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13页）。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本卷第15页）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

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3、117、180、456、602。

2 这些引文出自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讲话以《预算》为标题，全文发表在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24841号以及伦敦的其他日报上。——3。

3 **勒杀犯**是一类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事件在伦敦经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问题。——4。

4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

文中提到的蓝皮书指《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2卷。——4。

5 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蓄奴州海港，严格限制美国棉花出口，致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棉花供应中断而出现棉荒，欧洲大部分棉纺织业陷于瘫痪。1862年英国有75%以上的纱锭和织布机停

工，纺织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状况严重恶化。60年代初期欧洲的歉收更加重了工人的贫困，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北部各州。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4、36、39。

6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出自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于70年代围绕这句话大肆诽谤马克思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布伦坦诺便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进行了反驳。

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以及1891年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一文中，都彻底地揭露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诽谤性言论。——8。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

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11、312、519、544、618。

8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82—288、299—310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11、33。

9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沙·克劳福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13。

10 “*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出自首相帕麦斯顿之口，他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以嘲弄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以约·马圭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获得对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称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13。

11 指美国内战期间，从1861年底到1862年初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异常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并逮捕乘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

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未能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14。

12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是马克思在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逝世后对他进行全面评价的著作。马克思在文中肯定了蒲鲁东早期的功绩，阐明了他与蒲鲁东在理论上的根本分歧，批判了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经济学观点和社会改良方案。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不懂得科学的辩证法，陷入思辨哲学的幻想，“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见本卷第19页)；马克思针对蒲鲁东在财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指出“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应当“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应当“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见本卷第18页)。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社会改良方案，指出蒲鲁东企图通过“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来消除剥削“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见本卷第22页)。马克思还揭露了蒲鲁东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本质，指出蒲鲁东由于不懂真正科学的辩证法而陷入诡辩的泥坑，实际上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也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

蒲鲁东于1865年1月19日去世。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写了《论蒲鲁东》一文。这篇文章写于1865年1月24日，采用给施韦泽的信的形式，并于1月28日寄到编辑部。施韦泽将这篇文章刊登在1865年2月1、3、5日第16—18号报纸的副刊上。马克思在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对蒲鲁东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针对拉萨尔的。

《论蒲鲁东》后来又收入经恩格斯校订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1885年)和第二版(1892年)；《论蒲鲁东》的法译文由恩格斯1884年翻译并经保·拉法格校阅，收入《哲学的贫困》1896年法文版。

在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和1949年解放社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的中译本中都收有这篇文章。——16。

13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2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同时用法文和德文

引证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和下面一段话。经恩格斯校阅，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学的贫困》转载这篇文章时删去了法文的引文。——19。

14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的结尾段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6—617页)。——20。

15 埃·卡贝因在19世纪30—40年代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受人尊敬。卡贝在自己出版的《人民报》和《1841年人民报》上除了宣传他的空想计划外，还抨击了七月王朝的制度，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卡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传单中还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但是，他的这些活动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事业中却起过显著的作用。——21。

16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22、136、220、453、492、619。

17 指蒲鲁东在1848年7月31日法国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演说全文刊登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770—782页。蒲鲁东在这次演说中除了谈论利息和降低利率、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之外，在谈到对1848年6月23—26日巴黎起义者的镇压时，说这是暴力和专横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1848年8月5日《新莱茵报》第66号上的文章《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对蒲鲁东的演说作了详细评价。——22。

18 *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

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22、102、127、205、353、619。

19 指阿·梯也尔在1848年7月26日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1848年7月31日蒲鲁东发表演说之后，梯也尔的演说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后来又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页。——22。

20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见注267)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23、597。

21 指蒲鲁东的著作《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年巴黎版。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关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23。

22 《*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论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扼要而通俗地阐述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原理，说明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和工资的实质，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秘密。他指出，资本家的本质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工人阶级必须不断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才能对资本家的贪欲有所抑制，才能防止自己的地位不断恶化。在深刻论证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经济斗争的局限性，强调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指出，单纯的经济斗争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见本卷第77—78页)

本文是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委员约·韦斯顿在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马克思于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写成这篇报告稿,批驳了这个错误观点。

目前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没有标题,开头写有:"1865年6月20日星期二向中央委员会宣读。"全文由作者分为十四节。1898年,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以《价值、价格和利润》为标题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艾威林写的序言。引言和前六节在手稿中没有标题,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本卷除总标题以外,保留了这些小标题。这篇报告的德译文发表在1897—1898年《新时代》第16年卷第2册,译者是爱·伯恩施坦,采用的标题是《工资、价格和利润》。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李季译、陶孟和校的该著作的中译本,书名为《价值价格及利润》;1929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朱应祺、朱应会的中译本,书名为《工资、价格及利润》;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收有这篇著作的中译文。——25。

23 关于通过协会的帮助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问题、缩短工作日以及女工和童工等问题已列入1865年9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25。

24 阿格利巴的比喻源于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为了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四肢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阿格利巴把当时的社会比做有生命的机体,把平民比做机体的手,把贵族比做供养这个机体的胃。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29。

25 *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指法国国民公会于1793年5月4日、9月11日和29日以及1794年3月20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固定的最高价格。——33。

26 马克思在这里错把威·纽马奇写成威·纽曼。1861年9月,不列颠科学促进

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届年会，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做客的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纽马奇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报告。1861年9月于曼彻斯特》1862年伦敦版。——33。

27　指英国经济学家托·图克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1839年》1840年伦敦版、《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1857年伦敦版，该版为两卷本，是《价格史》的第5—6卷。——33。

28　对俄战争即*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35、354。

29　19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伴随着相对的农村人口过剩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农业工人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在其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使得大批拆毁农村住宅的现象大大加剧。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自己用不着、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5节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也有关于农业工人住宅被毁的描述。——35。

30　*技艺协会*即*技艺和手工业协会*，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促进技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酬劳那些“在解决穷人就业，扩大商业贸易，以及对国家财富增长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人”。1853年，该协会为了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称该协会为“艺术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

页)。——35。

31 *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关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了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议会于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法令的实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35、516。

32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51。

33 *反雅各宾战争*是1792—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而进行的长达23年的战争,也称二十三年战争。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战争期间,为对付劳动群众,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镇压了多起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69、74。

34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

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入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45页）。——69。

35　1832年2—3月，英国议会对1831年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时的法案进行辩论时，资本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认为童工的工作日应为12小时。——69。

36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充满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将自己轧死。——70。

37　*济贫法*是英国1601年颁布的，它规定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居民皆可通过济贫会获得救济。该济贫法曾经过多次修改。

1834年通过的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34）从事强制性劳动。——74。

38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是恩格斯向工人推荐和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在这篇书评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资本论》的理论成就和崭新的研究方法，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见本卷第79页）。恩格斯在文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他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穷困”；这种生产方式第一次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创造

出"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见本卷第86、87页)。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资产阶级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著作保持沉默。为了冲破这种沉默,广泛宣传《资本论》,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书评。这篇书评是专门为德国工人报纸《民主周报》写的。书评写于1868年3月2—13日,发表在1868年3月21、28日《民主周报》第12、13期,没有署名,后来在1871年4月5、8日《人民国家报》第28、29号上转载。书评的法译文刊登在1870年6月6、9日《自由报》第47、50号。

1939年1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章汉夫、许涤新合译的《恩格斯论〈资本论〉》一书中收有该文,篇名为《载在〈民主周刊〉中底〈资本论〉述评》;1939年1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何锡麟译的《〈资本论〉提纲》一书中也收有该文,篇名为《马克思的〈资本论〉》。——79。

39 *北德意志联邦*是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取代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85、121。

40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讨论总结。马克思在报告中批判了巴枯宁派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他指出,继承法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这种经济组织的结果,"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见本卷第88页)。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指出"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是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见本卷第89页);

把废除继承权说成社会革命的起点，只会导致工人阶级偏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攻击点。

1869年6月，米·巴枯宁在日内瓦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坚持要求将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1869年7月20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开会讨论继承权问题，马克思作了内容丰富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650—653页）。1869年8月2—3日马克思起草了这次讨论的总结《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并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1869年9月11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上，约·格·埃卡留斯宣读了马克思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被全文收入用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发表在1869年10月《先驱》杂志第10期和1873年10月11日纽约《工人报》第36期。——88。

41　指圣西门的一批信徒，巴·安凡丹、圣·巴扎尔、奥·罗德里格、菲·毕舍等人在19世纪20年代末曾传播和发展他的学说。1830年，根据巴扎尔在巴黎的讲稿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一书，其中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见《圣西门学说释义。第一学年。1829年》1830年巴黎版第143—169页。——89。

42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是恩格斯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的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2月14日来信的复信。恩格斯在信中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成为工人阶级共同信念的情况下，必须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见本卷第92页）。他还告诫工人阶级决不能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并提出利用普选权进行政治斗争，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指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见本卷第92页）。

1871年2月7日国际总委员会会议授权恩格斯负责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通信。恩格斯在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联系后，便坚决支持和引导这些支部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从1871年初起，西班牙成为巴枯宁分子的活动地盘。在这个国家，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的机构内部组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企图攫取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尽管巴枯宁分子

进行分裂活动，但国际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并且在西班牙相继出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许多新的支部。

复信写于1871年2月13日，原文是法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91。

43 指*全国劳工同盟*，该同盟于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尔维斯积极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在美国开展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促进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维护女工权利的斗争中，同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卡梅伦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劳工同盟召开了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同盟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人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指望通过这种改革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消灭银行制度。1870—1871年，一些工人组织脱离了劳工同盟，到1872年该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94。

44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全面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见本卷第152页）；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必须把“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见本卷第151、194页），“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见本卷第207页）；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见本卷第158页）。马克思充分肯定巴黎公社作为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公社的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可随时撤换；武装力量按民主原则组织；司法机关的官

吏由选举出来的法官取代；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改造任务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他指出："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见本卷第158页）工人阶级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见本卷第159页）。马克思还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强调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制度的重要条件。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搜集和研究关于公社活动的各种材料，并建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全体会员的宣言。受总委员会的委托，马克思于1871年4月18日后着手起草这一宣言，一直持续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摘要见本卷第187—223页），从5月6日起开始定稿。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两天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随后，马克思又对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加工。

《法兰西内战》是用英文写的，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前后在伦敦印成小册子，同年又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第二版中改动了几处正文，增加了《附录》的第二部分。

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先后被译成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佛拉芒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丹麦文和波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1872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根据英文第三版翻译的法文版，马克思校订了译文，作了大量修改，并重新翻译了某些段落。

这部著作1871年由恩格斯译成德文出版。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再版了《法兰西内战》的德文本。1891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该版写了导言。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一并收入这一版。此后在《法兰西内

战》的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均收有这两篇宣言。

恩格斯在为1891年《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中阐明了马克思在书中对巴黎公社经验所作的总结的重大理论意义；进一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分析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对公社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公社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两项措施，认为这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办法；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110、111—112页）

《法兰西内战》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刘云（张闻天）翻译，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95。

45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而写的。最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本人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28期上。发表时，编辑部把原稿最后一段中"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理·费舍1891年3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恩格斯并不同意编辑部对原稿作任意改动，但是，大概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不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仍保留了改换的字眼。本卷恢复了恩格斯原稿的用语。——99。

46 指1813—1814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99、116。

47 "*蛊惑者*"是对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这一事件成了镇压所谓"蛊惑者"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斯巴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惑者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这一称谓便流传开来。到了30年代，由于受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所谓的"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99。

48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

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99、243、474、482。

49　*议会反对派*（1830—1848年）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以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做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这一集团通常被称做王朝反对派。——101。

50　指*宴会运动*。这是1847年7月—1848年1月之间，反对派利用宴会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斗争。七月王朝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于1847年7月9日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从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仅1847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70次宴会，出席总人数多达17 000余人。每次宴会出席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人。工人代表也组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的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拉开了序幕。恩格斯针对宴会运动撰写过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81—384、394—402、405—408、423—426以及430—437页）。——101。

51　指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

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1877年,正统派把波旁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自称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身上。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一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奥尔良王朝。1877年,奥尔良派把奥尔良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路易-菲力浦之孙巴黎伯爵路易-菲力浦-阿尔伯身上。

波拿巴派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的拥护者。1877年,波拿巴派把帝国复辟的希望寄托于拿破仑第三之子欧仁·路易·约瑟夫·波拿巴身上。——102、127、166、171、205、212。

52 1870年9月1—2日在法国东北部城市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拿破仑第三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监禁在卡塞尔附近一座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威廉堡内。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103。

53 1870年9月4日,法军在色当溃败(见注52)的消息传出后,巴黎举行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103。

54 指以阿·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奥·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法德初步和约。按照初步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正式和约于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104、161。

55 指蒲鲁东的著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马克思1851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对这部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1版第44卷第164—196页）。——108。

56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是马克思在1870年7月19—23日写成的。

1870年7月19日，即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这次战争的宣言。宣言在7月23日的总委员会常委会通过，在1870年7月2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批准。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伦敦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2号上，几天以后以传单的形式印发了1 000份。英国的许多地方报纸也全文或摘要转载了宣言。宣言曾送交《泰晤士报》编辑部，但该报拒绝发表。

鉴于宣言第一版很快脱销，1870年8月2日总委员会决定再增印1 000份。同年9月，第一篇宣言又和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一起用英文再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篇宣言第一版中的几个印刷错误。

8月9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把第一篇宣言翻译成德文和法文并加以传播。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海·荣克、奥·赛拉叶和约·埃卡留斯。宣言由威·李卜克内西翻译成德文首次发表在1870年8月7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第63号上。马克思得到宣言的这个德译文之后，对译文作了彻底的加工，对全文的几乎一半重新进行了翻译。宣言的新的德译文刊登在1870年8月《先驱》杂志第8期，同时印成传单，随后还发表在8月12日纽约《工人联合报》、8月13日苏黎世《哨兵报》第26号、8月13日维也纳《人民意志报》第26号以及8月21日奥格斯堡《无产者报》第56号。1891年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之际，恩格斯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版上刊出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这两篇宣言的译者是路·考茨基夫人，恩格斯对译文进行了校订。

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用法文发表在1870年8月6日日内瓦《平等报》第28号、1870年8月7日布鲁塞尔《国际报》第82号和1870年8月7日韦尔维耶《米拉波报》第55号。由总委员会所设委员会翻译的第一篇宣言的法文本还印成了传单。第一篇宣言于1870年8—9月用俄文首次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人民事业》第6—7期上。——113。

57 拿破仑第三政府为了平息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巩固摇摇欲坠的第二帝

国政权，于1870年5月8日举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交表决的问题含有这样一种意思，即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对一切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但是公民投票反对政府的仍然多达150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也多达190万人。这一结果表明反政府力量仍持续增长。政府在准备公民投票的同时，广泛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措施，对工人组织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并散布所谓“赤色恐怖”来吓唬中间阶层。

国际的巴黎联合会和巴黎工会联合会曾于1870年4月下旬发表宣言，揭露波拿巴派玩弄所谓公民投票的实质，并号召工人拒绝参加。公民投票前夕，政府以警察捏造的谋刺拿破仑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联合会的会员，并以此为借口在法国各城市对国际会员展开大规模的迫害。1870年6月22日—7月5日举行的对巴黎联合会会员的审判完全证明这一罪名是莫须有的，法国的许多国际会员仅仅因为他们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便被波拿巴的法庭判处徒刑。

法国政府当局对国际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113。

58 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的政变，政变的结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114。

59 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掠夺计划的沙文主义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是波拿巴分子于1870年7月14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组织的。

*十二月十日帮*指*十二月十日会*。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以纪念其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该组织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该团体于1850年11月表面上被解散，但实际上其党羽仍然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文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115。

60 *萨多瓦之役*即*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

洛韦)会战。——115、354。

61　1870年7月16日在不伦瑞克和7月17日在开姆尼茨举行的工人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为抗议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而召开的。

这两次大会的决议,引自1870年7月20日《人民国家报》第58号。——116。

62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是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写成的。

1870年9月6日,国际总委员会研究了由于第二帝国崩溃及普法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形成的新局势,决定就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言。为此,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克思、海·荣克、乔·米尔纳和奥·赛拉叶。

马克思起草这篇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和资产阶级借口军事战略上的需要而并吞法国领土的野心。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召开专门会议,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一宣言。宣言被分送到伦敦各资产阶级报刊,然而这些报刊却采取沉默态度,只有《派尔—麦尔新闻》在1870年9月16日摘要刊登了宣言。9月11—13日宣言用英文以传单的形式印发了1 000份。9月底又出版了将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的新版本。这一版改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也对个别段落的文字作了修改。

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由马克思翻译的,他在翻译时删去了个别段落,增加了几句专门针对德国工人说的话。第二篇宣言的这个译本发表在1870年10—11月《先驱》杂志第10—11期,1870年10月8日维也纳《人民意志报》第37号以及1870年10月1日苏黎世《哨兵报》第33号,同时还以传单的形式在日内瓦印发。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第三版中刊出了第二篇宣言,为该版翻译第二篇宣言的是路·考茨基夫人,恩格斯对译文进行了校订。

第二篇宣言的法译文载于1870年10月23日、12月4日《国际报》第93、99号及1870年9月21日《波尔多论坛报》,并以节译的形式载于1870年10月4日《平等报》第35号,此外,这篇宣言还用佛拉芒文发表于1872年10月16、24日安特卫普《工人报》第51、52号。——120。

63　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16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并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而成为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657年,当时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使波兰承认了他对普鲁士领地的主权。——122。

64　指1795年4月5日参加了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缔结的巴塞尔和约,这一和约的签订导致了欧洲各国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123。

65　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没有向俄国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在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上成立华沙大公国(法国企图使之成为进攻俄国的跳板),与普鲁士一样解除与英国的联盟,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拿破仑第一强行签订的掠夺性的蒂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124。

66　1865年10月,俾斯麦和拿破仑第三在比亚里茨会晤。拿破仑第三事实上同意了普鲁士与意大利结盟并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当时拿破仑第三认为,后来发生于1866年的普奥战争将会持续很久,他可以伺机插手,从中渔利。

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亚·哥尔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俄国在战争中将采取有利于普鲁士的善意的中立,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同时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125。

67　指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在拿破仑统治覆灭后取得胜利。

德国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曾一起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然而1815年拿破仑被推翻以后,战争的胜利果实却被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中以反动贵族阶级为支柱的统治者们所窃取。以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为核心的反革命君主联盟——神圣同盟,成了欧洲国家命运的

主宰。随着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德国保持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巩固了德意志各邦的封建专制制度，保留了贵族阶级的一切特权，加剧了对处于半农奴制下的农民的剥削。——126。

68 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争取承认1870年9月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并在外交上给它以支持的运动。从9月5日起，伦敦、伯明翰、纽卡斯尔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工联在这一行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参加者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并在他们的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积极参加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组织工作。——128。

69 暗指英国自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于1792年开始对革命的法国作战以来，积极参与了促使这些国家结成联盟的活动，并于1793年直接参加了这场战争。英国也是欧洲最早承认法国1851年12月2日建立的波拿巴政体的国家。——128。

70 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茹·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133。

71 *投降派*是对1870—1871年巴黎被围期间主张巴黎投降的人的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泛指投降主义者。——133、189。

72 指波拿巴派的周报《旗帜报》被揭发用欺骗手段筹集资金而停刊。——134。

73 *动产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埃·贝列拉和伊·贝列拉兄弟俩于1852年创办并为同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及参与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自己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其他各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另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

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其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当时这一反动时期特有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仿效动产信用公司纷纷建立起类似的机构。——134、204。

74　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发生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向在贝里公爵追思弥撒仪式上表现出的正统主义行为提出抗议，群众捣毁了圣日耳曼奥塞鲁瓦教堂和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宅邸。奥尔良派的政府出于打击对它抱敌视态度的正统派的目的，没有采取措施干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宅邸时，在场的阿·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135。

75　1832年，当时任内务大臣的阿·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公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并对她进行了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和她儿子的声誉。——135、213。

76　指当时任内务大臣的阿·梯也尔在镇压1834年4月13—14日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巴黎起义中扮演了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人集团犯下了种种暴行，居住在特朗斯诺南街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惨遭杀害。梯也尔是起义时及起义失败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镇压的主要指使者。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利用路易-菲力浦1835年7月28日遭谋刺这一事件乘机于当年9月9日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对1789年和1819年的出版法进行了修订，限制了陪审人员的权利；并对新闻出版业采取了多项严厉措施，增加了定期刊物的保证金；规定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行政治体制言论的人以政治犯罪论处并课以高额罚款。——135。

77　1840年底，陆军大臣尼·让·苏尔特在众议院提出一项加强巴黎防务的法案，计划用14 000万法郎来修筑防御设施。阿·梯也尔当时被任命为负责审查该项法案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841年1月30日在众议院对这一计划的实施进行了论证。梯也尔借口必须加强巴黎的防御工事，使这项法案得

以具体实施。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以加强巴黎防务为借口，对人民运动实行镇压而采取的预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梯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构筑大批特别坚固的堡垒。——135。

78　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莫城，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起义于5月15日被镇压下去，与此同时议会和国民自卫军被解散，当年2月在群众压力下实行的一些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措施也被取消。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又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136。

79　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派兵前往意大利，对罗马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其目的在于消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终被法军占领，罗马共和国被推翻。——136。

80　指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地镇压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见注18）。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地位更加巩固。——137、145、152、174。

81　*秩序党*是1848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137、200、205、212、218。

82　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公约，造成了法国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以及法国同欧洲各国反法同盟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菲力浦国王未敢发动战争，并不得不放弃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阿·梯也尔当时是法国首相。——137。

83　阿·梯也尔企图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他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大部队员额（按照1871年2月26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签订的鲁昂协定，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

数增至8万，不久以后，又增至10万。德国司令部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梅斯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黎公社。——137。

84 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见注51）得不到人民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小册子。他们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镇压以后才开始活跃起来。——139。

85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140、446。

86 *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波旁王朝复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140、163、212。

87 “*乡绅议会*”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 of rural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 ruraux”），意即“乡绅会议”、“乡绅议会”。这是对1871年2月12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的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保皇党人，即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乡绅议会”的议员被称做“乡绅议员”。——140、147、164、171、200、205。

88 指俾斯麦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参看注54）。——140。

89 指当时的国民议会图谋迁都一事。1871年3月30日，伦敦《每日新闻》第7774号曾载文论及这一情况。文章作者认为，巴黎无论就自然条件或历史条件而言，都是法国的中心，它体现着法国的领土、政治、精神、社会等方面的统一，取消巴黎的首都地位就等于在精神上砍去法国的头颅。——141。

90 1871年3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超期票据的法令。此项法令规定，1870年8月13日—11月12日立的借约可延期7个月偿付；11月12日以后立的借约不得延期偿付。这就意味着，此项法令实际上不仅没有给予负债者即工人和居民中比较贫困的阶层延期偿付的权利，而且还使许多小工商业者遭到破产。

在巴黎围城时期，房租缴纳时间从一年中的一个季度拖延到另一个季度。1871年3月底房租又一次到期。阿·梯也尔和茹·杜弗尔提出的办法是授权给房主，如房租已两年未付，可将房客赶走，并没收其家具和物品。国民议会对房租问题未作出任何决议。——141。

91　*十二月分子*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拥护者。约·维努瓦直接参加了政变，他曾用军队镇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起义。——141。

92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141、186。

93　根据报纸的报道，从阿·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3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于1871年6月20日被通过。——141。

94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大批政治犯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143。

95　1870年10月31日，当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阿·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开始同普鲁士人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他们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决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国防政府乘机借助于当时仍然拥护它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背弃了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145、187。

96　由路·特罗胥指挥的*布列塔尼兵*组成的部队，也被称做布列塔尼别动队，这支部队被当做宪兵部队镇压了巴黎的革命运动。

*科西嘉兵*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45、188、217。

97　1871年1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采取了新的革命行动，他们前往市政厅，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

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者，下令封闭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血腥地镇压了这场革命运动。——146。

98 法语sommations一词有“警告”、“勒令”等含义，这里是指法国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1831年的法令，以鼓声或喇叭声发出的这种警告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权使用武力。国民自卫军沿用了法国政府过去的做法。

骚扰取缔令是英国1714年颁布并于1715年生效的一项法令。该法令明文规定，禁止12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如有这种情况发生，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若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解散，则可使用武力。——146。

99 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下半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并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久攻不破的城墙应声倒塌（《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147。

100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147、454。

101 10月31日起义发生时，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起义者中有人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起义的领导者古·弗路朗斯所阻止。——148。

102 此段引文出自1871年4月5日的公社法令。按照此项法令，所有被控与凡尔赛方面有勾结的人，其罪行一经查实，一律作为人质关押。巴黎公社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是要阻止凡尔赛军队继续杀害被俘的公社战士。

此法令于1871年4月6日在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6号上发布，4月7日，伦敦的《每日新闻》作了报道。——149。

103 等级授职制是中世纪封建主授予藩属封地或神职的制度。其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摆布。——156。

104　*中世纪公社*是西欧中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城镇自治制度，实行自治的城镇因而也叫做公社。这种公社虽然实行自治，但真正的统治权仍然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黎及其他城市的自治机构也叫做公社。1871年的巴黎公社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之一。——156。

105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156。

106　1870年12月21日，英国著名科学家托·赫胥黎曾向伦敦国民教育局提出一项建议，认为该局秘书的薪金应该定为每年1 000英镑。后来此职位的年薪被定为800英镑。——159。

107　指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在经济上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160。

108　1848年8月22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协议"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还债务。法案被否决使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不得不忍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宰割。——160、204。

109　*无知兄弟会*是对1680年产生于法国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蔑称。该团体的成员承担了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里，学生主要接受宗教教育，得不到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160。

110　指*外省共和联盟*。这是一个由居住在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大约于1871年4月中由让·巴·米里哀尔创立。该组织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其宗旨是巩固共和国制度，确保公社的独立性。——160、203。

111 引自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这份文献曾于1871年4—5月初刊登在公社的各报上，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印发。——160。

112 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于1825年4月27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赔偿，赔偿总额约10亿法郎。这笔赔偿费大部分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161、200。

113 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1法郎增加45生丁（100生丁合1法郎）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负担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的这种政策使大地主和天主教僧侣借机策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壮大了反革命势力。——161、200。

114 指下列法律：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泛权力的法令；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的法案；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书中，对这些法律曾加以阐述。——161、201。

115 *旺多姆圆柱*又称凯旋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战功，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3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163、210。

116 1871年5月5日《口令报》公布的材料揭露了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经调查发现，巴黎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女修道院有把修女长年监禁在小修道室里的情况，并找到了刑具。在圣洛朗教堂发现一个存放尸骨的秘密地窖，这是凶杀的证据。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也公布了这些材料。——164。

117 威廉堡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座城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随从被普鲁士人俘虏后，于1870年9月5日—1871年3月19日囚禁于此。为自己卷香烟是这些囚犯们的主要活动之一。——164。

118 *在外地主*（来自“absentee”——“缺席者”一词）通常指那些在爱尔兰拥有

地产却长期居住在英格兰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获利的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165。

119　法语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对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时从城里逃出的资产者的讽刺性称呼，因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所以听起来就更具讽刺意味。——167、175。

120　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流亡的贵族保皇党人策动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以路易十六极端反动的大臣沙·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这里。——167。

121　朱安兵原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巴黎公社时期，公社战士把由沙雷特率领对公社战士作战，怀有保皇情绪的一支凡尔赛军队称做朱安兵，他们都是从布列塔尼招募来的。——168。

122　朱阿夫兵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一支殖民地部队，起初由当地人和法国人组成，后来全部由法国人组成，但仍保持原有的东方服饰。教皇的朱阿夫兵指1860年仿效朱阿夫兵组织和训练的教皇警卫团，由法国贵族青年的志愿兵组成。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并废除教皇的世俗权力之后，教皇的朱阿夫兵于1870年9月被调往法国，改编为"西方志愿军团"，在卢瓦尔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编制内参加了对普军的战斗。1871年，这个军团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168。

123　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爆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1871年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工人占领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达以后，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并选举了由五人组成的地方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足够的联系，

最终丧失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工人于4月30日再次发动起义，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马赛的起义居民于1871年3月23日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定于4月5日进行公社选举。马赛的革命起义于4月4日遭到政府军队镇压。——170。

124 指茹·杜弗尔在1839年5月共和派秘密组织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期间，为巩固七月王朝而进行的活动，及其在1849年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派时所起的作用。

1839年5月12日，以奥·布朗基和西·巴尔贝斯为首的四季社筹划的巴黎武装暴动，由于没有依靠群众，并且带有密谋性质，因而遭到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扑灭革命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杜弗尔为内阁成员之一。

1849年6月，山岳派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当时身为内务部长的杜弗尔提议发布一系列法令，以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70。

125 指国民议会1871年7月6日正式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此项法令使以前反动的新闻出版法(1819年和1849年)的条款重新生效，规定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出版物实行严厉的惩罚，直至查封；此外还有关于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员复职的法令以及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并把没收财产之举定为刑事犯罪的特别法令。——170。

126 由茹·杜弗尔提出并于1871年4月6日在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法庭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简化了1857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部长有权直接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定案(包括审阅上诉书)和执行判决在48小时内即可结束。——170。

127 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不再禁止英国货进口，只是对英国货征收30%的进口税，而法国向英国出口的货物大部分可以免税。商约签订以后，英国货大量涌入法国，大大加剧了法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引起了企业家的不满。——172。

128　指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两度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统治的局面。

苏拉专政(公元前82—79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拥戴的独裁者，在他专政的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自己的政敌。他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而被处死。

罗马前后三头执政(公元前60—53年及46—43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前三头执政是庞培、凯撒和克拉苏，后三头执政是屋大维、安东尼和李必达。三头执政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以及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采取的行动的一个阶段。三头执政广泛地采用了从肉体上消灭敌人的手段。——174。

129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174。

130　英美战争期间，英军占领华盛顿后，于1814年8月纵火焚毁了国会大厦、白宫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

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殖民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劫掠并焚毁了北京的圆明园——中国建筑和艺术的精华。——176。

131　1812年，拿破仑以50万大军进攻俄国。9月7日在莫斯科附近的博罗季诺会战中，俄军被迫放弃并焚毁莫斯科，并切断了拿破仑军队的后路，使之陷于饥寒交迫被围困的绝境而不得不引军后退。俄军乘机反攻，拿破仑军队溃败，仅2万余人得以逃生。——177。

132　*汪达尔*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455年占领罗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177。

133 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与内讧，并扶助主子登上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横行霸道的雇佣兵和军阀的同义语。——178。

134 马克思把普鲁士于1849年1—2月根据普鲁士国王在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称做普鲁士的“无双议院”，因为它同1815—1816年法国的“无双议院”（见注86）极为相似。根据这部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第一议院即“贵族院”和第二议院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官僚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1849年选入第二议院的俾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集团的首领之一。——179。

135 *圣灵降临节*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约在春末夏初，是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这里是指5月28日，即公社的最后一日。——180。

136 这封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1871年6月6日茹·法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这一声明曾收入《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三版以及1871、1876、1891年的德文版，也曾单独发表在英、法、德等国许多家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392—394页）。——184。

137 由于传闻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1870年9月4日崩溃，法国许多城市爆发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里昂、马赛、图卢兹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地方公社，特别是里昂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如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中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社。——187、217。

138 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地位不稳。为了显示自己仍然得到居民的支持，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国防政府于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由于政府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对居民施加压力，进行蛊惑性宣传，使自己仍然获得了多数票。——187、613。

139 *七月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146）至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16）期间国王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统治时

期。——191、219。

140　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1871年3月25日巴黎出版的《号召报》第650号以及1871年3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4号。——196。

141　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场。由于当时第三等级会议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遭到路易十六政府的反对，因此，第三等级的议员们举行宣誓，表示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场的宣誓成了18世纪末预示法国革命即将爆发的事件之一。——205。

142　这个支部指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协会的纲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倾向。1870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该协会的工人成分，吸收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对协会的纲领作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1870年3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206。

143　*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208。

144　*伊加利亚*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述的幻想中的共产主义国家。信奉卡贝空想共产主义的人被称做伊加利亚派。——208。

145　巴黎公社时期，反动的《巴黎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造谣说，国际的巴黎支部依照反德同盟的意旨，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312—313页）。

*反德同盟*是1871年3月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宣传的一个处在酝酿中的政治团体，该团体鼓吹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报仇雪耻，挑拨德法两国工人之间的关系。——210。

146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

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见注139)。——220。

147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221。

148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是恩格斯1871年9月21日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针对巴枯宁分子鼓吹工人运动应放弃政治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在发言中指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见本卷第224页)恩格斯强调工人政党不应当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独立的政党,应当坚持自己的政治目标,并利用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斗争武器。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是1871年9月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9月20日爱·瓦扬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指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在政治上团结工人力量。巴枯宁分子安·巴斯特利卡、保·罗班以及西班牙支部代表安·洛伦佐企图阻挠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遭到失败。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起草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新决议草案,总委员会为此于10月7日成立了一个有恩格斯参加的委员会。新决议草案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他们在草案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明确指出组织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实现其最终目的——建立无阶级社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10月16日总委员会批准了恩格斯就这个决议草案所作的报告。

收入本卷的这篇发言记录是恩格斯本人写的,原文是法文,1934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224。

149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章程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

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求把分散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章程规定，协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使协会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章程还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建立与一切旧政党不同的政党，这样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章程还对协会的组织机构作了具体规定。

《共同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马克思在1864年10月用英文写成的，同年11月1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称为《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章程经过补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组织条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75—485页）一起由大会批准。1871年9月底—11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对章程和组织条例重新作了修订，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过时的提法，形成新的文本。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这一条是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补入章程的。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与下翻译的。正式版本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其英文版于1871年11月上半月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同年12月出版了法文单行本；德文版于1872年2月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另外还刊登在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人民报》出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参与翻译的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226。

150 1864年的临时章程在“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这两句话和前面一整段话都带有宣言性质。由于1864年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小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1864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7页）。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1871年新版本时删去了“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这句话，并在章程的附录里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88页）。——227。

151 第七条(a)是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补入本章程的,是对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的简要概括。——229。

152 《论土地国有化》是马克思论述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马克思认为,土地问题是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见本卷第230页)。他批驳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张,阐明了土地国有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他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居民需要的不断增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等方面论述了农业中实行大规模耕作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指出大规模耕作即使在目前这种使耕作者本身沦为役畜的资本主义形式下也比分散的小块土地耕作远为优越,因此,“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见本卷第231页)。他同时指出:“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这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促使‘地租’逐渐上涨,反而为土地占有者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靠生产者来养活自己。”(见本卷第232页)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见本卷第233页)

马克思的手稿《论土地国有化》写于1872年3—4月间,起因是国际曼彻斯特支部讨论了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欧·杜邦在1872年3月3日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该支部的成员在土地问题上思想混乱,并讲述了自己准备的发言要点。他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便他能在支部会议召开之前考虑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在手稿中广泛地论述了对土地国有化问题的观点。1872年5月8日,杜邦在支部会上宣读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以《土地国有化。在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宣读的一个报告》为标题发表在1872年6月15日《国际先驱报》第11号,当时未指明作者和报告人,但是报告的内容和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手稿一致。本卷采用发表在《国际先驱报》上的文本,与马克思手稿不同的地方在脚注中作了说明。——230。

153 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6—13日举行。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代表近100名。大会

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必须把铁路、地下资源、矿井和矿山、森林以及耕地转归公共所有。这一决议说明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大多数蒲鲁东主义者已转到集体主义立场，标志着在国际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大会还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机器的使用、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等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弗·列斯纳以德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关于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协助把这部著作从德文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决议。——232。

154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批判蒲鲁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住宅短缺这类社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住房短缺的根源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见本卷第307页）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种种"救世计划"的同时，恩格斯还就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深刻论述。他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掠夺；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国家归根到底是"总资本家"，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见本卷第299页）；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目标，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见本卷第310页）；论述了产生城乡对立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对立的必要性和途径，强调消灭城乡对立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见本卷第326页）。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把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说成是一种"祸害"的谬论，指出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使人的劳动生产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消灭阶级和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创造了必要条件。他坚决反对为未来社会臆造空想方案，指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实际

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见本卷第333页)

这部论战性著作共分三篇。第一篇的标题是《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写于1872年5月7—22日,是对《人民国家报》上转载的几篇题为《住宅问题》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复。这几篇匿名文章原来发表在奥地利工人报纸《人民意志报》上,后来才知道作者是蒲鲁东主义者、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写信告诉威·李卜克内西:"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你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来反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荒谬的臆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57页)1872年10月,恩格斯写完了第二篇文章《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批判埃·萨克斯的小册子《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中宣扬的资产阶级慈善家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米尔柏格反驳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于1873年1月写了第三篇文章《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再次批判米尔柏格的观点。

恩格斯的这三篇文章在1872年和1873年的《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后,由该报出版社于1872年12月—1873年3月间在莱比锡分别出版了单行本。1887年3月,《论住宅问题》在霍廷根—苏黎世出了第二版,恩格斯对这一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并写了一篇序言。

《论住宅问题》曾由曹葆华、关其侗译成中文,195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35。

155 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5月10日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的规定,于1871—1873年向德国缴付的50亿法郎赔款(参看注54)。——239。

156 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具有猛烈而深刻的特点。在德国,这次危机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239、459。

157 指阿·米尔柏格匿名发表的以《住宅问题》为题的六篇文章,曾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的《人民国家报》。——240。

158　阿·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86号，标题是《论住宅问题。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240。

159　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内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的，这些编辑被开除的原因是，该报揭露了巴枯宁创建的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建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纳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恩格斯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241。

160　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90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并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科学的性质。——242、520。

161　指拥有山地和大片沼泽地和荒地的普鲁士莱茵省艾费尔高原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宜从事农业生产。力量单薄的小农用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导致周期性的歉收和小农贫困的尖锐化。这里指1882年艾费尔高原区由于连年歉收和农产品跌价曾闹过饥荒一事。——244。

162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

(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244。

163 *教父*是公元2—6世纪基督教界最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影响。教父的观点中最根本的是贬低知识和智力,颂扬无条件的信仰,敌视"异教",即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特别是古代的唯物主义。——255。

164 "*埃及的肉锅*"一词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257。

165 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他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即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262、536。

166 *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图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遭到失败。——262、536。

167 在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上,上面两段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由下述几个部分构成:(1)地租;(2)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筑资本的利润;(3)修缮费、维修费和保险费。资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举债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预付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

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博士就是博士。”

在1872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举债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

“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费用构成的那部分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的。”

1887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二版时，重新校阅了这两段，并做了若干订正。

本卷中这两段话的文字是以1887年版为准的。——268。

168　射手奥古斯特·库奇克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士兵歌曲的作者，德国诗人哥·霍夫曼的笔名。——274。

169　关于吉斯移民区的文章，载于1886年7月3、2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48号。——284。

170　*和谐大厦*是以罗·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284。

171　指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演说中说的话。瓦格纳声称，普法战争以后，尤其是由于获得50亿法郎的赔款，德国市场欣欣向荣，从而大大改善了劳动群众的状况。——302。

172　指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皇帝和首相1871年8—9月在加斯泰因、伊施尔和萨尔茨堡进行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也讨论了同国际斗争的问题，双方就反对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措施达成一致协议，俾斯麦提出以警察镇压与政府收买相结合的手段来对付工人运动。在这里恩格斯借用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威·施梯伯的名字把这些会议称做施梯伯会议，以强调其警察的反动性质。——302。

173　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一理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

(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321、440。

174　专区法指普鲁士政府于1872年12月13日为实施“行政改革”而颁布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这项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在农村中的世袭警察权力，允许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可是，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巩固国家机构、强化中央集权，以维护容克的利益。经过“改革”，容克及其代理人占据了专区和省的大部分行政职位，因此，那些地区的权力实际上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中。——323。

175　在与丹麦社会主义者路·皮奥的通信中，担任国际丹麦通讯书记职务的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主义者在宣传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恩格斯在1872年3月中旬给皮奥的信中，对一篇论述通过合作社来组织农业生产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篇文章1871年11月4日发表在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上。国际的几乎所有报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吸收小农和小租佃者参加无产阶级运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丹麦人由于当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高度发展，现在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29页)。——331。

176　《论权威》是恩格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无限自由和否定一切权威的错误观点，阐明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确立和维护权威的必要性。他分析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见本卷第337页)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不顾客观的社会条件要求一举废除权威的政治国家，甚至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的谬论，恩格斯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

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见本卷第338页）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多次请求，在1872年10月—1873年3月间为1873年《共和国年鉴》写的。当时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观在意大利，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有市场，国际在意大利的工作因此而受到很大的阻碍。所以，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便成了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面临的迫切任务。恩格斯于1872年11月将文章寄给了比尼亚米，后因比尼亚米被捕，《共和国年鉴》1873年卷被迫推迟出版，恩格斯的文章也因此丢失。比尼亚米被释放后，请求恩格斯将文章的副本寄去，或者另写一篇文章。恩格斯很快于1873年3月8日将文章寄出。由于手稿没有保留下来，无法确定第二次寄出的文章是否与第一次寄出的文章在内容和文字上完全一致。这篇文章是用法文写的，译成意大利文后发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年鉴》1874年卷。1894年6月14日，这篇文章再次用意大利文发表在《战斗》第15号，标题是《论权威原则》。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刊载于1923年12月巴黎出版的《少年》第13期，译者署名抱兮，标题为《权力的原理》。——335。

177　指无政府主义分子日益猖獗的活动。这些人在1872年8月4—6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里米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以及1872年9月15—16日在圣伊米耶举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上，公开作出决议要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断绝一切关系，同时他们还擅自决定将在纳沙泰尔（瑞士）召集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一文中对上述两次会议作了详细的评述。——335。

178　《*政治冷淡主义*》是马克思批判巴枯宁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马克思在文章中批驳了巴枯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和立即"废除国家"的谬论，指出巴枯宁分子散布政治冷淡主义谬论的目的，就是要工人在资产者面前解除武装，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忠顺奴仆；就是要捍卫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自由，反对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还驳斥了蒲鲁东及其追随者反对工人运动的种种诡辩，阐述了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意义。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请求，于1872年12月底—1873年1月初为《共和国年鉴》而写的，由比尼亚米从法文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年鉴》1874年卷。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刊载于1923年7月巴黎出版的《少年》第10期，译者署名抱兮，篇名为《离开政治的性质》。——339。

179 *《流亡者文献》*是恩格斯阐述欧洲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和俄国问题的一组文章。恩格斯在这组文章中介绍了波兰、法国和俄国流亡者对本国发生的革命事件的看法，同时批判了布朗基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革命的任务和策略、革命的前途和动力的错误观点。他根据对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分析，论述了欧洲革命的前景，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回顾，阐释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这组文章共五篇，是1874年5月中—1875年4月写成的，于1874年至1875年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1894年恩格斯把其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并分别加了标题。

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翻译的《马恩通信选集》，其中收有这组文章的第五篇，篇名为《俄国社会状况》。——347。

180 *《波兰人的声明》*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恩格斯针对波兰流亡者的组织波兰人协会1874年5月初在伦敦发表的《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而写的。恩格斯在文中指出，波兰人民为恢复波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支持波兰的解放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是与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还强调指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见本卷第355页)

1874年5月4日，波兰人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寄给恩格斯。恩格斯于5月中旬—6月10日之间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1894年这篇文章被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恩格斯加了标题。——349。

181　指波兰民主协会，该协会于1832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1836年协会成立了其领导执行机关“集中”。协会于1836年12月4日发表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呼吁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协会的纲领规定了恢复波兰独立，取消封建徭役和等级不平等，把农民耕种的土地无偿地交归农民自己所有，以及一系列其他进步措施。波兰民主协会积极参加了1846年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1849年夏季，波兰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伦敦便成了“集中”的驻地，但大部分协会会员仍然留在法国。1862年，由于在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该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349。

182　第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兰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29%的领土。——351、353。

183　波兰1791年宪法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制定的，于1791年5月3日经议会通过。这部宪法反映了波兰小贵族中最进步的人士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意愿。它废除了联邦议会的决议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改为只要多数通过即可作出决定；禁止小贵族联盟，加强中央行政权；以及扩充军队等。这部宪法没有触动农奴制的基础，贵族仍拥有全部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351。

184　1836年12月4日波兰流亡者组织波兰民主协会（见注181）发表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呼吁人民起来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徭役和等级不平等，把农民耕种的土地交归农民自己所有。

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以传单形式发表的克拉科夫起义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取消封建赋税并把土地交给农民。

波兰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纲领。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要求废除等级和等级不平等，将农民耕种的土地划归他们自己所有，要求以1772年确定的疆域为准保持波兰的独立，同时还要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人民从今以后应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352。

185　1863年1月22日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王国境内爆发了民族解放起

义。领导起义的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后来改称临时民族政府。起义的参加者有手工业者、工人、青年学生、农民等。临时民族政府颁布的宣言为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提供了法律基础。宣言声明，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并宣告波兰独立；宣言还要求把农民耕种的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取消农民的一切封建徭役。在起义的过程中，代表右派势力的小贵族分子在临时民族政府中占优势，他们惧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在同沙皇的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寄希望于欧洲各国政府的干涉，同时他们还阻挠农民获得土地，争取解放，因而起义逐渐失去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尽管起义者作战英勇，各国进步力量也对起义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给予了大力支援，但是，由于领导核心不健全，1864年4月在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起义终于失败。——352、355。

186 *泰申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在泰申签订的和约。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根据和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则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归普法尔茨选帝侯所有。泰申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至1763年的胡贝图斯堡条约止的一系列和约。俄国最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后来在和约的一项专门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353。

187 1846年2月，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进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355。

188 *文化斗争*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医生鲁·微耳和提出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的概括。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中央

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俾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

俾斯麦利用在论战过程中、于1872年3月11日在普鲁士公布的教学监督法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推行波兰居民的普鲁士化。按照这项法律，普鲁士官员不仅应对波兰神职人员进行监督，而且也应对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项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波森省颁布的一项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森中等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教学用语。

在反对天主教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同时煽起宗教狂热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80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形势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取消了大部分法律措施。——355、362、448。

189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恩格斯针对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团体“革命公社”1874年6月在伦敦发表的宣言《致公社社员》而写的。恩格斯批判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揭露了布朗基派的冒险主义实质，指出布朗基派遵循的原则是：“革命完全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制造出来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见本卷第359页）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阶段性和复杂性以及共产主义者始终必须坚持的斗争目标，指出：“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见本卷第363页）

这篇文章完成于1874年6月，发表在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同年7月25日又在芝加哥《先驱报》第23号上转载；1894年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恩格斯加了标题。——357。

190　《度申老头》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

19世纪70年代的《度申老头》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71年3月6日—5月

21日在巴黎出版,欧·韦梅希是该报的三个责任编辑之一,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大部分文章出自韦梅希的手笔。这家报纸的名称与阿贝尔出版的报纸名称雷同,"度申"的拼写稍有区别,但读音完全一样。——360。

191 指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一群布朗基主义者安·阿尔诺、爱·瓦扬、弗·库尔奈、孔·马丁和爱·马格里特退出了国际,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362。

192 《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三篇文章是恩格斯针对《前进!》杂志发表的彼·拉甫罗夫的文章而写的。恩格斯在文章中批判了拉甫罗夫的折中主义立场和对巴枯宁主义者的调和妥协态度,阐明了巴枯宁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恩格斯还强调各国工人运动应当加强国际联系,打破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努力通过相互影响而获得动力和教益。

1874年3月伦敦出版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前进!》第2期上刊载了拉甫罗夫的一篇文章,公开指责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开展的反对巴枯宁主义者分裂行为的斗争,鼓吹无原则的团结,反对革命政党内部进行任何论战。为此,恩格斯在1874年8月初—9月中下旬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117号和118号。——366。

193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367、424、456。

194 指彼·拉甫罗夫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以下恩格斯引用的是该书第3、17、44—45页。——373。

195 《流亡者文献》中的第四篇文章是恩格斯对彼·尼·特卡乔夫的诽谤性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批驳了特卡乔夫对他的攻击污蔑,揭露了巴枯宁分子散布的盲动主义和无

政府主义观点对工人运动的危害，阐明了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正确方向。

特卡乔夫在小册子中从民粹派的立场出发，宣扬俄国社会发展的所谓“独特性”和“优势”。他脱离欧洲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断言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俄国革命可以通过秘密革命组织的密谋取得胜利。根据马克思和威·李卜克内西的建议，恩格斯于1875年3月撰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号。——377。

196　指巴枯宁在1869年用密码写成的《革命问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引用了这本小册子的全文，并对它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471—477页）。——387。

197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五篇文章，是恩格斯论述俄国社会发展和俄国革命前景问题的重要文献。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驳斥了俄国民粹派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鼓吹俄国可以借助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趋于解体，要使这一社会形式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实现向高级形式的过渡，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那就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见本卷第399页）。他强调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见本卷第399页）恩格斯还针对俄国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行现代社会主义变革的基本前提，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才能为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认为这篇文章是恩格斯70年代在《人民国家报》上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41页）。列宁也认为它是“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页）。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对俄国1861年以后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文献进行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时间是1875年3月底—4月中，发表在1875年4月16、18、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45号，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于1875年6月底或7月初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于1875年5月下半月为它写了一篇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4—37页）。这篇文章1894年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发表时恩格斯又写了一篇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51—467页）。——389。

198 这段引文和以下几处引文，均引自特卡乔夫的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389。

199 指格·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397。

200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是马克思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一篇评注。马克思在评注中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同时也批判了各种无政府主义学说，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一系列重要原理。马克思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本阶级的专政来消灭或改造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并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只有在阶级和阶级统治消失以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才会消亡；无产阶级为了赢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把农民吸引到革命中来，并且努力改善农民的状况。

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于1873年在日内瓦匿名出版，被巴枯宁主义者奉为纲领性文献。马克思对该书所做的评注和批判，表述了第一国际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

收入本卷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是节选。这篇评注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926年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年鉴》第2期。——403。

201 《给奥·倍倍尔的信》是恩格斯批判拉萨尔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准备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时在纲领草案中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妥协让步。恩格斯强调指出，对于

工人阶级政党来说，一个新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外界就是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的，因此必须清除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他在信中批判了斐·拉萨尔鼓吹的“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以及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等错误观点。他还批判了纲领草案中关于建立“自由国家”的错误主张，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见本卷第414页）

这封信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以维护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共同立场和观点。写信的直接原因是，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两个工人党的合并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在原则上认同了拉萨尔主义，充斥着大量的荒谬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草案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认为，必须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坚持原则，决不能向拉萨尔派妥协让步，而应当迫使拉萨尔派放弃他们的错误主张，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行两党的合并。但是，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这个合并纲领草案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

恩格斯的这封信写于1875年3月18—28日，36年之后才首次发表在奥·倍倍尔的回忆录《我的一生》1911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

这封信的中译文1939年发表在何思敬、徐冰翻译，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哥达纲领批判》。——410。

202　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成立以后，一直为争取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而斗争。1872年9月初，社会民主工党美因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同拉萨尔派“进行原则上的合作”，9月底《人民国家报》发表声明，希望召开两派共同代表大会讨论分歧意见以便实现统一，而拉萨尔派的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却先后作出了反对统一的决议。1874年2月，爱森纳赫派国会议员向拉萨尔派代表建议组成统一的国会党团，又遭到拒绝。同年7月，社会民主工党科堡代表大会再次声明，希望德国两个工人派别统一起来，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拉萨尔派的响应。后来，由于爱森纳赫派不断发展壮大，而拉萨尔派内部矛盾重重，日趋瓦解，同时反动派加紧了对两派的迫害，拉萨尔派领导人才不得不谋求和解，以摆脱困境。——410。

203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410、426。

204 爱森纳赫派也被称为“诚实的人”。——411、445。

20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411、426、445。

206 指哥达纲领草案提出的下列各项要求：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 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 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 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4. 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 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2. 科学自由。信仰自由。”——411。

207 指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

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31页）。——412、445。

208　“*铁的工资规律*”是斐·拉萨尔的一个经济学观点。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中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1863年莱比锡第5版）

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412、416、440。

209　指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白拉克深刻地批判了拉萨尔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指出：“王室为了它自己，不可能真诚地、完全地代表一个被压迫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觉悟才能获得解放。除此之外，不能依靠任何人。”他称拉萨尔的这种反动主张为“徒然追求宫廷恩准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413。

210 指米·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在对这本书作的摘要和评注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415。

211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包括马克思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和他在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逐条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针对拉萨尔派离开生产关系空谈"劳动"和"公平分配"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见本卷第436页）。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也不可能得到拉萨尔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只有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建立后备基金、支付管理费用、满足共同需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等各部分之后，才谈得上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在阐述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时，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并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由于在经济、道德和精神上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消费品分配只能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实行按劳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见本卷第434页）；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和人本身的全面发展，"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本卷第436页）。马克思还批判了拉萨尔派所谓废除"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指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针对拉萨尔派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自由国家"等错误观点，马克思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国家的阶级性，指出现代国家"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见本卷第444页），并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

级的革命专政。”(见本卷第445页)此外，这部著作还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在教育和宗教等问题上的重要观点。

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召开了合并预备会议，并拟定了合并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马克思针对这个纲领草案于4月底5月初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并把它和信一起寄给了白拉克，后来该著作被通称为《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恩格斯为了反击德国党内日见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并写了序言。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考虑了《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约·亨·威·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要求，删去了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词句和评语。

《哥达纲领批判》最早由熊得山译成中文，1922年发表在北京《今日》杂志第1卷第4号(马克思特号)；1925年上海解放丛书社出版了李春蕃(柯伯年)的中译本；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何思敬、徐冰的中译本。——419。

212　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国的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两个派别，即由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和卡·特耳克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423、425、499。

213　哈雷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国哈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通称爱尔福特纲领。——423。

214　这个声明后来没有发表，其原因见恩格斯1875年10月11日给威·白拉克以及1875年10月12日给奥·倍倍尔的信。——425。

215 爱森纳赫党的正式名称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8月7—9日在德国爱森纳赫城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爱森纳赫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下建立和成长起来，它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425。

216 委托书在这里是指受某个组织或党派的委托去参加某种会议或执行某种使命的证明书。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规定了受委托人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

拉萨尔派为了坚持他们的机会主义主张，发给他们的代表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而威·李卜克内西则热衷于合作，不惜作无原则的让步，他在1875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辩解说："拉萨尔派事先直接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些特别糟糕的条文均受委托书的约束。我们的（以及对方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426。

217 原来宣布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将于1875年5月23—25日召开，拉萨尔派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召开，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拟于5月25—27日召开。实际情况是，合并代表大会于5月22—27日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和拉萨尔派代表大会都是在合并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426。

218 指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年9月—1875年11月在巴黎分九册出版。——427。

219 指出版《人民国家报》的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该社于1875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新版本。——427。

220 指斐·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保持的秘密关系。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觉察到这一点，他在1865年2月2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拉萨尔事实上已经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20页）1928年发现的材料证实，拉萨尔早在1863年5月就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彼此多次密谈，书信来往。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64年2月。1863年6月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表示："一旦工人等级能够有理由相信独裁对它有好处，它就会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

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正如我最近对您说的那样，如果国王什么时候能够决定采取——当然这是难以置信的——步骤，实行真正革命的和民族的方针，并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王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革命的人民的王权，那么工人等级尽管有共和主义的信仰，或者宁可说正是由于这种信仰，就会多么倾向于把国王看做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独裁的天然体现者！”——431。

221　指1874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九人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当时监禁期已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所获选票超过35万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大大超过了1871年选举所获的票数。——438。

222　这一称谓显然是用来讽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威·哈赛尔曼的。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1871—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了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派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势力所进行的仇视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438。

223　俾斯麦上台后，为了镇压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871年，他同法国反动头子阿·梯也尔勾结，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后，1871—1872年他企图同奥匈帝国、俄国缔结一个正式协定，以便共同镇压革命的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一国际。1873年10月22日，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奥、德三国皇帝缔结了协定，即“三国同盟”，规定一旦出现战争或革命的危险，三国应立即协商，采取共同行动。——439。

224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

翼。——439。

225 指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在每日政治新闻栏目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439。

226 引自歌德《神性》中的诗句：“我们大家必须顺从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完成我们生存的连环。”——440。

227 弗·朗格在1865年发表的《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一书，宣扬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恩格斯于1865年3月29日写信给朗格，对他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440。

228 指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菲·毕舍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消除社会弊病的主张。——443。

229 “狭隘的臣民见识”是广泛流传于德国的一种说法，源于1838年初普鲁士内务大臣冯·罗霍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当时有人以埃尔宾城居民名义写信支持格丁根七教授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该邦宪法。罗霍在回信中写道：“臣民应当对自己的国王和邦君表示理所当然的服从…… 但是不应当以自己的狭隘见识为标准去度量国家元首的行为……”——444。

230 这句话原文是拉丁文：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源于《旧约全书·以西结书》，意思是，我已经尽了责任。——449。

231 《卡尔·马克思》是恩格斯应威·白拉克的请求为他主编的《人民历书》丛刊撰写的马克思传略。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介绍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伟大一生，概述了马克思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争取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他着重阐释了马克思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理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这两大发现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写于1877年6月中旬，发表在1878年《人民历书》上。文章发表以后，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后来介绍马克思生平事业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依据恩格斯这篇文章中的事实材料，就连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也主要是以本文为依据；一些比

较有影响的回忆录，如保·拉法格的《回忆卡尔·马克思》以及弗·列斯纳的《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也吸收了本文的内容和思想。恩格斯在1892年为《政治科学手册》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说："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唯一可靠的传记是发表于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1878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传记（作者恩格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00页）

1939年3月延安《解放》周刊第66期发表了黎平、石巍译的这篇传记，篇名为《马克思小传》；1940年8月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的何封等译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中也收有这篇传记。——451。

232 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后拒绝实践先王早在1813年和1815年就许诺的颁布宪法、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从而激起了资产阶级同王国政府政治上的强烈对立。恩格斯曾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公开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2—363页）。——451。

23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于1841年5月23日—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针对这次议会辩论分四个专题写四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连续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写了，具体情况不明。

马克思的文章在《莱茵报》上发表以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451。

234 指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1845年1月11日下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452。

235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亚·洪堡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是因为此人当时负有普鲁士秘密外交使命，曾于1845年1月4日—3月19日在巴黎逗留，并于1月7日接受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召见。当时报界盛传他的巴黎之行与马克思等人被驱逐有关，对此他曾公开予以反驳。但毫无疑问的是，文中未提到的德

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伯恩施太德参与了告密和驱逐马克思的卑劣行动。——452。

236 *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452、491。

237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虽然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452、492。

238　*三月革命*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见注251),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453。

239　钦博拉索山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意即粗鲁无礼到了极点。——454。

240　指1849年2月7日和8日的两个审判案。

第一次是因为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刊登《逮捕》一文被指控污辱和诽谤了国家权力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

第二次是1848年11月因报纸号召人民抗税，被指控煽动叛乱，马克思和卡·沙佩尔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454。

241 指1849年5月3—9日在德累斯顿爆发的武装起义以及因后备军反对应征加入普鲁士军队在莱茵省爆发的起义。

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且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德累斯顿起义的导火线，起义遭到萨克森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这次起义为1849年5—7月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揭开了序幕。

莱茵省的起义于1848年5月9日首先从埃尔伯费尔德开始，继而席卷杜塞尔多夫、伊瑟隆及索林根等地，街垒战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454。

242 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454。

243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这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455。

244 指第二帝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并于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455。

245　19世纪的所谓欧洲强国有六个：俄国、英国、德国（1871年起为德意志帝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1861年起）。——457。

246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马克思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方法的著作。马克思在信中批驳了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对他的观点的歪曲。他指出，他根据大量资料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见本卷第464页）马克思还坚决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见本卷第466页）。他强调，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见本卷第467页）。

马克思的信是在《祖国纪事》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不久写成的，估计是在1877年10—11月。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针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从民粹派的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进行辩护，但是对《资本论》却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抄写了几个副本。恩格斯将其中一个副本附在1884年3月6日的信中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他在信中说，马克思的信"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123页）。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最初可能由查苏利奇译成俄文，于1885年以石印的形式在俄国出版，同年12月以胶版誊写版的形式再次出版，但这两次的出版物大部分落入警察手中。后来，这封信又用俄文发表在1886年《民意导报》（日内瓦）第5期；这封信还于1888年10月用俄文发表在俄国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译者是尼·弗·丹尼尔逊。1886年还出版过这封信的两种波兰文本；这封信的德译文发表在1887年5月3日《纽约人

民报》第5号，同年6月3日又转载于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

194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林超真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收录了这封信。——463。

247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第2节第一段有两个文稿，这里译出的是第二稿，第一稿全文如下：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说明了使生产者同他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变成资本的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

但是，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

在那一章末尾，我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并断言，资本主义积累的最后结果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465。

248 “白种贫民”指美国南部蓄奴州自由的、但依附于奴隶主的无地居民。由于棉花生产为大农场主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经济阻碍了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大部分农民因此而破产并沦为“白种贫民”，他们耕种贫瘠的土地，住在破旧的茅屋里，甚至连农奴都鄙视他们。大奴隶主统治着奴隶和数百万“白种贫民”。——466。

249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重要文献。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奥·施拉姆三人在苏黎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严厉批判了他们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见本卷第484页）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为了对旧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把自身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他们还重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

运动，“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见本卷第484页）。

1878年10月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状态。在这种异常困难的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抬头，而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倾向采取调和主义态度。为了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这封具有党内文件性质的通告信。

这封通告信是恩格斯在1879年9月11日之后起草的，是对奥·倍倍尔8月20日来信的回复。9月17—18日马克思疗养结束回到伦敦，立即同恩格斯共同讨论起草这封信，并将最后方案确定下来。马克思在9月1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封信叫做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390页）。

《通告信》第一次发表在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第23期。

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柯伯年、艾思奇、景林等翻译的《马恩通信选集》收入了《通告信》的节选。——468。

250　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了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凯泽尔这种在帝国国会中为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而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进行辩护的行为，同时也尖锐地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471。

251　1848年3月18日柏林发生了街垒战。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的战斗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 000多人被打伤。起义者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于3月19日晨强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王宫阳台向在街垒战中的牺牲者脱帽致敬。——480。

25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评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论述了唯

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指出这一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见本卷第554、551页），这一矛盾的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恩格斯分析了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所有制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形式，认为这是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采用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形式，“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见本卷第559页）。恩格斯还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见本卷第559、560页）恩格斯还根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科学地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他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见本卷第566页）

这部著作是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根据《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而成的，改编时对《反杜林论》中的相关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82—398页）。这部著作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经恩格斯本人校阅后，起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同年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为法文版写了前言，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本卷第493页）。这部著作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在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作用。这部著作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波兰文本，1883年在贝内文托出

版了意大利文本。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明的时间是1882年)；同年又在该地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这部著作的俄译本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于1882年12月发表在秘密杂志《大学生》第1期，1884年劳动解放社又在日内瓦出版了单行本，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德文第四版；1892年出版了由爱·艾威林翻译的英文版，恩格斯写了长篇导言。此外，这部著作的四个德文版和1892年的英文版均以附录的形式收有恩格斯的《马尔克》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早由施仁荣译成中文，1912年发表在上海《新世界》杂志第1、3、5、6、8期；1928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朱镜我的中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吴黎平的中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博古校译的中译本。——487。

25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写于1880年5月4—5日前后，在这篇前言上署名的是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保·拉法格。手稿中有马克思给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前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撰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491。

254　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492。

255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47年11月7日成立于布鲁塞尔，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比利时的激进的及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此外还有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以及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中的积极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

伍中。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492。

256 这一时期的事件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492。

257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写的。该版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于1883年3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扉页上标的日期是1882年)。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仍由该报社于1883年出版。——494。

258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写的。该版于1891年在柏林由《前进报》社出版。第四版是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497。

259 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的补充，另行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反杜林论〉准备材料》部分。——497。

260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是恩格斯的一篇有丰富理论内容的重要文章。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介绍了写作《反杜林论》的背景以及由《反杜林论》的三章改编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流传情况，指出它是传播最广泛的社会主义著作。他着重论述了唯物主义和宗教、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斗争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实质，揭露了不可知论妄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质，用自然科学的成就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表述唯物史观，指出：“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

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见本卷第509页）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欧洲资产阶级由革命走向反动的历史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揭露资产阶级妄图利用宗教来阻挡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指出“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见本卷第521页）。恩格斯还强调：“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见本卷第522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译者是爱·艾威林，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1893年第11年卷第1册第1期和第2期，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编辑部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删去了前面的七段。导言的个别部分曾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三次会战》、《工人政党》为标题，用法文发表于1892年12月4日、11日和25日，1893年1月1日和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5、116、118、119、120号。——499。

261 指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该书第1版于1873年在柏林出版。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该书第1版于1871年在柏林出版。——500。

262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500。

263 参看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和《原始的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501。

264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由恩格斯校订的，于1887年出版。——501。

265 *唯名论者*代表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该派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它们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

事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502。

266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的观点，*种子*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种子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502。

267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504、514。

26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0—332页。恩格斯将引文从德文译成英文时做了不少修改。——504。

269 *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蒲斯创立于伦敦。1878年该组织模仿军队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1880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该组织着重在下层群众中开展慈善活动，并吸收教徒。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开展广泛的宗教活动，并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505、520。

270 指1522—1523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对这两次战争作了阐述。——510。

271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让·加尔文（1509—1564年）创立了加尔文教，这是基督教新教流派之一。该教派的教义是"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部分人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永定为受惩罚的（弃民）。加尔文教严格奉行的宗教信条完全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511。

272 "*光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

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命”。——512。

273　蔷薇战争亦称玫瑰战争，是1455—1485年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阶层；支持兰开斯特家族的则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几乎使古老的封建家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512。

274　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是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所著《论公民》一书序言，该书于1642年在巴黎写成，1647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513。

275　笛卡儿派指17—18世纪笛卡儿哲学的继承者。笛卡儿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唯心主义倾向，在物理学方面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其追随者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派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机械论自然观，成为唯物主义者；另一派则发展了笛卡儿形而上学中关于上帝与灵魂的学说，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514。

276　指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宣布拥有自由和财产等是每个人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791年的法国宪法包括了这篇宣言。1793年的雅各宾派《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是根据1789年这篇宣言起草的；1793年这篇宣言被作为导言放在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第一部共和国宪法之前。——514。

277　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制定的五部法典之一，又通称为拿破仑法典。——514。

278　指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这些人是联合在伦敦革命协会，主要是联合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命的拥护者（在协会的组

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曾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曾遭到英国寡头政治执政者的迫害。——515。

279 指选举法的改革法案。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由英国下院通过,1832年6月由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进入议会的大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却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516。

280 1824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英国议会被迫通过一项法令,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有关法律。1825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会的决定,但是却对工会的活动严加限制。即便仅仅为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进行鼓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行为而以刑事罪论处。——516。

281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7)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517。

282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见注31)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517。

283　乔纳森大哥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年)期间英国人给北美人起的绰号。——517。

284　奋兴派亦称教会复兴派，是英美等国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19世纪产生于美国清教徒移民中，不久又传到英国。该派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团体来巩固并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奋兴派有时也泛指各种谋求恢复教会旧日威势的派别。——517、520。

285　指1867年德比—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议会改革。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519。

286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于1872年实行。——519。

287　崇礼派是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国教会中倾向于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流派，因其创始人之一是牛津大学神学家皮由兹，故更流行的名称为皮由兹教派。该派的信徒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崇礼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当时的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地位，竭力抵制大部分属于各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该教派的产生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520。

288　指路·布伦坦诺关于英国工联的论著。布伦坦诺竭力称赞英国的工联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典范，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按照布伦坦诺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组织得很好的工会可以取代工人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也成为多余的了。

恩格斯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一文中揭露了这种观点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521。

289 社会契约是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524。

290 再洗礼派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该派不承认为婴儿所施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须再次重行受洗。该派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在德国、瑞士和荷兰等地。其主要成员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仇视封建制度及其支柱天主教，信仰宣传基督复临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该派中一部分人主张财产公有，反对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积极参加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后来被统治阶级残酷镇压。——525。

291 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525。

292 指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525。

293 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怖。——526、528。

294 督政府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由五名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执行的政策摇摆不定，导致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迭起，最后在1799年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中被推翻。——526、529。

295　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被收入昂·圣西门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530。

296　参看昂·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拿破仑本人宣布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自1815年3月20日他率军从流放地重返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止。——531。

297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阿·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格·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会战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示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531。

298　这一思想在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已作过阐述，该书包含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以下述公式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532。

299　1815年1月，罗·欧文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遭到工厂主们的反对。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形成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限定18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536。

300 1833年10月，由罗·欧文主持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工会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失败。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536。

301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写成于1762年前后，后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由歌德翻译的德译本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个法译本被收入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该文集实际上1823年才出版。——538。

302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时期。这个时期因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成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这一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539。

303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皮·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论》第1—2卷最后一章中得到了阐述。由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气团，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542。

304 指恩格斯所著《马尔克》一文，该文作为1883年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553。

305 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竞争主要在英国和荷兰之间展开，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战争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是英国，到18世纪末，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553。

306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820年1月起，海外贸易公司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559。

307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本卷第414、443—446页），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和第4章第3节（《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4—20、61—63页）。——562。

308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联合王国近来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发表在1878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3月号。——564。

309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的请求起草的党纲的理论部分。马克思在导言中简洁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目标。他指出，“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见本卷第568页）；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形式的确立；这种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组成独立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在经济方面的最终目标是使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他还提出了党的策略原则，强调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普选权来实现奋斗目标。

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法国工人党的决议。以茹·盖得为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通过保·拉法格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定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

伦敦，5月10日前后在恩格斯的寓所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或称最低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马克思对盖得口授的。马克思在1880年11月5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谈到了这个纲领的起草过程和对这个纲领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2—453、466—468页）。

纲领于1880年6月19日首次发表在由约·菲·贝克尔主编、在日内瓦发行的《先驱者》第25期，后来又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第24号，7月10日《无产者报》第93号以及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第10号。——568。

310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是马克思论述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在复信的草稿中详细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和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见本卷第578页）。但是，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农村公社趋于瓦解，“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见本卷第582页）他在复信中还指出：“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见本卷第590页）

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写信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以及这部著作在俄国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

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还表示:"如果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那么,这将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帮助。"

马克思的复信注明的日期为1881年3月8日。从马克思当时与其他人的通信来看,可以肯定马克思一接到查苏利奇的信就着手准备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另外,马克思早在1880年12月也曾向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代表、该党机关报《民意报》编辑尼·亚·莫罗佐夫作过许诺,准备对有争议的俄国农村公社前景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拟了四个草稿,本卷收录了其中的初稿和三稿。复信和草稿的原文都是法文,1924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

这封复信的草稿曾由张广达翻译、何许校订,1955年发表于《史学译丛》第3期。——570。

311　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通过卡夫丁轭形门")一语即由此而来。——575、587。

312　指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民意党是1879年8月成立的俄国最大的民粹派组织。——589。

313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是恩格斯论述基督教历史问题的文章。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基督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批判了资产阶级官方神学家在基督教历史研究领域散布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强调,唯物主义者不应当满足于对宗教的简单否定,而应当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这一社会现象,弄清它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引起一些人的共鸣。他指出:"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见本卷第592页)恩格斯肯定了布·鲍威尔对研究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所

作的贡献，同时指出他的唯心主义妨碍他对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的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确切的说明。

这篇文章写于1882年4月下半月。1882年4月13日布·鲍威尔逝世是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恩格斯早在1841—1842年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就对基督教历史问题产生了兴趣，此后仍不断进行研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264—265页）。恩格斯在本文中第一次公开阐述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后来，他在《启示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对本文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本文最初刊登在1882年5月4、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20号。——591。

314 *自由思想者*指对宗教信条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坚持用理性来评价宗教教义，主张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捍卫理性自由的人。早在10世纪，就有一些自由思想者在巴格达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比较，指出这三种宗教的创立者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都是骗子。这种观点后来传到欧洲，直到启蒙运动时期仍然在产生影响。——591。

315 *雅利安人*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民族的总称。——591。

316 布·鲍威尔对新约进行考证的著作主要有：《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0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福音书及其起源的史实考证》1850—1852年柏林版第1—4卷；《使徒行传。保罗教义和犹太教在基督教会内部的调和》1850年柏林版以及《保罗书信考证（分三个部分论述）》1850—1852年柏林版。——591。

317 布·鲍威尔在《福音书的神学解释》一文中批驳了大·施特劳斯的理论；这篇文章被收入《福音书及其起源的史实考证》1852年柏林版第4卷。——592。

318 恩格斯提到的这一事实，布·鲍威尔在下列著作中作了阐述：《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874年柏林版及《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

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οά”）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的观念和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593、597、598。

319 **逻各斯**（Logos）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术语，意为言语、思想、思维、理性、比例、尺度等；一般指尺度、规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它引入哲学，主要用来说明万物生灭变化的规律。在黑格尔哲学中，逻各斯是指概念、理性、绝对精神。——593。

320 指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见诗集《罗曼采罗》），这是一个年轻的浪荡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手。——593。

321 参看亨·埃瓦尔德《以色列民族史》1864年格丁根第3版第4卷第254—257页。——594。

322 使徒书信是对《新约全书》中称为“书信”的各卷书的泛称，相传为使徒保罗、雅各、彼得、约翰和犹大所写；从《罗马人书》到《犹大书》，共计21卷。——594。

323 指佩特罗尼乌斯创作的小说《萨蒂里孔》。这部作品通过描写一个发了财

的被释放的奴隶特里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真实地再现了罗马帝国早期的社会状况。——596。

324 参看雅·菲·法耳梅赖耶尔的著作《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册第227页。——596。

325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恩格斯概述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贡献和毕生革命活动的重要讲话。恩格斯在讲话中集中阐述了马克思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光辉一生。恩格斯指出：作为科学家，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把科学看成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作为革命家，他毕生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这篇讲话是1883年3月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用英文发表的。他曾用英文起草了讲稿，但在马克思墓前并未完全按照讲稿宣读。1883年3月18日，恩格斯应爱·伯恩施坦的请求，用德文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的报道，他在报道中复述了自己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的内容。因此，后来刊出的这篇讲话的德文本及法文译本与英文草稿的文字表述不完全一致。

恩格斯的报道《卡尔·马克思的葬仪》发表以后，欧洲和北美的多家报刊予以转载。纽约发行的《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1891年)在征得恩格斯的同意后，将这篇讲话作为对恩格斯于1877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见本卷)的补充加以收录。

这篇讲话曾多次译成中文，主要有：1930年3月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的致平的中译文；1933年5月4日天津《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第36期发表的林风的中译文；1939年3月8日延安《解放》周刊第66期发表的黎平、石巍的中译文。——601。

326 1882年在慕尼黑举办的国际电气技术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德普勒展示了自己的一项研究成果，他利用普通的电报用电线成功地在米斯巴赫与慕尼黑之间架设了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将电力输送到57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次远距离输电的成功在当时颇为轰动。——602。

327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是马克思1871年5月23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遭到反动政府残酷镇压、面临失败危险时指出："即使公社被打败，斗争也只是推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见本卷第607页）

马克思的发言促使会议就揭露凡尔赛政府、抗议梯也尔准备对公社战士进行残酷迫害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在英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遏止凡尔赛政府的野蛮行为。——607。

328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是美国《世界报》驻伦敦通讯员兰多尔采访马克思的记录。马克思在接受采访时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攻击和诋毁，阐述了国际的性质和宗旨。他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是使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联合的目的是"通过赢得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利用这个政权来达到社会目的"（见本卷第611页）。马克思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阶级必须把自己的解放事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改造整个社会。马克思还论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出各国工人阶级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应当由他们自己选择；在资产阶级掌握立法权和表决权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1871年7月初，兰多尔在马克思的家中采访了他。7月18日《世界报》发表了兰多尔整理的采访记录。8月12日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转载了这篇记录，其中有删节。兰多尔发表这篇记录时声明，谈话内容是他追记的。——609。

329　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幽默作家查·利兰（1824—1903）1871年出版了《汉斯·布赖特曼歌谣》。此书描写了一个名叫汉斯·布赖特曼的人的滑稽故事，在美国和英国极受欢迎。主人公使用了当时流行于德裔宾州人当中的德英混合方言，而这种奇特的方言也因此被称做"汉斯·布赖特曼方言"。兰多尔在此显然是暗示马克思讲的英语略带德国乡音。——609。

330　共济会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一种秘密团体，旨在传播并执

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它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后来随着英帝国的向外扩张传播到欧美许多国家。共济会谴责封建制度和英国国教，谋求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宗教。共济会秘密分会的活动是模仿工匠行会的神秘典礼和秘密仪式。该会会员赋予自己净化道德、慈善为怀和革新世界的任务。他们相信永恒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有他们最智慧的领导人物才能认知，这些领导人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负责教育一般会员遵守这些规律，培养博爱、正义和启蒙的精神。——610。

331　兰多尔此处记录不准确。实际情况是，1871年春季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发生了雪茄烟工人罢工；而与此同时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发生了纺织工人罢工。——612。

332　*土地和劳动同盟*于1869年10月在总委员会的参与下在伦敦成立。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格·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除了提出关于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一般的民主要求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

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推动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化，把它看做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到1870年秋，资产阶级分子加强了对同盟的影响，1872年同盟便与国际完全失去了联系。——612。

333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对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孔德及孔德派（实证主义派）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见本卷第206、214—215页。——616。

334　兰多尔在记录结尾处写道："我已经就我记忆所及，把我同这位卓越人物谈话的要点为读者整理成这篇记录。不论我们对国际协会可能参与了公社运动这种看法是同意还是反对，可以确信的是，无论好歹，国际协会是文明世界里新出现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617。

335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是马克思1871年9月24日在伦敦为庆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马克思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团结各国无产阶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他指出："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

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促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但是，在实行这种改变以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619页）。马克思还强调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见本卷第619页）。

出席这次集会的有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马克思担任会议主席。1871年10月15日纽约《世界报》报道了这次集会的情况，并摘要转述了马克思讲话的内容。本卷发表的只是报道中转述的马克思在这次集会上的讲话。——618。

人名索引

A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21。

奥尔，伊格纳茨(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8、1880—1881、1884—1887和1890—1907)，晚年为改良主义者。——423、425。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163、166、170。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593。

奥雷尔·德·帕拉丹，路易·让·巴蒂斯特·德(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1804—1877)——法国将军，教权主义者，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1855年任法军旅长，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任卢瓦尔军团司令；1871年3月任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41—142、144。

奥利维埃，埃米尔(Ollivier, Émile 1825—191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议员(1857年起)；60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1870年1—8月)。——342。

奥哲尔，乔治(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职业是鞋匠，工联伦敦理事会创建人之一，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118、129。

B

八里桥伯爵——见古赞-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东，八里桥伯爵。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525。

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455。

波特兰公爵，威廉·约翰·阿瑟(Portland, William John Arthur, Duke of 生于1857年)——英国贵族，在伦敦拥有大批房地产。——295。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Bo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被开除出同盟（1848年3月）；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曾与警察局有联系。——491。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银行雇员和政论家，1872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代表(1875)，卡·赫希柏格的秘书(1878)，1880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1890)。——469、472—473、476、477、479、482、485。

伯麦，雅科布(Böhme, Jakob 1575—1624)——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曾阐述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路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503。

柏西阿斯(奥鲁斯·柏西阿斯·弗拉克斯 Aulus Persius Flaccus 34—62)——罗马讽刺诗人，曾斥责当时罗马社会的堕落风气，斯多亚派哲学的追随者。——597。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206、213。

博林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 Henry Saint-John, Viscount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513。

布恩，马丁·詹姆斯(Boon, Marti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师；宪章主义者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拥护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土地和劳动同盟书记，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C

D

G

阶级共和派,国防政府的成员(1870—1871),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各省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1871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曾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187、217。

戈克,阿曼德(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413。

哥尔查科夫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нязь 1798—1883)——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总理大臣(1867—1882)。——125。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327、440、506、547。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3、7—8、446。

格兰特,詹姆斯(Grant, James 1802—1879)——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激进派;《晨报》编辑(1850—1871)。——287。

格雷格,罗伯特·海德(Greg, Robert Hyde 1795—1875)——英国大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287—288、290。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18。

格罗夫纳,休·鲁普斯,威斯敏斯特公爵(Grosvenor, Hugh Lupus, Duke of Westminster 1825—1899)——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大地主。——295。

古赞-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东,八里桥伯爵(Cousin-

J

K

原始公社制度方面的著作。——501。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519。
科恩,詹姆斯(Cohn [Cohe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1),丹麦通讯书记(1870—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工人代表同盟执行委员会成员(1870)。——118、129、182。
科尔邦,克劳德·昂蒂姆(Corbon, Claude-Anthime 1808—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1849);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市第十五区区长,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少数派。——132。
科尔布,卡尔(Kolb, Karl)——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181。
科特洛贡伯爵,路易·沙尔·艾曼纽埃尔(Coëtlogon, Louis-Charles-Emmanuel, comte de 1814—1886)——法国官员,波拿巴主义者,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之一。——146。
克拉左门的阿那克萨哥拉——见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
克莱尔蒙-托内尔伯爵,斯塔尼斯拉斯·玛丽·阿黛拉伊德(Clermont-Tonnere, Stanislas Marie Adélaïde, comte de 1757—1792)——法国政治活动家,初为自由派,后为保皇派。——145。
克林斯基,扬(Krynski, Jan 1811—1890)——波兰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波兰起义(1863—1864)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波兰人协会书记,波兰社会主义杂志《征召义勇军》(1875)编辑。——349。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rupp, Alfred 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289。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511。
肯宁安,约翰(Cunningham, John 1729—1773)——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69。

《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52、491。

M

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559。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156。

弥尔顿,约翰(Milton, John 1608—1674)——英国诗人和政论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197。

米尔柏格,阿尔图尔(Mülberger, Arthur 1847—1907)——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240、308—314、316—320、323—333。

米尔纳,乔治(Milner,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职业是裁缝;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72年秋起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讯书记,反对脱离派。——118、129、181。

米尔斯,查理(Mills, Charles)——英国工程师,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1。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的编辑。——463。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Miquel, 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481。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 Honoré-Gabriel-Victor Riqueti, comte de 1749—1791)——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136。

米里哀尔,让·巴蒂斯特·爱德华(Millière, Jean-Baptiste Édouard 1817—1871)——法国新闻工作者、法学家,职业是制桶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曾批评梯也尔政府和指责茹·法夫尔,为巴黎公社辩护,1871年5月26日被凡尔赛分子枪杀。

N

O

P

Q

R

S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 Karl August 1830—1905)——德国经济学家，保险公司职员，70年代初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人民国家报》和《未来》杂志的撰稿人，《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辑；70年代下半期起成为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主要理论家；1886年脱离工人运动。——469、471—472、474、477、479、482、485。

施穆茨(Schmutz)——瑞士工人，海尔维第工人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118、129。

施奈德，欧仁(Schneider, Eugnène 1805—1875)——法国大工业家，克勒佐冶金厂厂主。——289。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592、595。

施特鲁斯堡，贝特尔·亨利(Strousberg[Stroußberg], Bethel Henry 原名巴鲁赫·希尔施·施特劳斯堡 Baruch Hirsch Strausberg 1823—1884)——德国铁路承包商；1855年以前住在伦敦，以后住在柏林；1875年破产。——301、481。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卡·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302。

施韦泽，约翰·巴蒂斯特·冯(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1833—1875)——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拉萨尔派，《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和编辑(1864—1871)；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3年起)和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国会议员(1867—1871)；1872年因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而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16、477—478。

舒尔采-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 Franz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1859)；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国会议员(1867年

T

Z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593。

阿波罗——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593。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382。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想要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373。

B

布雷西希大叔——罗伊特的短篇幽默小说中的人物。——321。

布鲁土斯——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利乌斯·凯撒》中的人物。——360。

布索那克——莫里哀的喜剧《布索那克先生》中的主人公，愚昧无知的土贵族的典型。——140。

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世纪）的宠臣。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100。

F

H

K

L

M

N

P

Q

S

T

W

X

Y

Z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27日，12月2、4、11、18日，1875年1月20、22、2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26、127、129、130、132、133、135、137、138、140、141、144、147号；1875年第7、8、10号(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1874. Nr. 126, 28. Oktober; Nr. 127, 30. Oktober; Nr. 129, 4. November; Nr. 130, 6. November; Nr. 132, 11. November; Nr. 133, 13. November; Nr. 135, 18. November; Nr. 137, 25. November; Nr. 138, 27. November; Nr. 140, 2. Dezember; Nr. 141, 4. Dezember; Nr. 144, 11. Dezember; Nr. 147, 18. Dezember; 1875. Nachtr.: Nr. 7, 20. Januar; Nr. 8, 22. Januar; Nachw.: Nr. 10, 27. Januar)。——45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2. Ausg. Hamburg 1869)。——45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1期(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 York. 1852. H. 1)。——99、455。

《协会临时章程》，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In: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London 1864)。——431、437。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19—20、242、250、342、407、409、414、452、492。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 1. Berlin 1859)。——22、455。

《资本论》1872—1875年巴黎版(Le Capital. Paris 1872—1875)。——426、465、466、570、583、589、590。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 from the 3rd German ed. by S. Moore and E. Aveling

弗·恩格斯

报》(莱比锡)第23、24、25号(Preuß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23, 25. Februar 1876; Nr. 24, 27. Februar 1876; Nr. 25, 1. März 1876)。——492—493。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491。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巴黎—里昂)第3、4、5期(Le socialisme utopique et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In: La Revue socialiste. Paris, Lyon. Nr. 3, 20. März 1880; Nr. 4, 20. April 1880; Nr. 5, 5. Mai 1880)。——491、494。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0年巴黎版(Le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 1880)。——491、494、500。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92年伦敦版(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London 1892)。——499、500。

《流亡者文献。三》,载于1874年10月6、8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17、118号(Flüchtlings-Literatur. III.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117, 118; 6., 8. Oktober 1874)。——377—385。

《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Flüchtlings-Literatur. V. Soziales aus Rußland. Leipzig 1875)。——492。

《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第2版(Zur Wohnungsfrage. 2. durchgesehene Auflage. Hottingen, Zürich 1887)。——239—240。

《论住宅问题。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H. 1: 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Leipzig 1872)。——239、240、493。

《论住宅问题。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H. 2: 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Leipzig 1872)。——239、240、493。

《论住宅问题。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1873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H. 3: Nachtrag ü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 Leipzig 1873)。——239、240、493。

《马尔克》,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Mark. In: F. Engels: Die Entwicklung des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 Hambourg 1873)。——367、370、375、387。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 Frankfurt a. M. 1845)。——452、504。

《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Irish Tenants' Right Bill)。——13。

爱尔维修,克·阿·《论精神》(两卷集)1784年伦敦版第1卷(Helvétius, C. A.: De l'esprit. T. 1—2. T. 1. Londres 1784)。——21—22。

B

巴枯宁,米·《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日内瓦版(Бакунинъ,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ія. Женева 1873)。——403—409、415、425。

《巴黎每日要闻》,载于1871年3月19日《费加罗报》(巴黎)第74号(Paris au jour le jour. In: Le Figaro. Paris. Nr. 74, 19. März 1871)。——132。

《巴黎奇遇记》,载于1871年6月8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834号(The adventure in Pari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7834, 8. Juni 1871)。——183。

巴师夏,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astiat, F. /P. -J. Proudhon: 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23。

《百科全书》1777—1778年日内瓦新版第1—28卷(Encyclopédie. Nouvelle éd. T.1—28. Genève 1777—1778)。——514。

鲍威尔,布·《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874年柏林版(Bauer, B.: Philo, Strauß und Renan und das Urchristenthum. Berlin 1874)。——595。

鲍威尔,布·《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

(Bauer, B.: Christus und die Caesaren.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hums aus dem römischen Griechenthum. Berlin 1877)。——595。

《暴动之结局》,载于1871年6月2日《旗帜报》(伦敦)第14613号(The end of the insurrection. In: The Standard. London. Nr. 14613, 2. Juni 1871)。——175。

贝累,沙·《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公民梯也尔。1871年4月24日》,载于1871年4月28日《口令报》(巴黎)第64号(Beslay, Ch.: Au citoyen Thiers, chef du pouvoir exécutif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u 24 avril 1871. In: Le Mot d'Ordre. Paris. Nr. 64, 28. April 1871)。——138。

波戈金,米·彼·《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1867年》1867年莫斯科版(Погодинъ, М. П.: Польской вопросъ. Собранiе разсужденiй, записокъ и замьчанiй. 1831—1867, Москва 1867)。——351。

《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波兰人民》,载于1874年5月17日《雷诺新闻》第1240号(Address of the Polish refugees to the English people. The Polish People. In: Reynolds's Newspaper. No. 1240, May 17, 1874)。——349。

《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1874年5月3日于伦敦》(Address of the Polish Refugees to the English People. London. May 3, 1874)。——349—353。

勃朗,路·《给〈世纪报〉编辑的信。1871年4月20日》,载于1871年4月26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97号(Blanc, L.: Brief an den Redakteur des "Siècle" vom 20. April 187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7797, 26. April 1871)。——213。

布雷,约·弗·《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Bray, J. F.: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 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 Leeds 1839)。——341。

布里索,雅·皮·《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载于《立法者、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哲学丛书》1782年柏林—巴黎—里昂版第6卷(Brissot, J. P.: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et sur le vol, considérées dans la nature et dans la société. In: Bibliothèque philosophique du législateur, du politique, du jurisconsulte. T. 6. Berlin, Paris, Lyon 1782)。——18。

D

德巴普,塞·《布鲁塞尔支部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报告。1868年9月11日》,载于1868年9月15日《比利时人民报》(增刊)(布鲁塞尔)《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De Paepe, C.: Rapport de la section Bruxelloise sur la

question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11 septembre 1868. In: Trois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officiel. Supplément au journal le Peuple Belge. Bruxelles. 15 septembre 1868)。——232。

《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载于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27号(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Entwurf.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27, 7. März 1875)。——410、425—426、428—449。

《德国工人对国际宣言的答复》，载于1870年7月22日《马赛曲报》第153号(Réponse des ouvriers allemands au manifeste de l'Internationale. In: La Marseillaise. No. 153, 22 juillet 1870)。——116。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于1875年5月28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59号(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59, 28. Mai 1875)。——474。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评论箴言》，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年苏黎世—奥伯斯特腊斯版第1年卷第1册(Rückblicke auf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Kritische Aphorismen von… In: 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cialpolitik. Jg. 1. H. 1. Zürich-Oberstrass 1879)。——477。

杜弗尔，茹·《检查官通令。1871年4月23日于凡尔赛》，载于1871年4月26日《口令报》(巴黎)第62号(Dufaure, J.: Circulaire aux procureurs généraux. Versailles, 23 avril 1871. In: Le Mot d'Ordre. Paris. Nr. 62, 26. April 1871)。——169。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Dühring, E.: 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2. theilw. umgearb. Aufl. Leipzig 1876)。——500。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修订第2版(Dühring, E.: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2. theilweise umgearbeitete Aufl. Berlin 1875)。——500。

杜林，欧·《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Dühring, E.: 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 Leipzig 1875)。——499—500。

E

F

de Ch. Fourier T. 6. Paris 1845)。——532、556。

富兰克林，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载于《富兰克林全集》(十卷集)，贾·斯帕克斯编，附注释和作者传记，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lin, B.: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In: The Works of B. Franklin. 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 Sparks. In 10 vols. Vol. 2. Boston 1836)。——48。

G

《告法国人民书。1871年4月19日宣言》，载于1871年4月2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93号(Declaration of April 19, 1871 to the French people.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7793, 21. April 1871)。——212。

《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载于1870年7月12日《觉醒报》(巴黎)(To the workmen of all nations. Manifesto. In: Le Réveil. Paris. 12 juillet 1870)。——114。

《革命问答》1869年日内瓦版(Катехизись революцiонера, Женева 1869)。——387。

格莱斯顿，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35号(Gladstone, W.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535, 17. April 1863)。——7、8。

格莱斯顿，威·尤·《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841号(Gladstone, W.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7. April 186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841, 8. April 1864)。——3。

《〈公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载于1871年4月3日《旗帜晚报》(伦敦)第14561号(An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fficiel... In: The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Nr. 14561, 3. April 1871)。——212。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 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 1863. London 1864)。——4—8。

《谷物法》(The corn laws)。——35。

《关于房租问题的法案》，载于《国民议会年鉴》1871年巴黎版第2卷(Projet de loi relatif aux loyers. In: Annal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T. 2. Paris 1871)。——141。

《关于巩固和修正消灭传染病和预防疾病法的法令。1848和1849年(1855年8月

H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2. Aufl. Berlin 1840)。——524、591。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1834年柏林版下册(《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uch 2. Berlin 1834. Werke. B. 4)。——311。

胡贝尔,维·艾·《社会问题。四、无形联合》1866年北豪森版(Huber, V.-A.: Sociale Fragen. IV. Die latente Association. Nordhausen 1866)。——285。

《皇室文件和通信》(两卷集)1870—1871年巴黎版第2卷(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 T. 1. 2. T. 2. Paris 1870—1871)。——456。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霍布斯英文著作集》,威·莫尔斯沃思编,1839年伦敦版第3卷(Hobbes, Th.: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 Hobbes: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Now first coll. and ed. by Sir W. Molesworth. Vol. 3. London 1839)。——54。

J

吉奥,阿·西·《给路易·苏桑的信。1870年12月12日》,载于1871年4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第115号(Guiod, A. S.: Brief an Louis Susane vom 12. Dezember 1870. I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Nr. 115, 25. April 1871)。——133。

吉奥,阿·西·《给路易·苏桑的信。1870年12月12日》,载于1871年4月29日《形势报》(伦敦)第189号(Guiod, A. S.: Brief an Louis Susane vom 12. Dezember 1870. In: La Situation. Londres. Nr. 189, 29. April 1871)。——133。

吉芬,罗·《联合王国近来的资本积累》,载于1878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伦敦)第41卷第1期(Giffen, R.: Recent accumulations of capital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London 1878. Vol. 41. Pt. 1)。——564。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的通告。1871年4月》,载于1871年4月1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83号(Note on proclamation of Gaston Alexandre Auguste Galliffet, April 187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7783, 10. April 1871)。——148。

K

L

卷(Laplace, P.-S.: 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T. 1. 2. T. 2. Paris. 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795—1796)。——495、542。

拉萨尔,斐·《工人读本》1863年莱比锡第5版(Lassalle, F.: Arbeiterlesebuch. 5. Aufl. Leipzig 1863)。——412—413。

拉萨尔,斐·《既得权利体系。实在法和法哲学的调和》(两卷集)1861年莱比锡版第1卷(Lassalle,F.: 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Eine Versöhnung des positiven Rechts und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2 Th. Th. 1. Leipzig 1861)。——320、321。

兰盖,西·尼·昂·《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Linguet,S. -N. -H.: 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T. 1. 2. Londres 1767)。——23。

李比希,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两卷集)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Liebig, J.: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7. Aufl. In 2 Th. Th. 1. Braunschweig 1862)。——326。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1817)。——45、343。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76。

卢梭,让·雅·《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 J. J.: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Amsterdam 1755)。——538。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 J. J.: 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524。

罗比耐,让·弗·欧·《有关法兰西和巴黎当前局势的政治笔记》,一位法国实证论者著,爱·斯·比斯利编,1871年伦敦版(Robinet, J. F. E.: Political Note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rance & Paris. By a French Positivist. Ed. by E. S. Beesly. London 1871)。——180。

罗斯,乔·《对大不列颠1792—1799年的收入、商业和工业增长的调查简要》1799年伦敦增补第7版。引自威·科贝特《纸币对黄金》1828年伦敦版(Rose, G.: A brief examination into th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from 1792 to 1799. 7. ed. with considerable add. London 1799.

M

报》(莱比锡)第10—13、15和19号(Mülberger, A.: Die Wohnungsfrage.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10—13, 15, 19; 3., 7., 10., 14., 21. Februar, 6. März 1872)。——240、313。

米尔柏格，阿·《住宅问题。社会问题简述。〈人民国家报〉论文专集》1872年莱比锡版(Mülberger, A.: Die Wohnungsfrage. Eine sociale Skizze.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Leipzig 1872)。——313—333。

米海洛夫斯基，尼·康·《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圣彼得堡)第10期(Михайловскiй, Н. К.: Карль Марксь передь судомь г. Ю. Жуковскаго. In: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и Записки. С. -Петербургь. Nr. 10, Oktober 1877)。——463、464。

米里哀尔，让·巴·《作假者》，载于1871年2月8日《复仇者报》(巴黎)第6号(Millière, J. -B.: Le Faussaire. In: Le Vengeur. Paris. Nr. 6, 8. Februar 1871)。——133、186。

《民法典》(Code Civil)。——见《拿破仑法典》。

摩尔顿，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载于1859年12月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368期。标题:《第四次例会》(Morton, J. Ch.: On the forces used in agriculture.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 London. Nr. 368, 9. Dezember 1859. U. d. T: Forth ordinary meeting)。——35。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 L. H.: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572。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 Ed. orig. et seule officielle. Paris 1808)。——514。

O

欧文，罗·《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Owen, R.: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blic meetings, held in Dublin… On the 18 March, 12 April, 19 April and 3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 Paris 1868)。——108、318、329—330。

蒲鲁东,皮·约·《税收理论,沃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1861年布鲁塞尔—巴黎版(Proudhon, P. J.: Théorie de l'impôt, question mise au concours par le conseil d'état du canton de Vaud en 1860. Bruxelles, Paris 1861)。——23。

蒲鲁东,皮·约·《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Si les traités de 1815 ont cessé d'exister? Acts du future congrès. Paris 1863)。——23。

蒲鲁东,皮·约·《1848年7月3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Proudhon,P. J.: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31. Juli 1848. In: 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T. 2. Paris 1849)。——22。

蒲鲁东,皮·约·《战争与和平》(两卷集)1869年巴黎版第2卷(Proudhon, P. J.: La guerre et la paix. T. 1—2. T. 2. Paris 1869)。——320、321。

《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1872年12月13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72年》(无出版年代)柏林版第41号(Kreisordnung für die Provinzen Preußen, Brandenburg, Pommern, Posen, Schlesien und Sachsen. Vom 13. Dezember 1872.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72. Berlin. O. J. Nr. 41)。——323。

《普鲁士国家宪法原本。1850年1月3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0年柏林版第3号(Verfassungs-Urkunde für den preußischen Staat. Vom 31. Januar 185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0. Nr. 3)。——447。

R

《人民宪章》1838年伦敦版(The People's Charter. Being the outline of 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ju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Commons' House of Parliament, embracing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suffrage, no property qualification, annual parliaments, equal representation, payment of members, and vote by ballot. London 1838)。——517、520。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见《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

S

communes contient… In: Le Rappel. Paris. Nr. 692, 6. Mai 1871)。——167。
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Скалдинь.: Вь захолустьи и вь столиьць.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0)。——398。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四卷集),附《英国和美国》一书作者的评注,1835年伦敦版第1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commentary, 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 In 4 vols. Vol. 1. London 1835)。——52。
《所得税与财产税。对下院1864年2月9日的一项决议的答复》1864年伦敦版(Income and property tax. 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9. February 1864. London 1864)。——9。

T

塔勒,卡·《耶稣会会士罗特》,载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3285号(Thaler, K.: Rothe Jesuiten. In: Neue Freie Presse. Morgenblatt. Nr. 3284, 3285; 14., 15. Oktober 1873)。——368、374。
塔西佗《历史》(Tacitus: Historiae)。——175。
特卡乔夫,彼·尼·《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1874年4月于伦敦》(Ткачёв, П. Н.: Задача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ь Россiи. Письмо к редактору журнала "Вперёдь !". Лондон, Апрьль 1874)。——371、381、383—384。
特卡乔夫,彼·尼·《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1874年苏黎世版(Ткачёв, П. Н.: 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 Verfasser der Artikel "Flüchtlings-Literatur" in Nr. 117 und 118 des "Volksstaat". Jg. 1874. Zürich 1874)。——377—378、383、386、388。
特里门希尔,休·西·《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Tremenheere, H. S.: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With app. of evidence. London 1862)。——8。
特里门希尔,休·西·《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Tremenheere, H. S.: Second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169。
梯也尔,路·阿·《1871年4月4日宣言》,载于1871年4月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79号(Thiers, L. A.: Proclamation of April 4, 187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7779, 5. April 1871)。——149。
梯也尔,路·阿·《1871年4月2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29日《号召报》(巴黎)第685号(Thiers, L.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vom 27. April 1871. In: Le Rappel. Paris. Nr. 685, 29. April 1871)。——166、171。
梯也尔,路·阿·《1871年5月1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71年5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凡尔赛)第132号(Thiers, L.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vom 11. Mai 1871. I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Versailles. Nr. 132, 12. Mai 1871)。——173。
梯也尔,路·阿·《1871年5月24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国民议会年鉴》1871年巴黎版第3卷(Thiers, L.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vom 24. Mai 1871. In: Annal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T. 3. Paris 1871)。——173。
梯也尔,路·阿·《致市长、副市长、市参议员大会委员会的声明》,载于1871年4月28日《号召报》(巴黎)第684号(Thiers, L. A.: Déclaration à la Commission déléguée par l'assemblée des maires, adjoints et conseillers municipaux. Versailles, 25 avril 1871. In: Le Rappel. Paris. Nr. 684, 28. April 1871)。——166。
《梯也尔先生的计划》,载于1871年3月29日《形势报》(伦敦)第163号(Le plan de M. Thiers. In: La Situation. Londres. Nr. 163, 29. März 1871)。——153。
《梯也尔先生的通告》,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巴黎)第21号(Circulaire de M. Thiers. In: Le Vengeur. Paris. Nr. 21, 19. April 1871)。——166。
《梯也尔先生的宣言》,载于1871年4月1日《爱尔兰人报》(都柏林)第13卷第39期(Declaration of M. Thiers. In: The Irishman. Dublin. Vol. 13. Nr. 39, 1. April 1871)。——169。
《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与法夫尔签订(Convention on the armistice and capitulation of Paris signed by Bismarck and Favre on January 28, 1871)。——607。
《通报……》,载于1871年4月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76号(The Moniteur which i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7776, 1. April 1871)。——211。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Children's

X

希尔施,卡·《关于关税的辩论》,载于1879年5月25日《灯笼》(布鲁塞尔)第21期(Hirsch, C.: Die Zolldebatte. In: Die Laterne. Brüssel. Nr. 21, 25. Mai 1879)。——473—477。

希尔施,卡·《关于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问题》,载于1879年6月8日《灯笼》(布鲁塞尔)第23期(Hirsch, C.: Zur Kaiserschen Rede und Abstimmung. In: Die Laterne. Brüssel. Nr. 23, 8. Juni 1879)。——474—477。

《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年6月24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 -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Acte constitutionnel. Présent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24 juin 1793.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In: 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 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 avec des précis offrant de l'histoir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 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 par P. -A. Dufau, J. -B. Duvergier et J. Guadet. T. 1—6. T. 1. Paris 1821)。——514。

《宣言》,载于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巴黎)第30号(Manifeste. In: Le Vengeur. Paris. Nr. 30, 28. April 1871)。——133。

Y

《1871年4月5日公社法令》,载于1871年4月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81号(Proclamation of the Commune of April 5, 187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7781, 7. April 1871)。——149。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1年》1862—1863年伦敦版(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London 1862—1863)。——9。

Z

《致公社社员。1874年6月于伦敦》(Aux Communeux. Londres. juin 1874)。——358。

《重农学派。魁奈、杜邦·德奈穆尔、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勃多神父、勒特罗

文学著作

D

F

G

H

K

M

S

X

报刊索引

A

B

D

F

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274。

《号召报》(Le Rappel)——法国左翼共和派的日报,由维·雨果和昂·罗什弗尔创办,1869—1928年出版;它曾尖锐地抨击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期间主张支持公社。——166、167。

J

《解放报》(La Emancipación)——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1871—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9月—1872年4月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作斗争;1872—1873年,该报刊登过《共产党宣言》,还刊登过《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一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1872年保·拉法格曾担任报纸的编辑。——263。

《觉醒报》(Le Réveil)——法国的一家周报,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8年7月—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从1870年10月起反对国防政府;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和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114。

K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451。

《口令报》(Le Mot d'Ordre)——法国共和派左翼的一家日报,1871年2月3日起由昂·罗什弗尔在巴黎编辑出版;3月11日被勒令停刊,公社时期于4月8日复刊,一直出版到1871年5月20日。——138。

L

《莱茵报》——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

M

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183、213、286。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工人报纸，德国人民党的机关报，1868年1月4日—1869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1869年8月28日起每周出两次，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1868年12月5日起同时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周报最初受人民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影响，但很快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重要作用；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报纸被宣布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并于10月改名为《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79、415。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455、602。

《纽约世界报》(The New-York World)——美国的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1860—1931年在纽约出版。——609。

P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的一家自由派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后来成为保守派的刊物。——186。

Q

《旗帜报》(L'Étendard)——法国波拿巴派的报纸，1866—1868年在巴黎出版，

R

S

T

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3、149、184、186、342。

《泰晤士周报》(Weekly Times)——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1857年12月起在曼彻斯特出版。——304。

《团结报》(La Solidaridad)——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国际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1870年1月起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91。

W

《未来。社会主义评论》(Die Zukunft. Socialistische Revue)——德国一家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杂志,1877年10月—1878年11月由卡·赫希柏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在柏林出版,每月出两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杂志提出尖锐批评。——483。

X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Pionier. Illustrierter Volks-Kalender)——美国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家年鉴,1883—1904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编辑是海·施留特尔。——451、461。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英国的一家周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34—1846年);由罗·欧文创办;1836年曾几度更换副标题;起初在利兹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491。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453—454、492、602。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

Z

派的喉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报纸的无政府主义言论。——472。

《自由选民》(L'Électeur libre)——法国的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为日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报，1868—1871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134。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月刊，1839—18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主要撰稿人有维·格·别林斯基、亚·伊·赫尔岑、米·尤·莱蒙托夫、尼·阿·涅克拉索夫、伊·谢·屠格涅夫和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报纸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后来主要倾向于民粹派。——463。

名目索引

C

D

E

F

G

M

N

O

P

Q

R

S

X

Z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
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

首席专家 韦建桦

主要成员 顾锦屏 王学东 李其庆 周亮勋
王锡君 蒋仁祥 胡永钦 翟民刚
章丽莉 张钟朴 冯文光 柴方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审委员会

主　　编　韦建桦

副 主 编　顾锦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学东　王栋华　王锡君　冯文光

李其庆　沈红文　张钟朴　张海滨

周亮勋　胡永钦　柴方国　夏　静

徐　洋　章　林　章丽莉　蒋仁祥

第三卷编审人员

文献选辑和编纂

韦建桦　顾锦屏　李其庆　周亮勋
王锡君　蒋仁祥　胡永钦　章丽莉
张钟朴　冯文光　柴方国

译文审核和修订

王锡君　沈红文　顾锦屏

题注和说明

韦建桦　顾锦屏　王锡君　沈红文
王学东

资料审核和修订

章丽莉　王栋华　蒋仁祥　胡永钦
章　林　刘洪涛　沈　延　单志澄
朱　羿　李朝晖　李　楠　张红山
李莉娜

全卷译文和资料审定

王锡君　沈红文